



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
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

——马克思

红色中国网文集

(2019 年)

目录

2019 年，进步青年向何处去？	2
严元章同志与“八青年关注团”的斗争经验	11
“新民主主义政治空间”还是社会主义革命？	23
声援团的同志们，无论有多少误解分歧，我们和你们还是一条战壕里的战友	34
一个左青“领袖”怎样成了非法集资黑心资本家	39
混迹民运圈、标榜劳工维权的王江松教授所鼓吹的民主是什么东西？	52
为什么说“中帝论”就是不折不扣的革命渺茫论？	59
自己“证伪”自己的阳和平先生	71
香港大专学界关于所谓“英美港盟、主权在民”集会的声明	79
香港大专学界八一六集会的诉求到底是什么？	81
香港运动已成为法西斯运动，左派不要自欺欺人	84
为什么说当前香港的群众运动是反动的？	87
乌克兰反共“左翼”的今天，就是香港“左翼”的明天	91
“香港人”，你“抗争”的是什么？	93
“和勇并进，统战资本”	96
此次香港反动群众运动中的各阶级	98
红色中国网揭露批判华为的立场是始终一贯的	101
为什么说“造反有理”？	102
阳和平先生的群众观还是毛主席的群众观？	106

2019年，进步青年向何处去？
——红色中国网工作组致青年马列毛左派积极分子的建议书
(2019年1月1日)

过去几个月，北京和其他一些地方的高校青年积极分子经历了一场大风大浪。一些同志被捕了，正在经受考验。要奋斗，就要有牺牲。在资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有一些牺牲，是难以避免的。但是，这并不等于说，有志于远大理想的青年积极分子，应当轻易冒险、轻易牺牲。可以说，这次的牺牲大大超出了必要的限度。这次挫折，有可能在一部分青年积极分子中导致消极悲观和失败主义的情绪，其中一些，或者在经历一个短暂的亢奋期以后，又转入消沉。另一方面，经过这次斗争的锻炼，也可能会有批优秀的青年积极分子，能够经受住考验，并且通过深入的反思，使得自己在思想上和品质上都有很大的提高，从而成为未来斗争的中坚。

为了使得一些青年能够尽快地从悲观失望的阴影中走出来，也为了防止另外一些青年继续盲动下去，又为了找到正确的斗争方向，有必要对过去几个月的斗争，乃至过去几年青年工作的整个方向，加以深入的总结，并在此基础上，逐步摸索出未来正确的道路。

中国当代的“马列毛左派”，作为一种社会力量，是在本世纪初出现的。到目前为止的发展，大体上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2003年至2012年，是乌有之乡、旗帜网、工人网、东方红网等左派小组大发展的时期。这些左派小组的社会基础，大体上是四种。一是在国企工人反私有化斗争中产生出来的一批老工人积极分子，二是所谓“老左派”（与原官僚特权集团有一定联系、尚未完全放弃共产主义理想的一部分老共产党员），三是原文革造反派积极分子，四是边缘化小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上的代表（如韩德强、张宏良）。上述传统左派的力量在2012年薄熙来事件前后达到顶峰。此后，随着国企私有化的完成、他们自身社会基础的变化，其政治影响有所下降。

从2012年以后，进入了高校青年“马列毛左派”小组大发展的时期。青年左派小组的社会基础，主要是高校学生和青年知识分子，实际上是小资产阶级的一部分。马列毛左派思想在青年中影响的增长，说明资本主义矛盾的发展已经威胁到了相当一部分小资产阶级群众的现实利益，使得他们在“阶级固化”、买不起房、结不起婚、谈不起恋爱等困境的压迫下感受到了实在的无产阶级化的威胁。这种现实的经济矛盾，在大批青年头脑中得到反映，进而引起越来越多的青年由自发到自觉地向马列毛主义靠拢。

青年向马列毛主义靠拢，这一社会现象本身，是资本主义矛盾发展的结果，是未来无产阶级运动的一部分。但就青年左派的现实社会基础来说，他们还属于小资产阶级的社会运动，而不是无产阶级的社会运动，也还不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由于这些青年的小资产阶级出身（或者是出身于其他阶级而

变化为小资产阶级的），由于他们赖以生存并习以为常的小资产阶级的物质生产和生活条件乃至一部分意识形态和话语，在他们真正接受无产阶级领导并被无产阶级改造以前，不可避免地要从小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出发看问题，不可避免地要在“马列毛主义”的旗号下实际上主张和宣传本质上是小资产阶级的政治和经济观点，不可避免地要沾染大量的小资产阶级的恶习。

在目前的青年左派中，这种小资产阶级属性已经造成了相当严重的后果。在理论上，在对中国现实社会性质及其主要矛盾的认识上，这突出地表现为所谓“中帝论”的泛滥。如我们一些同志在关于“中帝论”问题的论战中所指出的，将中国资本主义吹捧为是帝国主义，实际上反映了相当一批小资产阶级左派不相信无产阶级的力量、畏惧资产阶级，夸大资产阶级的“强大”，用口头激进来掩盖自己实际上认为革命无望、社会主义遥遥无期的真实心理。在社会实践方面，则表现为重视新工人而忽视老工人或老工人的后代，重视南方沿海而忽视广大的内陆地区，重视资产阶级的法律程序而忽视工人阶级在实际斗争中产生出来的一些行之有效的办法，重视媒体网络而轻视长期扎实的群众工作。

青年左派的小资产阶级属性还表现在其若干骨干人员的个人英雄主义（包括某些人的政治野心），表现在各小组内部的宗教化倾向（少数骨干分子自封“理论权威”，而一般成员则被要求盲目服从，否则就是离经叛道），表现在某些派系的严重宗派主义倾向（以小集团的利益和立场来排斥整个“马列毛左派”的利益和立场，更不必说无产阶级的利益和立场）。

此次佳士工人斗争的失败，除了许多具体策略问题值得深入总结以外，还暴露出了一些更加根本的问题。在最近以“青年先锋”名义发表的一篇总结文章中，表达了许多青年同志对于中国工人斗争发展路线的一般看法。在他们看来，中国工人斗争的发展，必须要像欧美工人那样，像韩、港、台工人那样，首先要争取普遍建立正规的、公开的工会，要争取资产阶级法律的批准（合法化），进而争取建立资产阶级民主。而建立工会的方法，则主要是要靠懂得马列毛主义“理论”的青年下厂，向工人积极分子“灌输”，发动工人开展斗争；而“斗争”的方法，则实际上表现为向资本家请愿，如被镇压，则向资产阶级专政机关请愿，如再被镇压，则企图诉诸社会舆论的神奇力量。

这样一套小资产阶级的“工运”路线，就思想方法上来说，其错误在于，咱们的某些青年积极分子，只知道从书本出发（而且没有读几本书），从片面理解的外国经验出发，而没有做调查研究，既没有真正了解中国阶级斗争的实际，也不注意了解外国阶级斗争的新动态。

中国资本主义的基本特点是什么呢？是所谓“帝国主义”吗，是所谓与美帝争霸吗？都不是的。中国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一个半外围国家。就是说，中国不再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外围国家，因为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已

经基本上完成了工业化，因为中国在历史上已经完成了彻底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国也不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核心国家，因为中国在与核心国家的经济交往中仍然受到不平等交换的大量剥削，因为中国的资本家阶级在国际资本主义的分工中得不到超额利润或超额剩余价值而只能得到一般利润。中国经济参加国际资本主义分工的主要部门仍然是出口制造业，中国的出口制造业仍然要依靠剥削大量廉价劳动力和廉价资源来维持其所谓竞争力。

所以，对大量廉价劳动力的剥削，是中国资本主义的命根子。这就决定了，只要中国资本主义经济还在“正常”运转，资产阶级还在“正常”统治，就决不可能听任工人阶级普遍地、大量地、公开地、合法地组织可以作为工人经济斗争有力工具的工会。资产阶级是不可能那样愚蠢的。一些小资理论家自欺欺人地宣传说，发展工会、保护工人权益，可以有助于“劳资和谐”、可以实现资本主义社会的长治久安，这只能欺骗自己，也许还能欺骗一些尚不觉悟的工人，但是资产阶级是不会上这个当的。

当然，如果未来中国出现了革命形势，从而资产阶级的正常统治无法再维持下去了，普遍发动起来的工人阶级是有可能大量地、自发地提出组织工会与资本家开展斗争的要求的。但是在那样的形势下，工人阶级的要求就绝不会以工会为界限，而垂死的资产阶级也绝不会幻想靠工会等有限的让步就可以维持其阶级统治。

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工人运动的历史经验来看，工会这一组织方式确实曾经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在一部分国家中为工人阶级提高工资、改善劳动条件提供了适当的历史工具。但是这一历史经验，其主要起作用的时期是二十世纪中期（在此之前，即使在核心资本主义国家中，工会运动也常常被镇压，或者限制在少数熟练工人范围内），其较为成功的地理范围，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核心国家，即北美和西欧，以及后来加入核心区的日、韩、港、台等。即使在有组织工会的鼎盛时期，工会充其量也只是曾经起过一定的社会改良的作用，而并没有发挥充分启发工人阶级觉悟、促进社会革命性转变的作用。而在新自由主义时代，即使在老牌的核心资本主义国家，工会也已经普遍衰落。目前核心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的绝大部分都不是工会会员（其中，在北美，工会会员数量已经沦为工人阶级中的极少数；在除北欧以外的西欧诸国，也已经下降为相对少数）。

在世界范围的工会以及社会改良都已经普遍衰落的大环境下，我们有什么理由认为，在中国这样的资产阶级专制统治的政治条件下，工会反而会成为工人阶级提高斗争力量、发展阶级觉悟的有效工具呢？

在这次佳士工人斗争过程中，主要积极分子先是天真地要求资产阶级的官方工会帮助他们建立工会；在受到资本家迫害后，进而幼稚地请求警察当局纠

正资本家的“违法”行为。这种天真和幼稚，如果是作为自发的工人斗争中发生的一种现象，是完全可以原谅的。但是作为号称自觉的“马列毛主义者”所领导的斗争所采取的基本策略，则是完全不可以理解的。

中国目前基本的政治现实是没有一般的资产阶级政治自由。这样的常识，任何一个普通人都懂得，但是咱们的“先进”的马列毛主义青年，却恰恰不懂。在十分特定的条件下，为了揭露资产阶级统治的虚伪，为了达到教育一般群众的目的，有时是可以采取明知资产阶级不会做、做不到，却故意要求对方落实一些纸面上的法律条文的策略的。但是，这样的策略，只能在特定的环境下、在有确实有利的时机时，才可以采取，并且主要是以宣传和揭露为目的，而不是以落实资产阶级的法律条文为目的。

但是，在佳士工人斗争中，主导这次斗争的积极分子从一开始在主观上就幻想可以成立正规的、公开的、受资产阶级法律保护的工会。当这一企图被资产阶级警察的镇压摧毁以后，一批青年积极分子又幻想依靠左派声援、海外舆论的压力就可以让资产阶级政府回心转意。我们不反对，在特定的条件下，在有确实有利的时机时，运用社会舆论来作为一种斗争手段或者实现某种宣传目的。但是，一般来说，在资产阶级专制统治条件下，在资产阶级正常统治时期，在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仍然在照常运转的时候，社会舆论的影响力是十分有限的（实际上，即使在资产阶级民主条件下，也不宜夸大社会舆论的作用）。所以，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对于工人斗争以及其他劳动群众的斗争，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当时当地的阶级力量对比。只有当工人和其他劳动群众的斗争，利用某些局部有利条件，能够给当地资本家和地方官僚确实形成威胁、确实迫使其付出实际代价时（如工人的罢工和怠工给资本家带来经济损失、如利用资产阶级内部特定矛盾威胁到地方官僚的政绩和升迁），才有可能迫使资本家和官僚做出让步；而社会舆论的动员和“声援”则一般不具备这样的能力。

佳士斗争的主要积极分子对于阶级斗争的这一基本现实没有认识，而将全部幻想寄托于社会舆论的动员上；失败后，又将全部责任推诿于社会舆论动员不够或者别人对他们“声援”不够，却从来没有冷静下来，认真思考一下：武装到牙齿的资产阶级难道害怕“声援”吗？盲目“声援”的结果，是左派力量的一大部分完全暴露在资产阶级面前，而青年左派的很大一支几乎全军覆没，在资产阶级镇压面前垮了下来。

那么，中国“马列毛左派”的正确道路在哪里呢？中国无产阶级解放的道路，又在哪里呢？

作为向往革命的进步青年，如果已经下定决心，要走马列毛主义的道路，要将自己的一生献给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那么就不能不积极思考和准备无产阶级革命的中心问题——政权问题。口头上大谈“革命”，可是满脑子想的都

是工会、都是资产阶级民主，这样的精神状态是永远也看不到无产阶级革命的前景的。要了解革命的道理，就要敢于思考现存社会秩序灭亡的问题。

马列毛主义认识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的方法论是历史唯物主义。在历史唯物主义看来，一个社会或者一个社会的某个阶段，其产生、发展和灭亡，要从其内在矛盾中去寻找规律。中国无产阶级的发展壮大，主要是中国资本主义矛盾在客观上发展的产物，而不是少数“先进”人物从外面灌输的结果。

从马克思、恩格斯发表《共产党宣言》到现在已经快两个世纪了，世界无产阶级还没有胜利。所以，仅仅照搬外国的经验，照搬欧美韩港台的经验，照搬资产阶级民主条件下的经验，是找不到中国革命胜利的出路的。要了解中国无产阶级胜利的条件和历史可能性，我们就必须认真分析和了解中国资本主义的特殊矛盾，了解中国资产阶级特有的弱点，了解中国无产阶级特有的优点。

如上所述，作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一个半外围国家，中国经济参加国际资本主义分工的主要部门是出口制造业，而出口制造业又建立在对大量廉价劳动力残酷剥削的基础上。所以，在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必然要造成一个数量庞大的工业无产阶级，而中国的无产阶级又必然要逐步地组织起来并且按照在实践中行之有效的对资产阶级展开越来越有力的斗争。

中国无产阶级斗争的方式，不是照搬外国的经验，也不是照搬社会运动的教科书，而是根据中国工人运动自己的传统，结合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况，不断地争取局部的进步和胜利。以往的斗争经验证明，在资产阶级专制统治条件下，常规的、公开的、永久性的工人组织方式是不适合中国工人阶级斗争需要的。实践也证明，中国工人阶级的斗争没有必要照搬资产阶级民主条件下的那些组织方式。比如通钢工人的斗争，就是在表面自发的形式下而形成的有高度组织性的斗争，并给资产阶级以沉重打击，违反了一切资产阶级法律，当局还不敢打击报复。只要局部条件有利，工人斗争有力量，“违法”也不妨碍工人斗争的局部胜利。反之，如果当时当地条件不利，工人没有发动起来，最“合法”的请愿也会被资产阶级无情镇压。在新工人斗争中，也有大量的实际例子。在日常劳动和长期的斗争实践中，逐渐产生一些在工人中有威信的优秀分子；当出现对工人有利、对资本家不利的特定时机时，这些优秀分子便将工人发动起来，通过采取一些能够给资本家带来实际损失和代价的行动，迫使资本家做出让步。由于这种发动，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而采取隐蔽、半公开或公开等不同方式，又可以最大限度地限制资本家打击报复给工人斗争带来的危害（在现阶段，要完全避免这种危害，仍然是不可能的）。

中国工人的这些斗争方式，看起来似乎原始，似乎不够正规，但却是实在有效的。中国近年来的阶级斗争形势，已经与以往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我们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结合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具体实际，抱着科学的和实事求是的态度，经过若干年认真的、负责任的研究，可以认定：目前总的形势是，工人阶级的斗争力量在上升，资产阶级剥削的困难在增

加，资本主义积累的矛盾在深化。中国工人阶级斗争力量的上升，不仅反映在无产阶级数量的增长，而且反映在工人斗争次数的增加和规模的扩大，并且反映在中国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平均剥削率近年来出现了下降的情况（这又进一步反映在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平均利润率正在趋于下降）。这些矛盾，发展到一定程度，工人阶级斗争力量上升的程度，就必然要突破中国资本主义积累秩序所能容纳的狭隘界限，中国资本主义的危机就不可避免。

从半外围国家的历史经验来看，中国目前正在发生的阶级力量对比变化的情况，不是历史上孤立的情况，而是过去在一些半外围国家曾经反复出现过的情况：在半外围资本主义发展的一定阶段，由于无产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壮大，无产阶级的斗争和小资产阶级的社会运动都将发生高涨。作为半外围国家，既不能在高技术领域与核心国家竞争，又不能在低成本领域与外围国家竞争，从而其资本积累的要求与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社会和政治要求发生尖锐不可调和的冲突，进而陷入积累危机和政治危机。前苏联、东欧、拉美诸国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开始，南欧诸国在上世纪七十年代，韩、台在上世纪八十年代，都发生过这样的情况。不过，以往在上述半外围国家，这样的积累危机最后都以对资产阶级有利的某种方式而得到解决。

就半外围国家阶级斗争的发展前途来说，当工人阶级力量的上升发展到与资本主义积累秩序尖锐不可调和时，无非是三种解决办法。或者，该半外围国家设法上升为核心国家，通过剥削世界其他地方来攫取超额剩余价值，从而缓和内部阶级矛盾（如日、韩、台、港）。某些无法上升到核心国家的半外围国家因为拥有丰富的高价值自然资源，如石油天然气，也可以在某些时期通过攫取资源租金来缓和内部矛盾（如俄罗斯、巴西、中东海湾国家）。或者，资产阶级向工人阶级全力进攻，并结合将部分资本大规模转移到劳动力和资源更加廉价地区等办法，在打垮工人阶级以后，重建资本主义积累秩序（这是美、欧资产阶级在新自由主义时期实行的策略；但是在半外围国家条件下，还没有先例）。或者，资产阶级无力解决其积累危机，也无力解决其政治和社会矛盾，无产阶级领导其他各劳动阶级打倒资产阶级统治，并按照自己的意志来改造社会（这将是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未来的前途）。

我们认为，就中国的具体情况来说，无产阶级已经发展壮大到资产阶级无法轻易打垮的地步。由于中国巨大的人口和经济规模，也不可能在中国以外找到足够大的有丰富廉价劳动力且具备资本积累其他必需条件的地区。同样由于中国巨大的人口规模，并基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两级分化的基本规律（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只能是一个少数人剥削绝大多数人的体系，而绝不可能是一个多数人剥削少数人或者世界上半数人口剥削另外一半人口的体系），中国永远不可能成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核心国家。中国资本主义经济也不掌握某些半外围国家所拥有的丰富自然资源。恰恰相反，中国资本主义经济面临着尖锐的资源和环境矛盾。由于这样几点理由，我们认为，中国资产阶级将无法解决其未

来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决定中国未来历史命运的钥匙，必然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落到无产阶级手中。

各青年左派小组的工作，应当严格区分资产阶级正常统治时期与革命形势来临以后两种不同的情况。在资产阶级正常统治时期，实践方面的工作，要以各种各样的方式与工人和其他劳动群众相结合，但这种结合的主要目的，不是“启发”、“领导”、“发动”工人斗争，而是努力学习工人和其他劳动群众在实际斗争中发展出来的行之有效的办法和经验，与工人和其他劳动群众中的优秀分子相互学习，先当学生，然后才能当先生。要认识并且相信，阶级斗争的主要推动力不是来自少数知识分子的“灌输”，而是资本主义客观矛盾发展的结果。少数有理想、有激情的青年，面对资产阶级庞大国家机器的镇压、面对资产阶级媒体的污蔑，是没有多少力量的；但是在反对资本主义的剥削和压迫中经历了千锤百炼的亿万工人阶级，则蕴藏着无坚不摧的伟大力量。

在理论工作方面，青年同志不仅要学习马列毛经典，而且要有所继承，有所批判，有所发展，要了解世界范围阶级斗争的新发展、新动向，要围绕着在当前中国具体条件下如何争取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这一中心问题。凡是无助于解决这一中心问题的，如“中帝论”等错误思潮，要加以摒弃和批判。要解决这一中心问题，就必须正确地认识中国资本主义的特殊矛盾，找到中国资产阶级的特殊弱点，找到中国无产阶级的特殊优点。只有这样，我们的前途才是光明的，而不是灰暗的；只有这样，广大青年同志的革命信心，才会是坚定持久的，而不是建立在小资产阶级狂热的沙滩之上。

关于未来的革命形势和具体路径，这有待于未来阶级斗争的实践，一切理论推测在现阶段都不免于盲目和苍白无力。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可以根据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和阶级斗争的特点做出这样几种估计。未来的中国革命，既不会是走十月革命的道路（城市武装起义），也不会是走井冈山的道路（农村包围城市的持久人民战争），也不会先经历一个长期稳定的资产阶级民主阶段。资产阶级民主长期稳定存在的条件，是资本主义积累的矛盾不十分尖锐，从而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各阶级之间、资产阶级内部各集团之间，存在着相对稳定妥协的政治条件。由于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建立在对广大廉价劳动力残酷剥削的基础上，中国资本主义在其正常发展时期不具备这样的条件。当积累危机爆发以后，由于资产阶级无法克服未来的积累危机，还是不具备建立长期稳定资产阶级民主的条件。也就是说，中国的马列毛左派要下定这样的决心，不要幻想资产阶级会有朝一日，给左派和无产阶级提供充分的、形式上的政治自由，使得我们可以从容地、和平民主地、不付个人代价地争取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事实上，到目前为止，凡是有稳定资产阶级民主的国家，没有一个曾经实现向着社会主义的过渡。

中国是历史悠久的国家，中国的劳动人民有长期的、丰富的革命斗争传统。我们在中国搞革命，一方面要了解外国劳动人民斗争的好经验，但是首先要重视、发扬中国革命自己的好传统。中国历史上，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事情是反复发生的。中原王朝衰落以后，天下大乱、群雄逐鹿的形势在历史上是常见的。当代各资本主义国家中，由于内外矛盾尖锐，而导致中央政权瓦解、地方豪强兴起的情况，也不乏其例。

在未来积累危机与革命形势发生以后，无产阶级的力量还不足以一下子取得全国胜利，而必然有一个比较长时期的、跨度几十年的过渡时期。在这个过渡时期中，无产阶级将完成从经济斗争到真正的政治斗争的过渡（无产阶级的真正的政治斗争，必然是以政权为目的的，是以无产阶级专政为目的的，而不是以争取工会等资产阶级民主权利为目的；后者，实际上是小资产阶级政治斗争的目标），无产阶级将组成为政党，并在政治上逐步成熟起来，并领导其他各阶级的劳动群众，最终成为全国范围的领导力量。

但是，在无产阶级成为全国范围的领导力量之前，没有根据地是不行的。在工业化资本主义的条件下，这样的根据地不是像井冈山、江西苏区、陕甘宁边区那样建立在土地革命基础上的农村根据地，而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暂时仍然被外部资本主义包围着的地方工农民主政权。这样的地方工农民主政权，在资产阶级正常统治时期，当然是无法存在的。但是在积累危机爆发且资产阶级无力克服的条件下，在资产阶级的中央政权遭到决定性削弱以后，则是完全可以存在的。中国是个大国，各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资产阶级力量在全国范围的分布不是均齐划一的，而是有强有弱的。在那些资产阶级力量薄弱而无产阶级力量又相对强大的地方，在资本主义积累危机全面爆发、资产阶级统治全面动摇的条件下，首先出现一批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民主政权，是完全可能的。

那么，这样的资产阶级力量薄弱而无产阶级力量又相对强大的地方，会是在沿海各地区吗？我们认为不是的。沿海地区，恰恰是资产阶级力量比较强大的地方。那里，虽然无产阶级的数量也比较众多，但是与小资产阶级的数量、半无产阶级的数量相比，并不占绝对优势。由于中国资本主义的出口制造业大量雇佣外来“农民工”的特点，在沿海各地方的无产阶级与当地群众之间，还存在着特殊的地域矛盾。这种地域矛盾，是尤其不利于政权建设的。所以，在我们看来，虽然在资本主义正常发展时期，沿海各地区往往是无产阶级经济斗争的重心（这一情况，随着资本主义工业向内地转移，也在发生变化），却很可能不是未来无产阶级政治斗争的重心。

中国是一个十四亿人口的大国。大多数的劳动群众来自于内地诸省市，生活、劳动于内地诸省市。中国的马列毛左派、青年积极分子，要在思想上和实践上重视内地的广大劳动群众。有抱负有主见的青年同志，要敢于“反潮

流”，敢于做别人不屑做、不敢做的工作，敢于承担历史的责任，到内地去做长期、基础的群众工作，准备迎接未来的大变化。

我们建议，各青年左派小组，以此次佳士工人斗争失败为契机，深入全面地总结过去数年来青年左派工作的经验教训。要努力回答这样几个问题：中国工人运动的发展主要是靠少数“先进”分子从外部灌输，还是资本主义矛盾在客观上发展的结果？如果是后者，造成中国工人运动发展的资本主义矛盾有哪些？哪些是属于所有资本主义社会都存在的一般矛盾，哪些是属于中国资本主义的特殊矛盾？

中国工人阶级斗争的前途是什么？是资本主义范围内的改良、“民主”、“集体谈判”，还是无产阶级革命？两者与中国资本主义的特殊矛盾又有着怎样的关系？关于“中帝论”问题，要探讨和分析，如果中国是“帝国主义”，到底是指明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还是断绝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希望？

关于青年左派积极分子的任务，要讨论，作为小资产阶级出身的青年左派积极分子，有哪些不可避免的阶级局限性？为了克服这些局限性，怎样到无产阶级中去，向无产阶级学习，先当学生，后当先生？

在资产阶级正常统治时期，离开校园以后的青年积极分子，无法回避劳动力再生产的问题。在革命形势来临以前，离开校园的青年积极分子，向何处去？是继续不顾一切地、一窝蜂地、赶时髦随大流地涌到沿海地区向资产阶级请愿搞工会，还是到全国各地的广阔天地中去，到广大内地去，做长期普遍的群众工作，迎接未来的伟大斗争？

作为小资产阶级出身的青年积极分子，要正视自己的阶级出身，要经常检讨自己有没有个人英雄主义、有没有个人野心恶性膨胀、有没有“唯我独革”、有没有脱离群众、有没有把个人和小集团的利益摆到了阶级利益之上。

以上建议和不成熟意见，希望得到一切青年马列毛左派积极分子的思考和响应。红色中国网工作组，愿意在无产阶级革命的立场上，虚心听取并答复来自各小组、各派别的意见，开展全面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共同改造，共同进步。

严元章同志与“八青年关注团”的斗争经验 (2019年1月5日)

远航一号

指挥员的正确的部署来源于正确的决心，正确的决心来源于正确的判断，正确的判断来源于周到的和必要的侦察，和对于各种侦察材料的联贯起来的思索。指挥员使用一切可能的和必要的侦察手段，将侦察得来的敌方情况的各种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思索，然后将自己方面的情况加上，研究双方的对比和相互的关系，因而构成判断，定下决心，作出计划，——这是军事家在作出每一个战略、战役或战斗的计划之前的一个整个的认识情况的过程。粗心大意的军事家，不去这样做，把军事计划建立在一相情愿的基础之上，这种计划是空想的，不符合于实际的。鲁莽的专凭热情的军事家之所以不免于受敌人的欺骗，受敌人表面的或片面的情况的引诱，受自己部下不负责任的无知灼见的建议的鼓动，因而不免于碰壁，就是因为他们不知道或不愿意知道任何军事计划，是应该建立于必要的侦察和敌我情况及其相互关系的周密思索的基础之上的缘故。

毛主席，《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1936年）

佳士工人争取建立工会的斗争失败以后，在马列毛左派内部关于此次斗争经验教训的讨论中，很多同志都提出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在中国现在的政治条件下（资产阶级正常统治、政治专制），要不要进行公开合法斗争？怎样进行公开合法斗争？

首先，必须要澄清一个概念，公开斗争不等于合法斗争。合法斗争一般来说也是公开的，但是公开斗争却往往不是“合法”的。比如，在中国现在的政治条件下，绝大部分的工人斗争和群众维权斗争，必然要有大量普通群众参加，因而必然采取公开的形式。但是，这些斗争是“合法”的吗？虽然中国现行宪法承认公民有言论、集会、结社等自由。但是，在各种具体法律中（如《刑法》规定的颠覆国家政权罪、扰乱社会秩序罪等）、在中央政府颁布的各种“政策”和“意见”中、在各地方政府自行制定的各种法规中，实际上严厉限制人民群众的上述自由；而对于一切危害资产阶级财产权的“群体事件”，当局实际上是完全禁止，对于较大规模的群众斗争，则通常都要出动专政机关给予镇压。所以，中国目前绝大部分的群众斗争虽然都是公开的，但实际上都是不合法的，就是说，不合资产阶级的“法”。但是，这不等于说，群众斗争就不可以进行，更不是说，群众斗争不可以取得胜利。

这是因为，资产阶级国家使用专政机关的能力不是无限的，而是有代价、有条件的。由于财力人力的限制，资产阶级的专政机关在同一个时间能够动用的军力警力只有有限的数量；一个省的警察乃至武警如果遇到较大规模的群众斗争或者同时发生的多起群众斗争，往往就捉襟见肘。对于一般的群众斗争，除非有上级死命令，警察是否出动，还要看涉及斗争的资本家平常与地方政府的亲疏远近、“上供”多少。另外，虽然资产阶级国家的职能就是镇压劳动群众对资本家的反抗，但是对于其自身的“合法性”也不能完全不顾忌。这里所

说的“合法性”，不是法律条文上合法与否或者对于一般社会舆论的顾虑，而是指某一次具体镇压可能给资产阶级国家带来的长远的副作用。任何一次镇压，一方面可能取得维护一小部分资本家利益的直接效果，但是也不可避免地对于广大人民群众起着反面教育的作用，促使直接间接受到这次镇压影响的一部分群众抛弃对资产阶级国家的幻想，乃至成为未来变革的积极分子。对于这种反面教育的作用，资产阶级国家也不能不考虑，要尽可能地缩小它的范围和强度。所以，尽管资产阶级国家对于劳动群众的反抗总的来说是采取残酷镇压的政策，这种镇压，还是要受到资产阶级法律和“政策”的某些约束；比如，不到万不得已，不能出人命。由于上述的这几方面原因，如果在特定的条件下，群众能够充分发动起来，所动员的目标既是明确的又是有限的，其所要求的让步在资本家可以承受的范围内，而对于资产阶级国家来说，镇压的代价又比较大，那么，群众斗争就可以取得一定的胜利。

关于群众如何进行公开但不合法的斗争，在现实斗争中，无论是新老工人还是其他劳动群众都积累了大量经验，此处不再赘述。这里要谈的，是在当前中国的政治条件下，怎样进行合法斗争。首先要了解的是，在当前中国，为了争取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直接而迫切的利益，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必须抛弃合法斗争的幻想，必须坚决依靠当时当地群众的力量进行不合法但公开的斗争。但是，即使在现在的中国，仍然可以在一定的、特殊的条件下进行合法斗争。这里说的“合法”斗争，并不是纸面上合乎宪法和一般资产阶级法律的条文规定。在现在的中国，在纸面上是否合乎宪法和法律，与资产阶级国家在实际上会不会镇压只有十分间接且不确定的关系。对于这一点，一般有实际斗争经验的同志都懂得；但是，只受过书本教育的左翼青年却往往不懂。除此以外，常常以“非政府组织”等名义组织起来的小资产阶级自由派积极分子由于其不可克服的阶级局限性，也往往不懂，或者虽然懂得了，却无法应用其经验教训。

这里说的“合法”斗争，是特指，在当前中国的具体条件下，根据长期政治实践以及大量生活常识可以判断资产阶级国家一般不会镇压或者至少不会轻易镇压的那种群众斗争。下面就以2018年初围绕广州工业大学读书会“八青年”网上追逃问题所开展的斗争为例，来说明一下一次比较成功的合法斗争是怎样进行的。

严元章与“八青年关注团”斗争策略的形成

对于这次斗争的实际情况，许多左派同志仍然不了解。现在，为了说明当时的斗争经过，尤其为了与佳士斗争失败的情况相对照，以利总结经验教训，有必要把当时的一些实际情况讲出来。我们知道，在“八青年”斗争初期，是有左翼和自由派知识分子共同参与的。但是，到了2018年一月份，这次斗争就已经明确是由马列毛左派领导的。一月下旬号召成立“八青年关注团”的公开

倡议书是由古老、吴老、勤德老、景刚同志、时迈同志等左派领袖领衔发起的；但是，在具体工作中起领导作用的，实际上是严元章同志和左向前同志。特别是严元章同志，在确定此次斗争的基本策略方针上，发挥了决定性作用。（下面的内容，主要根据笔者个人记忆撰写而成，若干细节可能有不准确的地方，但是整个事件的基本脉络还是可以说清楚的；一切不准确或违反事实的地方，当然由笔者个人负责。）

说起严元章同志，很多青年同志还不了解，甚至还有人，以为他不过是一个关心老工人的普通积极分子，多年来“一事无成”。这样的认识，都是不正确的。严元章同志，在马列毛主义的队伍中，已经奋斗了二十多年，有着相当的理论素养和最丰富的实践经验，经历和处理过各种复杂情况，是中国工人运动中产生出来的第一流实践家。他的工作成绩，不仅许多同志了解，就是对方，在相当程度上也是承认的。过去，因为严元章同志本人的谦虚谨慎，我们对他的成绩宣传的不够。

在2017年下半年，广州工业大学读书会被广东番禺警方破坏，其中四人被捕，另外四人被列为网上追逃对象。此后，以左翼和自由派知识分子为主发出了一份措辞十分婉转、自由派立场较为突出的公开信。该公开信的呼吁重点，是要求解决作为原北大学子的张云帆的个人问题。公开信发出后不久，张云帆等四人被取保候审。虽然我们到现在还不能十分肯定，当时当局“从轻”处理张云帆等四人是出于什么考虑。但是，可以推断，当时当局并未把“八青年”当作重要而危险的活动家，而认为他们只是一般的热心青年。拘捕和释放，都是地方警察当局做出的决定。对于地方当局来说，纯政治性案件占用他们的大量警力资源，但是与他们的切身利益并无直接关系，所以在一定程度上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态度（这与直接威胁当地资本家利益的工人斗争有很大不同）。

张云帆等四人被取保候审后，又联络曾经在第一封公开信上联署的左右派知识分子，希望他们继续呼吁当局撤销对他们的“取保候审”措施。但是，原来在公开信上签名的知识分子都不抱积极态度，劝他们“见好就收”。在张云帆等四处碰壁以后，他们先是与正在北京的左向前同志取得了联系；经左介绍，由青鹰社的主要负责人面见严元章同志（严元章同志当时并不知道来人就是青鹰社负责人，来者用的是化名，但表示可以代表“八青年”）。在那次谈话中，严元章同志提出了分三步走的斗争策略。

第一步，“八青年”应该公开打出马列毛主义的旗号，不要再依靠自由派知识分子，而要全心全意依靠左派群众。具体宣传策略上，不要突出张云帆及其北大背景，而要全面宣传“八青年”；公开的斗争目标，是要撤销取保候审和网上追逃。

第二步，在对“八青年”做全面宣传和发动左派群众的基础上，成立“八青年关注团”，发表公开信。

最关键的是第三步（但这最后一步后来并没有落实）。在公开信发表数日以后，由当时被网上追逃的四名同志主动前往公安局“投案”。

为什么要有第三步，这是当时一些左派同志所不理解的。在内部交流中，严元章同志做了解释。根据以往的经验，没有理由认为，仅仅因为左派群众的公开信（无论联署者中包含多少“名人”），当局就会做出让步，哪怕是像撤销网上追逃那样微小的让步。所以，这次斗争的主要目的，对外是争取撤销取保候审和网上追逃，而实际的主要目的，只能是以此为契机，扩大马列毛左派的政治影响，不仅争得工人运动的领导权，而且从自由派手中夺得以争取一般资产阶级政治自由为目标的斗争的领导权。

为了真正达到这个目的，仅仅有前两步是不够的，而必须要有第三步。四青年如果果然去“投案”，我们估计了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也是最有利的情况，四青年去了以后，出乎对方意料之外，对方决定不抓，只是要求四人办理一定手续，然后释放。如此，则斗争取得胜利，四人免除了后顾之忧，左派政治影响扩大。第二种情况，四青年去了以后，随即被羁押。如果出现了这种情况，我们分析，读书会事件本身，尚未被当局认定为严重案件，且案件的“主犯”已经被取保候审，那么作为被网上追逃的四名“从犯”无论如何是不会“从重”处理的。所以，有很大的可能，四人被关一个短时期以后，当局便将他们草草结案、“教育释放”了事。

如果发生了第二种情况，一方面左派可以扩大宣传，另一方面，被捕四人可以得到锻炼，而他们不畏网上追逃、主动“投案”的英雄气概将大大鼓舞左派群众和进步青年，对于马列毛左派的政治影响十分有利。所以，无论是第一种情况还是第二种情况，左派都可以取得胜利。

这里要说明一下，有的缺乏政治经验而尚未摆脱小资产阶级矫揉造作的青年朋友，可能会指责严元章同志冷酷无情、利用青年同志的牺牲来吃“人血馒头”。要奋斗，就要有牺牲。谭嗣同先生曾经说过，未曾有过革命而不流血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吃“人血馒头”是世界革命的一般规律。当然，由于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多年来的斗争，资产阶级的统治已经比以往要“文明”一些了。即使在资产阶级专制统治下，做进步事业，虽然要冒牢狱之灾的危险，但一般来说已经没有性命之虞了。仅就牢狱之灾来说，严元章同志年轻时，曾经两度被捕，严元章同志的战友也有狱中斗争的经验。所以，要说吃“人血馒头”，那上面也有严元章同志本人的几滴血。

即使从小资产阶级个人英雄主义的角度来说，如果四青年果然去主动“投案”了，出名、当英雄、积累政治资本的也是四青年，而严元章同志不过是一位不被海内外媒体提及的无名英雄罢了。

要在资产阶级专制统治条件下做进步事业，完全没有牺牲是不可能的。为了事业的个人牺牲在许多时候是必要的，但是，要把牺牲的程度限制到最小，而把牺牲所能换来的胜利争取到最大。我们也不是完全反对宣传个人，英雄往

往是普通群众认识并了解一个政治派别最直接、最具体的窗口。只要对扩大整个马列毛左派的政治影响有利，而被宣传的同志又能够摆正自己的位置、正确地对待荣誉，就可以并且应该大力宣传在实际斗争中产生出来的左派英雄人物。在当时那样的情况下，如果能够以四名同志被短时间关押为代价，换得左派在宣传方面的巨大胜利，在政治上是有利的；而一个短时期的狱中斗争经历，对于四名同志今后的成长，也将发挥难以估量的积极作用。

“八青年关注团”的前前后后

上述斗争方案确定后，在北京的“八青年”代表也赞同。随后，便开始了全面宣传“八青年”的工作。这项工作，是从张云帆的“我的自白书”发表开始的。这份“我的自白书”在发表之前，曾经严元章同志多次修改。

在这一时期的宣传工作中，“八青年”十分积极，动员了他们本身以及他们背后的青年团体的各种技术和宣传手段。“八青年”的事迹迅速传播，广大左派群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

接下来，严元章、左向前等同志与几位德高望重的老同志、左派队伍中各个小组的代表人物直接联系，说明此次斗争的重要意义，争取到了所有起主要作用的老同志及左派内部除求是系以外其他各小组的支持。马列毛左派形成了空前的团结。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公开发起了“八青年关注团”。

“八青年关注团”的倡议书是由严元章等同志起草的，起草后，征得了三十几名发起人的同意。出于策略需要，在发起“八青年关注团”的倡议书中，在若干地方，引用了习近平先生的言论。此外，为了给整个计划中的第三步做铺垫，倡议书中提及，“关注团”将劝说被网上追逃的青年前往北京市公安局“主动说明情况”（我们提到北京市公安局，也是考虑到，万一发生不利情况，北京市的看守所比其他地方要“规矩”一些）。对此，一些青年同志表示不理解，在倡议书即将发表的当夜，还横生枝节，说我们没有“资格”替青年同志做决定（指前往公安局），而他们倒好像有“资格”可以强行修改已经由三十几名社会知名人士签署同意的倡议书。当时在北京的同志拿不定主意，严元章同志征求了其他同志的意见以后，坚决顶住了个别青年的无理要求。倡议书终于得以正常发表。

在倡议书发表后，张云帆突然代表“八青年”提出意见，认为我们软弱投降、青年同志接受不了。他们所掌握的宣传手段，对于这份倡议书，采取消极怠工的办法，不推广不宣传。由于他们的抵制，使得“关注团”倡议书发表后，在最初几天，签名联署的进度不如预期。这时，左向前同志做了大量工作，扭转了被动局面。数日后，倡议书获得了1500名各界群众的联署参加。

2018年一月底，倡议书发表后，按计划应当以“关注团”名义发表公开信。关于致公开信的对象，我们考虑，级别不宜太低，那样没有政治影响，但是也不宜太高，那样如果解决不了问题，只会给外界造成左派没有力量的印

象。所以后来的公开信是致公安部长，职位不低但也不是太高，且取保候审、网上追逃等都属公安部管辖范围；我们致信公安部，名正言顺。

致公安部信，由严元章等同志起草，然后由在京的绝大部分“关注团”成员参加的大会通过。在会上，经部分老同志要求，决定该信只递交公安部，不在网上公开。以上工作做完后，在北京的同志准备安排向公安部递交。这时，远航一号同志提醒，这是以“关注团”名义递交的信，要替联署参加“关注团”的全体同志负责；尽管信件已经在京“关注团”成员大会通过，但并未经全体“关注团”成员同意；我们不能为了单纯图方便，就违反工作原则。于是，掌握关注团信箱的同志紧急将已经在京“关注团”成员大会通过的致公安部信草稿发给全体“关注团”成员，并特别说明，凡是不同意的可以退出“关注团”。后来，除个别几人声明不参加这封信（因而自动退出“关注团”）以外，绝大多数同志都参加了这封信的联署。在北京的同志，根据“关注团”成员表态的情况对联署名单做了修改，随后，派代表向公安部信访处递交了联名信。

在完成了向公安部递交联名信的工作以后，本来，按照原计划，要进一步加大对“八青年”的宣传力度，然后被网上追逃的四青年要大张旗鼓地前往北京市公安局“投案”。严元章、左向前同志多次向“八青年”陈述了这样做的好处以及这样做了以后，风险、代价很可能极小。“八青年”当面也表示同意，但每次都以某种借口拖延下来。此事只好作罢。

原定策略中关键的第三步没有能够实现。这样，“关注团”事实上就已经失去了主动手段，而只能被动等待对方的反应。与此同时，为了维持宣传力度，同时也为了解决“八青年”所面临的一些实际问题，决定由“关注团”出面发起为支持“八青年”坚持斗争、维持生活而进行的捐款活动。当时，为了确保捐款用于正当的目的，还指定勤德老与另外一位老同志监督捐款的使用。

到了春节前夕，广东警方派人来北京，联系被网上追逃的四青年，希望他们办理一定的手续，然后给他们结案。当时四青年坚决拒绝。到了春节期间，“八青年”从网上发现，原来对四青年的网上追逃已经撤销了；此前，广东警方通过一个中间人给“八青年”中一位主要人物也传递了同样的信息。

春节后，严元章等同志通过各种渠道，逐渐了解到，四青年的网上追逃已经撤销，便通过关注团信箱将此消息通知了全体“关注团”成员。这一消息发出后，“八青年”中的主要负责人大为不满，向严元章等同志提出“严正异议”。他们认为，广东警方撤销网上追逃是左翼“在舆论上对广东警方形成巨大压力”导致的结果，左派已经“占据十分主动”的地位；所以，决不能“偃旗息鼓”，而要“乘胜追击”、“宜将剩勇追穷寇”；要逼迫广东警方公开告知网上追逃已经撤销，这样“八青年”才能得到“光明正大的合法消息源”，使得“撤逃事件有一个高度政治性的光明正大的收尾”。他们认为，只要“关注团”再发公开信，左派群众再纷纷致电番禺警方，番禺警方就一定会“惊惧

于”我们的压力，使得左派获得“政治上的全面胜利”，进而还能争取到“整个青年左翼今后的发展空间”。基于这个估计，“八青年”的主要负责人认为，应当对“关注团”封锁消息，“按照不知情持续斗争”；而严元章等同志向“关注团”通报情况，破坏了他们的计划，是没有与他们“统一步调，统一行动”，还说，如果严元章等同志不能与他们“意见统一，步调一致”，将涉及到严元章等同志“在左翼中的声望和名节”。

受严元章同志委托，远航一号同志给“八青年”代表回信，驳斥了“八青年”关于所谓“声望和名节”的荒唐论调。远航一号同志指出，虽然对方主动撤销网上追逃是出乎我们意料之外的，但这并不表示双方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变化。为了“八青年”斗争，左派已经动员了几乎全部的可以公开的力量；而“八青年”捐款又在事实上吸收了左派的全部机动财力。如此大的左派力量长时间地暴露在资产阶级面前，其前途是很危险的。远航一号同志的警告，在几个月以后，不幸而言中（我们将在近日公开发表远航一号同志的这封信）。

在意识到严元章等同志无法接受他们的所谓“乘胜追击”的主张以后，“八青年”的主要负责人单方面召集在北京的部分“关注团”成员开会，然后想以“关注团”的名义发表致公安部的公开信，提出要求广东警方道歉、严惩迫害“八青年”的责任人、赔偿“八青年”损失等不切实际的要求。严元章等同志了解到有关情况后，认为，以“关注团”名义发出的公开信，不可以轻易使用；频繁发出公开信，提出一系列不切实际的要求，而又实现不了，不但不能显示左派的力量，反而会破坏左派在广大群众中的威信。

当时事出紧急，远航一号同志不得不采取非常措施，在红色中国网上公开发文，明确表示，一切未经正当程序、未经“关注团”全体成员同意的文件均不得以“关注团”的名义发布。经远航一号同志警告以后，“八青年”的主要负责人有所克制，后来他们以自己的名义向公安部递交了信件。

到了三月份，严元章、左向前同志多次提醒“八青年”，应该公布捐款的使用情况，但是“八青年”的主要负责人迟迟不办，后来只公布了一个粗略的使用情况。在公布了“八青年”捐款的粗略使用情况以后，关注团信箱停止使用，“关注团”在事实上停止了工作。后来，听说“八青年”内部对于捐款的使用分歧很大，是造成“八青年”分裂的原因之一。据我们了解的情况，如果“八青年”的主要负责人在捐款使用上存在着一定的问题，这种问题应当不是某些个人的滥用（就是说，不存在个人贪污行为），而是该负责人背后的某个组织从宗派主义的立场出发占用了这笔捐款。

“佳士声援团”斗争的失败：我们所了解的一些情况

虽然“八青年”（特别是他们的主要负责人）在2018年初的斗争中存在着种种问题，但总的来说，他们是站在马列毛主义的立场上、作为整个马列毛左派的一部分与当局进行了斗争，并且取得了一定的胜利。但是，“八青年”主

要负责人在“关注团”斗争中所暴露出来的一些问题，后来不但没有得到解决，反而在短时间内恶性膨胀，并终于导致了“佳士声援团”斗争的失败。

关于佳士工人的斗争和“佳士声援团”斗争的整个情况，严元章等同志不能说完全了解。但是，对于整个斗争，严元章等同志一直是关注的，与“声援团”的代表保持着交流，并尽了最大努力来减少“声援团”的损失。这里，仅把严元章等同志所了解的一部分情况做一个介绍。

如红色中国网工作组在致青年马列毛左派积极分子的建议书中所指出的，在中国现在的政治条件下，一般来说，以建立公开的、由工人民主控制的工会为直接目标的斗争是必然要失败的。所以，佳士工人要求组建工会的斗争，无论是佳士工人自发要求的产物还是经过左派青年“灌输”的结果，都是不可能成功的。另一方面，在珠三角地区，如果组织得当、目标合理，以具体经济利益为目标的工人斗争仍然可以取得一定的胜利。比如，“声援团”大力宣传的尚杨雪同志，原来并非佳士工人，也非“声援团”成员，这次是因为替佳士工人打抱不平才与佳士的工人积极分子一起被捕的。在被捕前，尚杨雪同志曾经领导另外一个工厂的工人争取迁厂补偿并取得了胜利。可见，如果佳士工人能够以佳士资本家所谓“十八禁”中最为广大工人群众痛恨的某几项为主要斗争目标，是有可能给资本家造成一定的打击并给工人带来一些具体利益的。所谓没有“工会”，就不能搞斗争，这是一部分“声援团”同志在斗争已经失败以后仍然拒绝总结经验教训的托词。

在十几名佳士工人积极分子被当地派出所抓走以后，应当说，佳士工人争取建立自主工会的斗争已经失败。这时，“八青年”背后的那个组织，不是深刻总结经验教训，反而决定下更大的赌注，贸然决定发动整个左派来开展声援。

对于大多数左派同志来说，这件事发生得很突然。原“八青年”主要负责人利用“关注团”时期建立的关系，给几位发挥主要作用的老同志、乌有之乡还有严元章同志打电话，并广发信件，要求所有左派积极分子表态声援佳士工人。他们既不说明斗争的目的和计划，也不准备与左派各小组协调行动，只是单方面地要求别人无条件支持、无条件服从他们的调遣，谁不听从，谁就是“不革命”。许多左派同志在仓促之间表态支持，也有许多左派同志没有表态。然后，在几位老同志和严元章同志都不知情的情况下，他们就被宣布为是“佳士工人声援团”排名最靠前的几位成员。从此以后，原“八青年”背后的那个组织就打着“声援团”的名义随意发通知、发文件、发公开信，从来也没有征求名义上是“声援团”主要成员的几位同志的意见。所以，所谓“声援团”并非像“关注团”那样，有广泛的左派群众基础，也没有正当的工作原则和工作方法，而只不过是原“八青年”背后那个组织用来对外宣传的一个外壳罢了。

到了八月初，“声援团”的颓势已显。严元章同志很着急。虽然严元章等同志从一开始就不赞成“声援团”的错误路线，但是，严元章同志指出，这些青年同志都是革命的宝贵财富，我们要尽最大的努力，能减少一分损失就减少一分损失。当时，严元章等同志已经意识到，“声援团”的斗争形势已经好比1989年“六四”以前的情况，镇压迫在眉睫。严元章同志尽了最大努力，动员了他在体制内的关系，希望通过谈判的方法来尽可能实现声援学生的和平撤退。令人遗憾的是，严元章等同志始终无法联系到“声援团”的实际负责人，谈判的尝试无疾而终（他们的“严密组织”，瞒不了敌人，但是专门瞒自己的同志，左派同志谁也不清楚他们那里到底谁说话算数，有重大问题该找谁商量）。八月中旬，古老、严元章、原“八青年”主要负责人开会。古老明确批评了“声援团”在群众没有发动起来的情况下、盲目扩大“声援”；严元章同志建议“声援团”能够主动撤退、减少损失。原“八青年”的主要负责人在明确意识到斗争已经失败的情况下，仍然强行坚持全国各地的左派学生团体前往深圳“声援”，终于导致这些积极分子在七月底的镇压中全军覆没。

八月底镇压后，“声援团”仍不放弃其冒进路线，一面指责左派同志没有为了他们“挺身而出”，一面自我评价“越战越强”，要对“广东黑警”开展“乘胜追击”，结果导致了更大范围的镇压和更多的损失。

在资产阶级专制统治条件下怎样进行“合法斗争”

中国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以往的斗争经验表明，即使在资产阶级专制统治下，劳动群众不仅可以为了争取自身的经济和社会利益、反抗压迫和剥削而开展斗争，而且还可以取得相当的胜利。这样的斗争，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既是公开的，又是“非法”的。这种“非法”，有的是形式上非法，即直接违反资产阶级的法律条文；有的是形式上不非法，但是根据社会经验和生活常识，人们都知道资产阶级政府是必然要设法镇压的。但是，只要当时当地的阶级力量对比对劳动群众有利，即使“非法”的斗争也可以取得胜利。

在某些特殊的条件下，工人阶级、其他劳动群众和小资产阶级，也有可能为了某些目的而进行合法的斗争。合法斗争的前提，不是在形式上是否合乎资产阶级的法律条文，而关键是造成资产阶级不镇压或者不扩大镇压的条件。在“八青年关注团”的斗争中，严元章等同志实行了正确的斗争策略，那就是，在表面上以请愿的方式承认资产阶级当局的合法性（引用习言论），同时在外宣传中，将“八青年”包装为虽然信奉马列毛主义但是主要从事社会公益、在政治上对当局无威胁的天真青年。虽然制定了这样的斗争策略，严元章等同志仍然认识到，仅仅依靠公开信和社会舆论是不可能真正给当局造成压力的；公开信和社会舆论的主要作用是扩大马列毛主义的宣传，所以左派和“八青年”必须做好最坏的准备，即四人主动去“投案”。但是，由于采取了上述的

正确的斗争策略，就可以保证，即使在最坏的情况下，左派和“八青年”的损失也是十分有限的乃至微小的。

相比之下，佳士工人的建会斗争已经直接危害到了资本家的利益，而“佳士声援团”的斗争则直接威胁到了深圳、广州一带的资产阶级统治秩序。在此之前，“八青年”以及后来主要由原“八青年”主要负责人控制的时代先锋的高调宣传已经将自己的“革命”底色暴露无疑。在这样的情况下，合法斗争的条件已经不复存在了。“声援团”同志的真实面目已经暴露了，资产阶级当局已经识别了他们的企图和目标，到了这个时候，再涂多少层保护色都没有用了。

令人唏嘘的是，正是在“声援团”被镇压已成定局、合法斗争的条件已经完全不具备的时候，“声援团”的同志反而越发自欺欺人地相信自己所进行的是“合法”斗争。他们放下身段，用各种各样恳求和哀婉的文字向资产阶级的“中央”呼吁，乃至回顾起青鹰社某负责人被“中央领导”“亲切接见”的情形。相比起“八青年关注团”时期，他们对于在倡议书中引用习先生的一些言论都感到十分厌恶、不能容忍，真是不可同日而语。

在资产阶级正常统治时期、在革命形势来临以前的整个时期，无论是非法斗争还是合法斗争，面对的都是占优势地位的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可以利用一定的局部、暂时的有利条件争取到某些斗争的胜利，但是这样的有利条件毕竟是局部的、暂时的。所以，在资产阶级正常统治条件下的非法斗争和合法斗争，都必须有明确的斗争目标，而斗争目标又必须是有限的，既要争取到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的一部分利益，又要避免触及对方的根本利益。作为整个力量对比占弱势的一方，要达到自己的目的，准确地评估当时当地的力量对比、随时掌握斗争的主动权，是斗争胜利的关键。

在“八青年关注团”的斗争中，严元章等同志在一开始就确立了以扩大马列毛主义的宣传和政治影响为斗争的最基本的目标（即最低目标），而以争取广东警方撤销对四青年网上追逃为最高目标。以前者为最低目标，是因为前者的主动权完全把握在我们手里。以后者为最高目标，是因为我们不是广东警方的参谋长，撤销不撤销网上追逃，这个主动权不掌握在我们手里，而完全掌握在对方手里。但是，这个让步，对于对方来说，并不是要紧的、致命的，所以在一定条件下是有可能发生的。但是，任何超出撤销网上追逃的各种不切实际的要求，则是不能实现的，反而会使左派陷入被动。比如，哪怕是要求广东警方公开道歉，如果番禺派出所长真的这样做了，他的派出所长就不要干了；你提出这样的要求，对方拼了命也要跟你对抗到底。

在实际斗争中，虽然受到一些干扰，第一步和第二步都基本按原计划进行。但是，当“八青年”中的四青年拒绝实行第三步以后，“关注团”实际上已经部分地丧失了主动权。如果对方坚持不撤销网上追逃，我们没有别的好办法，只有选择适当时机，组织撤退，结束“关注团”工作。但是，接下来，对

方犯了错误，暗中撤销了网上追逃。这样，我们的最低和最高目标都得到了实现，主动权又回到我们手中。重新掌握主动权以后，把握斗争的度就成了问题的关键。当时，“八青年”主要负责人头脑发热，主张要“乘胜追击”，用舆论形成“巨大压力”，取得“一个高度政治性的光明正大的收尾”。我们真的这样做了，那就把刚刚侥幸回到我们手中的主动权又完全奉送回去了。因为一旦我们发起舆论的“巨大压力”，接下来，能不能得到一个“光明正大的收尾”就完全不是我们说了算，只能看资产阶级的脸色了。

再来看佳士工人和“佳士声援团”的斗争，由于他们在一开始就制定了一个在资产阶级专制统治条件下完全不可能实现的目标——建立公开的民主工会，所以每一步都陷入被动。他们先向资本家请愿搞工会，结果反而被资本家勾结黑社会迫害；然后他们又向必然要与资本家站在同一立场的警察当局求救，结果反而被警察当局抓捕；然后又幻想靠舆论声援、街头抗议就能够“营救”被捕的同志；最后，当失败已成定局时，又把多年积累起来的全国各地进步学生力量作为最后的赌注全部押上。每一步，他们制定的都是完全不可能实现的目标；陷入被动以后，不但不反思，而是像屡赌屡输的赌徒那样，押上更大的赌注，总是幻想“下一把”就能把“本儿”翻回来，结果终于全部输光。

一支聪明的能打胜仗的军队，必须不仅懂得怎样冲锋，而且懂得怎样撤退。只知道冲锋而不知道撤退的军队是没有不打败仗的。在资产阶级正常统治时期，作为整体力量占弱势的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一方，在斗争中经常要面临撤退的问题；掌握好撤退的时机，有利时可以确保斗争胜利成果（如“八青年关注团”的斗争），不利时可以避免不必要的损失。比如，在“佳士声援团”的斗争中，在一开始工人积极分子被黑社会迫害的时候，在第一批工人积极分子被抓捕的时候，在国内外声援佳士斗争的各种舆论呼吁都不起作用的时候，负责的领导人都应该组织撤退。

由于佳士斗争的领导人从一开始制定的斗争目标就是错误的，一旦撤退，当然要忍痛放弃一些东西（包括一些工人积极分子可能指责他们“见死不救”、有些小资极左青年可能污蔑他们是“逃跑投降”）。但是，越是在困难的时候，越是需要有远见的领导人敢于负责、敢于担当骂名。因为，只有这样，才能避免进步力量更大、更残酷的损失。不仅如此，只有及时撤退，才能不仅保全力量，而且夺回并保持主动权，重新寻找有利的时机、有利的战场，再发起新的有胜利可能的斗争。

佳士工人的斗争与“佳士声援团”的斗争失败了。这次失败，暴露了由小资产阶级激进分子组成的青年左派团体的严重局限性。但是，这次斗争，毕竟是表明，大批小资产阶级青年开始与现存社会秩序决裂并向马列毛主义靠拢；这次斗争，也标志着由马列毛主义者领导中国新工人斗争的时代开始了。尽管“佳士声援团”在这次斗争中执行了错误的路线和错误的策略，但参加这次斗

争的许多青年同志表现了坚定的革命意志和大无畏的斗争精神，给广大进步青年以巨大的鼓舞。我们相信，在经历了这次挫折以后，必然会有一批青年同志在政治上成熟起来，成为不仅能够勇敢地面对资产阶级镇压而且能够在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取得胜利的无产阶级战士。

“新民主主义政治空间”还是社会主义革命？——与老田同志商榷 (2019年1月6日)

远航一号

感谢老田同志阅读笔者的拙作“阶级社会的产生和消亡”以及“中国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阶级和阶级斗争”并撰写出长篇的批评文章。

今天的马列毛左派在理论上面临的基本问题是：资本主义怎样才能灭亡？无产阶级怎样才能胜利？无产阶级胜利以后，怎样吸取历史上社会主义的经验教训，避免重蹈资本主义复辟的覆辙？老田同志的文章涉及上述的所有问题，且篇幅宏大。限于时间和精力，笔者无法一一作答，只能先就几个主要之点，与老田同志重点切磋。其余各问题，则留待以后逐步交流。

中国存在“新民主主义政治空间”吗？

在老田同志文章的第二大部分中，老田同志提出了今天中国的历史任务是创造并实现所谓的“新民主主义政治空间”。

老田同志认为，今天中国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所遭受的最迫切、最直接的压迫还不是来自于“产业资本”，而是来自于“投机金融资本”和“官僚资本”，以及作为二者的政治和经济表现的地方政府、地产商和银行之间的“三头分利同盟”。老田同志认为，投机金融资本和官僚资本通过“炒高房地产价格”及“推进福利市场化”，造成了房价、教育费用和医疗费用的大幅度上升，进而造成了工人和小资生活费用的大幅度上升、推动了名义工资的大幅度上升；名义工资的大幅度上升反过来压低了产业资本利润。

根据这样的分析，老田同志设想，在今天的中国，在工人、小资和产业资本之间实际上存在着一定的共同利益，因而存在着建立政治同盟的客观可能性：

今天勞動者的反抗和批判事業，依然有為資本主義匡正驅邪的功能性地位，這一部分歷史進步責任也祇能夠由勞動者負擔起來，就此也依然存在与部分資本“統一戰線合作”的潛在空間，新型領導權建設過程中間，也存在著聯合一部分去反對一部分最壞的階段性需要。

据此，老田同志主张，今天马列毛左派的政治任务，不是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而是在资本主义框架内，先敦促中央政府成为“资本家的联合委员会”，确立资本主义的“底线”，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

在新時代展望一個新的新民主主義政治空間，有兩大關鍵議程：經濟方面提出反對生活費用惡性膨脹的目標，抑制投机金融資本的野蠻生長，反對教育醫療等民生事業的過度資本化；政治方面提出終結地方政府公司化要求，反對選擇与具体資本進行个体合作的“看家護院模式”這一資產階級專政類型，提出要把公權力改造為“資本家的聯合委員會”去關注一般積累條件，對資本提供公平競爭環境，地方政府的公權力需要斷开与具体資本合作的各種鏈條，不再作為具体資本的“保姆”而需要去集中關注各種公共事務，要創造各種政策和法律可以通行于地方的條件，終結各種“政令不出中南海”的丑陋現實。

如果老田同志的分析是正确的，那么就应当有相应的统计证据可以说明，今天中国资本主义经济中剩余价值的很大一部分是被投机金融资本和官僚资本占有了，剩余价值中的大部分没有被用于生产性的目的、没有用于“一般积累”；至少，要有证据证明，中国资本主义的投机性、非生产性大大超过一般的资本主义国家。

如果我们倒回到二十世纪上半期，退回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老田同志的设想便基本符合实际了。当时的中国经济虽然有相当的经济剩余（约占国民收入的四分之一强），但绝大部分都被非生产性的地主阶级和官僚买办资产阶级挥霍，其余的则以赔款、债务还本付息、利润汇出等方式被外国资本掠夺，而本国的生产性资本主义投资仅占国民收入的约 2%。在那样的情况下，确实存在着“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暂时沿用“无产阶级”领导这一历史表述）与民族资产阶级结成统一战线共同反帝反封建的历史可能性和必要性。但是，这符合今天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实际吗？

要运用资产阶级统计数据全面分析中国资本主义经济中剩余价值的规模及其分配，需要分别了解按照收入法和支出法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并观察二者在各部门间的分配。中国官方统计中比较权威的收入法国内生产总值数据来自于投入产出表。但投入产出表每隔几年才发布一次。目前发布的最新的投入产出表是 2015 年的投入产出表。

2015 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 68 万亿元，固定资产折旧 8.7 万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约 13%），营业盈余总额 15.7 万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23%）。如果营业盈余总额大致可以代表中国的剩余价值总额，那么中国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剩余价值是怎样使用的呢？

2015 年，中国国内固定资本形成总额是 29.2 万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43%；扣除折旧以后，国内固定资本形成净额是 20.5 万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30%，比剩余价值总额还多 7 个百分点。（我个人认为，官方统计的营业盈余总额大大低估了中国实际的剩余价值规模，低估程度约为国内生产总值的 10 个百分点；今年夏天发布的红色经济观察将详细讨论这个问题。）

当然，固定资本形成总额或净额并非全部用于生产性投资。按照资金流量表的有关数据，2015 年，中国的非金融企业部门固定资本形成总额是 19.3 万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28%、全部固定资本形成总额的 66%；金融企业部门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只有 640 亿元，按比例计算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政府部门固定资本形成总额是 3.7 万亿元（含公立教育和医疗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5%、全部固定资本形成总额的 13%；居民部门固定资本形成总额是 7.1 万亿元（绝大部分是住房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10%，全部固定资本形成总额的 24%。

如果以非金融企业部门投资作为中国经济中“生产性”的投资，生产性投资约占全部投资总额的三分之二。如果假设生产性投资占净投资的比例与生产性投资占总投资的比例一样，那么，中国经济中非金融企业部门的净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约为 20%，相当于营业盈余总额的 87%。即使考虑到官方统计的营业盈余总额可能大大低估，设真实的营业盈余总额为国内生产总值的 33%，那么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剩余价值也有约 60% 用于了生产性投资。

再来看剩余价值在各部门间的分配。投入产出表中所列出的大多数部门属于生产性部门（即属于传统社会主义定义的五大物质生产部门——农业、工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业、商业——的一部分）。投入产出表中的非生产性部门有房地产业和租赁商务服务业、金融业、其他服务业，后者包括政府、教育、医疗、文化体育、科研等。

2015年，房地产业的营业盈余1.1万亿元，占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1.6%、全部营业盈余的7%；其他服务业营业盈余7400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1%、全部营业盈余的5%。金融业的营业盈余规模比较大，有3.2万亿元，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5%、全部营业盈余的20%。所以，各非生产性部门的营业盈余相加，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8%、全部营业盈余的32%。换言之，三分之二的营业盈余来自于生产性部门。

生产性部门的营业盈余并非全部转化为生产性资本家的利润（除了企业利润以外，营业盈余还包括租金、净利息支付、净转移支付等）。由于统计数据缺乏，对此难以做出全面准确地估计。但是，根据现有的统计数据，仍然可以列出若干个生产性部门的企业总利润。2015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利润总额是6.6万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0%、全部营业盈余的42%；建筑业企业的利润总额约为6500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全部营业盈余的4%；限额以上批发业的主营业务利润总额2.2万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全部营业盈余的14%；限额以上零售业的主营业务利润总额1.1万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6%、全部营业盈余的7%。以上各部门的利润总额相加，已经基本相当于上述生产性部门的营业盈余总额。

概括来说，中国资本主义经济中剩余价值中大约三分之二转化为了生产性资本家的企业利润，剩余价值中大约60-90%已经用于生产性的资本积累。与老田同志所推断的投机金融资本和官僚资本严重挤占了产业资本的利润空间、破坏了一般积累的条件不同，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是向产业资本高度倾斜的，中国的资产阶级国家已经在承担着理想的“资本家的联合委员会”的职能。

上述分析表明，在中国资本主义的具体条件下，各劳动阶级通过与“产业资本”联合挤压金融等非生产性资本所占有的剩余价值、进而建立新的社会妥协的空间即使不是完全没有，也微不足道。这可以通过与美国资本主义相比较而更加清晰地体现出来。

美国还没有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

2015 年，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 18.5 万亿美元，固定资本消耗（相当于折旧）2.9 万亿美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16%），净营业盈余 4.6 万亿美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25%）。

美国经济的全部营业盈余中，企业部门净利息支付约 760 亿美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4%、全部营业盈余的 16%；租金收入约 650 亿美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3.5%、全部营业盈余的 14%；金融类公司企业利润总额约 440 亿美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2%、全部营业盈余的 9%；非金融类非生产性公司企业利润总额（含房地产、租赁、商务服务、教育、医疗、文化娱乐等）约 380 亿美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2%、全部营业盈余的 8%；此外，非生产性非公司企业收入总额约 710 亿美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4%、全部营业盈余的 15%。以上各项相加，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约 16%、全部营业盈余的 62%。也就是说，美国的非金融类公司和非公司企业利润的合计不到全部营业盈余的 40%。不仅如此，在美国，即使是名义上的“生产性”资本主义企业，其掌握的大部分剩余价值也没有用于生产性资本积累。

2015 年，美国的国内固定资本形成总额 3.7 万亿美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20%。扣除折旧以后，美国的国内固定资本形成净额仅有约 7900 亿美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4%、净营业盈余的 17%。就是说，即使把美国生产性和非生产性的净投资加在一起，美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剩余价值中也仅有不到五分之一用于积累，其余都用于资本家消费或金融投机（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借款给政府或工人阶级家庭消费）。

美国的全部固定资本形成总额中，有 6300 亿美元是住房投资（占全部固定资本形成总额的 17%），6200 亿美元是政府投资（占全部固定资本形成总额的 17%）。企业部门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占全部固定资本形成总额的约三分之二。但是，扣除折旧以后，企业部门固定资本形成净额仅有 4700 亿美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2.5%、净营业盈余的 10%。

也就是说，满打满算，美国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剩余价值只有大约十分之一是真正用于生产性的资本积累，其余都被资本家挥霍或用于投机。

如果按照老田同志的理论，美国属于典型的投机金融资本和其他的寄生性资本极大地挤占了产业资本的剩余价值；不仅如此，产业资本本身也正在形成高度的投机型和寄生性。美国资本主义经济中十分之九的剩余价值都被浪费，而中国资本主义经济中被浪费的剩余价值满打满算不会超过三分之一。美国的工人阶级、中产、小业主如果能够与生产性的产业资本结成联盟，应当有巨大的“新民主主义政治空间”。

还可以进一步推理，鉴于美国资本主义经济的投机性和寄生性，美国显然还没有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美国工人阶级的首要任务，不是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而是首先帮助美国政府改造为“资本家的联合委员会”。

显而易见，这样的分析和推理，是不符合美国资本主义经济和阶级矛盾的实际情况的。

半外围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革命的前途

如上述述，所谓中国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着“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妥协空间，是不符合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实际的，而且应用于国际范围，还会得出荒谬的结论。

现代中国的资本主义是高度生产性的，而不是寄生性的。但是，中国的资本主义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又处于半外围的地位（不是外围的地位）。在国际资本主义分工中，中国的资本家一般来说无法得到大量的超额剩余价值，因而也就无法在国内收买“工人贵族”或者建立与资本主义长久发展相适应的社会妥协（老田所谓的资本主义的“底线”）。

在经济统计上，这表现，中国资本家的每单位投资所能够带来的产值要大大低于美国。因此，要维持与美国资本家相当的利润率，中国的资本家就必须维持比美国要高得多的剥削率。

老田同志认为，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利润率的下降主要是因为投机资本、官僚资本泛滥导致工人和小资的生活成本大幅度上升。坦率地说，我们从研究中无法找到可以支持老田的假设的统计证据。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即使是生活成本上升了，如果没有工人阶级的斗争，资本家也不会自动将工资的增长速度提高到生活成本的增长速度以上。所以，实际工资增长、劳动收入份额增长的根本原因，还是由于工人阶级斗争力量的增强。

有一点是笔者与老田同志意见一致的。那就是，无论工资上涨的具体原因是什么，显然，无论是中国的工人阶级还是小资产阶级都在提出越来越广泛的经济和社会要求（暂时不论这种要求是被动的还是主动的），并且有能力在相当程度上实现这种要求。这种来自工人和小资的越来越高的要求，实际上也就是在不断地提高维持中国资本主义合法性所必需的“底线”。另一方面，由于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利润率在核心国家拒绝中国资本家参与分享超额剩余价值与国内工人斗争的共同挤压下，趋于下降，整个中国资本主义经济（而不仅仅是投机金融资本）所能够容纳的潜在可能的“新民主主义政治空间”却在不断地被压缩。这样，工人阶级和小资的斗争要求、中国资本主义维持合法性所需要的最低“底线”或迟或早要突破中国资本主义经济为了维持资本积累所能容纳的最大界限。

这种矛盾，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与资本主义积累的要求兼容的。因此，无论老田同志主观上愿意还是不愿意、喜欢还是不喜欢，在未来的阶级大搏斗中，除非中国的无产阶级彻底战败（从而中国资本主义完全外围化），否则，解决矛盾的出路只能是社会主义革命。

怎样才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

对于中国的无产阶级和进步青年来说，当前的首要任务还是发展和壮大无产阶级的组织，进行并完成无产阶级革命。但是，怎样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这是中国的无产阶级在未来或迟或早必然要遇到的问题。

从形式上来说，马克思主义对于这个问题的答案是清楚的。那就是，未来的社会主义政权必须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必须普遍地、充分地建立巴黎公社式的民主，行政、司法和国民经济管理方面的一切职位由劳动人民选举产生并且随时可以撤换，废除高薪制、废除物质特权。

但是，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要真正地、普遍地落实巴黎公社式的民主，还必须具备一定的历史条件，特别是要逐步地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分工。没有后面这个条件，普遍的、巴黎公社式的民主或者建立不起来，或者建立起来了，也不能巩固。

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只要还没有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工，社会就必然分裂为阶级，一个阶级剥削和统治另外一些阶级的情况就是不可避免的。老田同志一方面承认，这实际上就是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但是又认为这个观点是不正确的：

對於腦力體力分工的物質條件和生產力水平的強調，自有其道理，這是馬恩都肯定過的內容。但是，從中國革命和毛時代的建設經驗看，階級的消滅與重建都發生在政治博弈過程中間，用經濟概念和階段論和決定論去概括有著明顯的錯位。若分工不消滅、階級就存在，真個如此，統治階級基於分工不可超越的強大，就是不可挑戰的，革命成功更是不可想象的。

如果我们承认，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工实际上是社会分裂为阶级的物质基础（同时也意味着后者的必然性），那么是否就意味着“革命成功是不可想象”的呢？后面这个判断，只有在默认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工本身是不可能消灭的前提下在逻辑上才能够成立。

关于无阶级社会为什么不仅是“可以想象”的、而且是历史的必然，马克思、恩格斯都有过大量的论述，笔者在“阶级社会的产生和消亡”中也做了概括。不知道老田同志是没有理解呢，还是忽略了，还是理解了但是不屑于一谈呢。

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一方面，只要有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工的存在，社会就必然分裂为阶级。所以，在以往的阶级社会中，尽管劳动群众也曾多次反抗剥削者、压迫者，有的奴隶和农民起义还成功地推翻了旧王朝，新建立起来的国家和社会仍然必须遵守当时的客观历史规律，新的剥削阶级很快就形成并巩固了。另一方面，正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物质生产力高度发展，才第一次有可能创造这样一种物质条件，使得绝大多数人生产必需品的劳动时间都可以大大缩短，从而所有人都可以参加公共管理性和创造性的活动。这样，才能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工，才能消灭社会划分为阶级的物质基础，才能实现普遍的巴黎公社式的民主。

如马克思所说：“工作日的缩短是根本条件”。而在老田同志的叙述中，完全没有触及普遍缩短所有人劳动时间的问题，而只是把物质生产力的发展庸俗化地理解为物质产

品的丰富，并引用毛主席针对特定条件所说的“人愈穷，才愈要革命”，借以批判他所理解的物质生产力决定论（在“富裕水平”与“新世界”之间的线性因果关系）。

对于马克思、恩格斯来说，他们当时对于物质生产力的发展、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实际上有着近乎无限的信心。所以，在他们看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或迟或早总能提高到这样一个程度，使得所有人的劳动时间都大大缩短成为普遍的现实。我们今天所面临的世界历史条件要复杂得多，一方面，世界平均的劳动生产率已经比十九世纪有了巨大的提高，另一方面，全世界的生态环境危机也在向着毁灭人类文明的方向发展。所以，未来的人类不仅面临着向无阶级社会过渡的任务，而且面临着克服生态环境危机、恢复可持续性的任务。后者，是否与劳动生产率的大幅度提高相容（比如，如果普遍实行生态农业，是否需要大大增加对农业的劳动投入），还有待于未来的社会主义建设者们探索。

回过头来说历史社会主义的问题。只要还没有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工，社会就必然分裂为阶级，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实际上意味着，历史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就其向无阶级社会过渡这一点来说）是必然要失败的。当然，没有完成向无阶级社会的过渡，不等于说，历史上的社会主义没有完成其他的伟大历史任务（比如建立民族国家、准备资本积累的必要条件）；也不等于说，历史上的社会主义国家不可以在完成上述伟大历史任务的同时还为劳动群众创造比一般资本主义条件下更好的发展条件。但是，历史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确实没有完成向无阶级社会过渡的任务，并且，这是历史的必然，不是偶然。这是我与老田同志的分歧。

老田同志说：“从中国革命和毛时代的建设经验看，阶级的消灭和重建都发生在政治博弈过程中间，用经济概念和阶段论和决定论去概括有着明显的错位。”是的，一切阶级的消灭和重建都发生在“政治博弈”过程中间，或者说，是要通过具体的阶级斗争来完成的。这不仅是中国革命的经验，这实际上也是整个阶级社会历史的经验。

但是，在比较长时期的阶级斗争中（而不是某一次具体的政治斗争中，如刘少奇被打倒或者邓小平上台），为什么某一个阶级胜利了，为什么另外一些阶级失败了，从根本上来说，就不能用思想的、文化的、意识形态方面的因素来解释，而要用不同阶级相互之间的力量对比来解释；而不同阶级相互之间的力量对比，从根本上来说，又取决于那个时代具体的物质生产条件。

在阶级社会中，只要存在着压迫和剥削，劳动群众反抗压迫者和剥削者的斗争就决不会停止并且在一定条件下还会发展为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但是，只要阶级社会赖以存在的物质基础没有根本的改变，这种斗争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将以劳动群众的失败而告终；即使在少数情况下，旧的上层建筑被推翻了，新的统治者还是会很快地蜕变为剥削者和压迫者。这就是过去几千年一切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这个规律在二十世纪中期的中国仍然适用。

1949 年以后的中国，一方面，仍然面临着“争取必需品的斗争”，另一方面，又面临着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动员经济剩余从事资本积累的巨大压力。这两个历史条件共同决定了绝大多数劳动者必须将他们的全部时间用于生产必需品和资本积累所需要的生产资料的劳动，从而排除了普遍缩短劳动时间的可能性，也决定了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工、社会分裂为阶级的必然性。

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一般的阶级力量对比，必然是有利于新形成的官僚特权集团，而不利于反抗官僚特权集团的劳动群众。这并不等于说，工人和其他劳动群众，在毛主席的领导下，不能够取得某些具体斗争的胜利或者在一个时期内在相当程度上限制官僚集团的特权。但是，从长远的历史观点来看，只要基本的物质生产条件不发生变化，这样的斗争必然是失败多、成功少，并且整个的力量对比将会发生对官僚特权集团越来越有利的变化，直至资本主义复辟。这也是前社会主义国家到目前为止无一例外发生的事情。

老田同志也同意，在整个的社会主义时期（包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期），阶级力量对比都对官僚特权集团有利、对劳动群众不利：“文革期间检验到的残酷事实是：官场机会主义的动员起来的力量，超过毛泽东支持的民间有组织批判力量，官文革力量大于毛泽东支持的民文革力量 ... 力量对比如此恶劣，在毛泽东身前造反派就屡遭镇压和算账。”像毛主席那样几百年一遇的伟大领袖都不能够用任何主观的方法（“意识形态领导权”）把劳动群众真正有效地组织起来反对新生的特权官僚集团，这难道还不足以说明，文革的失败是历史的必然吗？

老田同志讲：“社会主义的一个基本问题是精英们不爱社会主义，在制度稳定的日常状态下精英们会降低制度性生产效率和政治体验（典型事件如反右扩大化、“穷过渡”的投机狂潮、文革时期（对）造反派的野蛮镇压），在制度的不稳定契机来临时，精英们

会积极促成制度转型和复辟 ... 任何一个林彪一类上台都选择向精英们的需要投机，因为民众的力量过小。”

从老田同志的论述中，可不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只要社会主义还没有消灭“精英”并且各种政治和经济的权力还在“精英”手中，革命就必然失败、资本主义复辟就是不可避免的。另一方面，只要还没有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工，就不可能消灭“精英”，也就不可能使得各种政治和经济权力掌握在劳动群众手里，那么，社会主义革命的失败便只是时间的问题。

毛主席所说的，文化大革命每隔七八年再来一次，实在是当时历史条件下不得已而为之的权宜之计（甚至是在文革总退却后赖以稳定队伍的一种宣言），是不足以作为未来社会主义革命可以借鉴的经验的。在当时中国那种内外条件下，即使文革派侥幸胜利，也有极大的可能，将很快发生腐化变质。

这里提出，文革的失败是历史的必然，并不是说文革在历史上是错误的，或者说，是不必要的。即使是失败的革命，也打击了当时的剥削阶级，锻炼了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并以曲折的方式将历史推向前进。

文革在历史上的失败是必然的。但并不是说，未来的社会主义革命也必然要失败。与老田所说的，“分工不消灭，阶级就存在 ... 统治阶级基于分工不可超越的强大，就是不可挑战的”相反，只要在未来新的历史条件下，社会主义的探索者们能够做到一方面克服资本主义遗留下来的生态环境危机，一方面又不断地提高劳动生产率并将劳动生产率提高的成果自觉地运用于普遍缩短所有社会成员的劳动时间，就仍然可以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工、消灭“精英”，并向无阶级社会过渡。

声援团的同志们，无论有多少艰难曲折、误解分歧，我们和你们还是一条战壕里的战友 (2019年2月2日)

远航一号

“佳士工人声援团”的同志已经证实，部分高校的进步青年积极分子已经在校方组织下观看了顾佳悦、岳昕、沈梦雨、郑永明四同志的“认罪”视频。这部视频的录音和文字记录也已经在社交媒体上流传。

此前，红色中国网已经分别发表了“红色中国网工作组致青年马列毛左派积极分子的建议书”和“严元章同志与八青年关注团的斗争经验”两文，就佳士工人和佳士声援团斗争失败的教训提出了我们的意见。毫无疑问，我们与声援团的同志存在着路线和策略的分歧。但是，尽管有这些分歧，我们从来都不怀疑，顾佳悦等同志、声援团的多数同志都是真诚的马列毛主义者（这与他们客观上存在的小资产阶级局限性并不矛盾），都下定了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中国工人解放事业的决心，都在斗争中表现了敢于同一切压迫斗争到底的勇气和精神。

在“建议书”中，我们也坦率地指出，在经历了这次斗争失败以后，“有可能在一部分青年积极分子中导致消极悲观和失败主义的情绪，其中一些，或者在经历一个短暂的亢奋期以后，又转入消沉。”另一方面，我们也相信，“也可能会有批优秀的青年积极分子，能够经受住考验，并且通过深入的反思，使得自己在思想上和品质上都有很大的提高，从而成为未来斗争的中坚。”我们现在仍然相信，声援团中的许多同志（包括在狱中经受考验却又犯过一些错误的同志）在未来的斗争中仍然可以成为这样的中坚。

我们的“建议书”和“斗争经验”发表后，有一些同志表示了不理解。有些不了解情况的同志急于指责我们“泄露机密”、“出卖同志”。还有一些人，恶意地揣测，说我们是要与声援团“切割”，是要向敌人递交“投名状”。当时，为了让事实逐步地展现在人们面前，也为了维护声援团的声誉，我们对于这些指责没有急于辩驳，对于有些误解也没有马上澄清。还有一些老同志，出于对青年同志的关心和爱护，认为我们对声援团的批评过于严厉了，只看到了“消极”的一面，没有充分地肯定这次斗争的伟大历史作用。对于这些老同志的批评，我们也采取了耐心等待的办法。

现在，顾佳悦等四同志的“认罪”视频及其文字记录已经广为流传、人尽皆知。有一些我们所了解的情况，可以向同志们做进一步的说明。2018年8月下旬，在深圳的声援学生和工人遭到大规模镇压，数十人被捕（其中一部分后来被释放）。到了11月上旬，青鹰社主要负责人被捕。结合其它一些情况，我们判断，声援团以及声援团背后的整个组织系统在那个时候就已经被破获。后据内部消息，不晚于12月初，青鹰社主要负责人已经全部招供，并写下了长达80页的坦白材料。到12月下旬，据有些被谈话的同志透露，顾佳悦等已经“认罪”。当时已经有传言，当局已经将一些被捕同志的“认罪”陈述拍成了视频。我们的“严元章同志与八青年关注团的斗争经验”一文，是在了解了上述情况以后，才撰写并发表的。此后，北大、人大等高校的主要积极分子被捕，社团被“改组”，深圳微工汇主要负责人被捕，都是青鹰社主要负责人招供的后续发展。

对于狱中同志是如何以及怎样“认罪”的，在“认罪”前后受到了哪些威逼利诱，我们现在无从得知。只能等待将来这些同志被释放后，逐步了解。关于这个问题，我们红色中国网工作组的看法是，现在并非革命战争年代，有志于马列毛主义的青年积极分子，也并非正式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组织的成员，既不受组织纪律的约束，也不受纲领和誓言的约束，只受工作道德的约束。因此，不宜用革命战争年代共产党员的标准来要求现在的青年同志。即使不考虑刑讯逼供的情况，由于对方掌握专业的审讯手段和技术，由于青年同志被捕时势必被对方缴获大量的实物证据（电脑、手机、通讯记录等），由于初次被捕的青年同志缺乏经验，由于对方有条件反复比对、分析大量被捕同志的口供，绝大多数被捕同志往往在入狱后的最初几天就难免被对方“突破”。这次事件再一次说明，在当前条件下，企图脱离群众、脱离左派大多数，自搞一套秘密组织的做法，是十分幼稚的，教训也是沉重的。

对于已经被捕并且在狱中说了错话、办了错事的同志，我们认为，只要他们不是主动卖身投靠，而是在某种被迫的情况下委屈求全，或者是因为缺乏经验而泄露了其他同志的情况，只要在出狱后能

够主动向左派同志把情况说清楚，自己在主观上又没有心灰意冷，而是能够坚持理想，那么就还是我们的同志，还是我们的战友。

这个态度，我们不是现在才有的，而是在去年8月份严元章、远航一号致顾佳悦同志的信中就已经表达了。这封信发出的时间是2018年8月10日。在这封信中，严元章、远航一号向声援团的同志郑重建议，要力争创造条件，使得在“前线”的全体同志安全撤退。如果不能做到使得全体同志安全撤退，也应该只留下少数同志坚持，而安排大多数同志撤退。对于少数坚持的同志，则应该准备最坏的情况，一旦被捕，不要幻想短期内释放，要准备在狱中坚持三年、五年。严元章、远航一号还特别指出，一旦入狱，要实事求是，要允许同志犯错误，不要轻易给其他同志扣上叛徒的帽子，要允许犯错误的同志继续革命。

令人遗憾的是，当时声援团的同志没有接受我们的建议，而是发动多所高校的学生积极分子前往现场进行更大规模的“声援”，终于导致各高校进步学生团体全面沦陷。去年8月10日的那封信，因为谈到怎样准备在狱中坚持，据说曾经在声援团部分积极分子中传达过，现在其基本内容，想必对方也已经了解。我们现在将这封信（除个别地方有所删改外）向左派同志公开：

严元章、远航一号致顾佳悦同志（2018年8月10日）

我们就当前形势交换了意见，我们的一致看法如下：（一）这次佳士、日弘厂工人的斗争是第一次在马列毛左派领导下的新工人斗争，国内外瞩目，大批工人和青年积极分子得到了锻炼，无论结果如何，都有着伟大的历史意义。仅从这一点来说，工人同志的斗争，你们的斗争，已经取得了相当的胜利！

（二）在这次斗争中，梦雨、岳昕、时代先锋网等同志发挥了先锋的作用。请允许我们，向你们和其他战斗在前线的同志致以革命的敬礼！

（三）我们认为，此次斗争也确实存在着严重的缺点和错误。这些缺点错误和有关的经验教训，可以在将来适当的时候，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等方式，深入讨论和总结。

（四）当前斗争形势严峻，前线斗争的同志所面临的困难与日俱增，通过正常的资产阶级法律途径解决十几位工人同志释放的问题几无希望。对方也有困难，他们目前还没有下大镇压的决心，就说明他们也有顾虑。他们的办法，是用长时间消耗的方法，消磨你们的肉体，消磨你们的意志，直至将你们拖垮。目前条件下，用常规方法我们无法阻止对方达到他们的目的。幻想用加大左派声援力度的方法来迫使对方改变计划，是不现实的。

（五）鉴于彼我双方各自的困难，我们认为，应努力争取在被捕工人全部释放的条件下（我们不拟提出超出此点的任何其他要求），组织前线战士有秩

序地撤退。你们是中国希望所在、革命的宝贵财富！无论是我们还是你们，还是其他人，都没有权利浪费这笔财富！

（六）我们将设法与对方谈判，在被捕工人全部释放的前提下，允许深圳等地青年积极分子安全撤退；如谈判达到目的，望你们动员前线同志，以大局为重，有秩序地撤退，养精蓄锐，以利将来。（需要说明，即使在撤退的情况下，局部的打击报复，如部分同学被学校处分等，仍然可能是不可避免的，要有相应的精神准备）

（七）（略）

（八）如果对方不同意释放全部被捕工人，则我们必须为工人同志负责。在那样的形势下，建议部分同志坚持斗争，准备牺牲。如果出现了这种情况，严元章同志准备于必要时加入你们，共同牺牲。这里要强调：这种情况，仅仅适用于对方不同意释放全部被捕工人的情形。如果对方确已表示要释放全部被捕工人，并且我们有理由相信对方确实也会那样做，而部分同志却不顾大局，不服从有组织的撤退，则严元章同志不能为你们负责。

（九）如果出现了上述必须坚持斗争、准备牺牲的情况，建议你们做好前线同志的工作，安排大部分同志先行撤退，只留少部分同志继续坚持，准备坐牢。如果出现这种情况，要向同志们解释清楚，无论撤还是留，都是革命工作，都是革命需要，留的同志不要骄傲，撤的同志也不要有小资产阶级的负疚感。有撤有留，才能最好地服务于大局。

（十）如果出现了最坏情况，要保持高度的革命乐观主义。过去，革命先烈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抛头颅，洒热血。我们现在既不需要抛头颅，也不需要洒热血，无非是坐一些时间的牢，受些皮肉之苦，这便是资产阶级能够强加给我们的最大痛苦。承受住了，就是经受住了最大的考验，以后还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

如果少部分同志，不得不蹲监狱，有几条老经验，与同志们分享一下：（1）刚进去时，有些焦虑不安，是正常的；但要尽最大努力，保持平静，努力适应周围的环境和生活，不要总盼着明天、过几天或下个星期就得到释放，不如索性下定决心，蹲他个三年、五年，做到无欲则刚。

（2）对牢头要不卑不亢，不要主动去挑衅他，但必要时也要敢于斗争。一般来说，如果牢头安排你做一些脏活苦活，可以做，且不要有怨言。

但如果牢头侮辱你的人格，则必须坚决斗争。他们一般也没什么别的“惩罚”办法，无非是打人，不给你“好吃”的。如果牢头招呼手下打你（牢头一般不亲自动手），要迅速跑到墙角或墙边，头朝里，背朝外，双手护头，然后随便他们打。一般来说，牢头既不敢把你打死，也不敢把你打残。切记：挨打时，绝对不要叫警察，不仅不管用，而且被人看不起。你扛住他们几次打，又不屈服，你在号子里就有了威信，牢头也会对你客气起来。

（3）可以向号子里的人简要地介绍自己的案情。除此以外，少说话，多观察，逐渐交朋友，改善周边环境，并了解社会底层。

（4）我们没有组织，没有正式纪律，更谈不上纪律制裁。在对付警察方面，一切都靠革命自觉。另一方面，要实事求是，要允许同志犯错误。只要不是主动出卖同志，意志颓废、放弃理想，只要在经受考验后仍然坚守革命的信念和斗志，那么，如果在被捕期间犯过一些错误，都是可以原谅的，都不要过度指责、甚至扣上叛徒的帽子。比如，由于缺乏经验，有的同志难免被迫或无意中透露一些工作中的重要情况。如果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只要这样的同志不放弃革命，又能及时将有关情况向其他同志讲清楚，就应当原谅之。我们过去都有过类似的情况。

无论出现怎样的艰难曲折，也无论有多少误解分歧，我们与你们都是一条战壕里的战友。让我们一起走向光明与胜利！

众所周知，在我们与声援团的同志之间，存在着路线和策略的分歧。但是，这种分歧，不应该妨碍我们和声援团的同志为了一个共同的理想而奋斗，也不应该妨碍我们和声援团的同志在各种具体问题上或者合作、或者协调、或者商量、或者互通消息。正如我们在答复尤玲同志的文章中所声明的，红色中国网的大门是永远敞开的。“无论出现怎样的艰难曲折，也无论有多少误解分歧，我们与你们都是一条战壕里的战友。”这一段去年8月份写给顾佳悦同志的话，现在也写给声援团的同志。

在“建议书”、“斗争经验”两文发表后，无论是赞成还是反对，许多同志都诚恳地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但是，也有个别人，不是从事物的是非曲直来考虑我们的两篇文章，而是从他们阴暗的心理出发，到处散布说，我们写这两篇文章，是以“领袖”自居，要争做“左派的师爷”。

我们不否认，在当前马列毛左派的路线与策略问题上，我们与一些同志存在着分歧。我们认为，对于这些原则性的分歧，不应该掩盖它，而应该努力批评错误的东西，宣传正确的东西。我们这样做，其他一些同志也在这样做。我们在这样做时，努力用同志式的态度来对待与我们有分歧的同志；而有一些反对我们的同志，则未必是在用同志式的态度来对待我们。当然，如果我们在宣传我们的主张时，有不对的地方，没有真正地用同志式的态度来对待其他同志，我们诚恳地欢迎各位同志指出来，并给予我们批评。另一方面，辩论是双方的或者多方的。如果要批评，就不能仅仅批评某一方没有采取同志式的态度，而应该批评一切非同志式的讨论态度和方式。

当然，对于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目前不同同志的看法不一样。这种分歧，只能通过斗争的实践来验证和解决。有些分歧，则需要通过长期和反复的斗争实践才能验证和解决。在“建议书”和“斗争经验”两文中，我们如实介绍了在过去一年的若干具体斗争中我们的主张和做法，其中哪些是经受住了实践考验的，哪些又是被实践证明是错误的，相信任何不带偏见的人都可以得出自己的结论。在这两篇文章中，我们又提出了我们对于未来斗争路线和策略的看法，其中哪些将被未来的实践所证实，哪些又将为未来的实践所证伪，我们相信，一切不带偏见的、真诚地追求中国无产阶级解放的人们也必然会在不久的将来得出公正的结论。

至于所谓争当左派“领袖”、“师爷”的问题，我们不排除，一些左派同志可能确实有这样的想法，尤其是那些信奉狭隘“灌输论”的同志，更有可能有这样的错误思想。这里所说的狭隘“灌输论”，不是列宁同志在《怎么办》中曾经论述过的无产阶级群众只有经过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知识分子的“灌输”才能具备无产阶级的政治觉悟的思想。列宁认为，只有革命知识分子才能够从无产阶级日常经济斗争的“外面”，从一切阶级和阶层与资产阶级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方面来汲取各种政治知识；而这样的政治知识，一般的无产者和其他劳动群众，从其日常生活的经验中，是无法获得的。这里所说的狭隘的“灌输论”，是特指在中国目前的小资产阶级出身的青年左派积极分子中普遍存在的一种错误倾向。这种错误倾向认为，中国无产阶级的发展壮大、有觉悟工人的组织和成长，主要地不是由于中国资本主义矛盾在客观上发展的结果，而主要地（甚至于完全）是要依靠青年知识分子的“灌输”。这种狭隘的“灌输论”还认为，能够从事这种“灌输”的青年知识分子，不需要在阶级斗争的实践中经过反复锻炼，不需要经历过一个“先当学生、再当先生”的过程，甚至于也不需要如列宁所说，真正地掌握涉及一切阶级和阶层与资产阶级国家之间相互关系的政治知识。在这种狭隘的“灌输论”看来，任何一个没有实践经验、没有经过现实斗争的考验和锻炼，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状态上都没有脱离小资产阶级的“左青”，只要上过资产阶级大学，读过《共产党宣言》和《怎么办》中的某些篇章，而实际上既不懂马列毛理论也不懂马列毛的工作方法，似乎天然就比普通的劳动者高明，天然就掌握了马列主义真理，天然地就有资格给工人阶级“灌输”，还可以给一般的青年学生“灌输”。正是从这样的狭隘的“灌输论”出发，我们才看到，有一些青年同志，有一些知识分子同志，将某些片面理解的书本知识的堆砌，误以为是真理力量的来源，乃至逢人便要夸耀自己的“天才”、自命“理论权威”，争当左派“领袖”，同时又生怕别人抢了自己“领袖”的位子。

在“建议书”、“斗争经验”两篇文章和另外一些文章中，红色中国网工作组反复说明了这样一个基本认识，即中国无产阶级的发展壮大、中国资产阶级的由盛到衰，从其主要方面来说、从根本上来说，只能是中国资本主义客观存在的矛盾发展的结果，而绝不可能是少数知识分子或者“领袖”从外部“灌输”或者推动的结果。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我们所相信的，是群众创造历史、奴隶创造历史，而不是英雄创造历史。

就我们个人来说，我们在答复尤玲同志的文章中，也明确说明过，我们红色中国网工作组中既有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也有无产阶级出身的。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同志都存在着一个长期改造自己的问题。这种改造，不是短时间的、一下子就完成的，而是一辈子要向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学习。即使是无产阶级出身的同志，也会受到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污染，也会存在着个人的种种落后和不足，也存在着一个长期自我改造的问题。

我们从来没有隐晦，我们工作组的同志也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错误，也存在着脱胎于小资产阶级的各种毛病，包括个人“野心”。我们工作组中的一位资深同志，年轻时，就做过“总统梦”。对于我们自己身上的这些小资产阶级局限性，我们首先承认这些问题的存在，并努力与之做斗争。我们不敢说，我们现在就已经真正克服了这些局限性，与小资产阶级局限性的斗争是马列毛主义者一辈子的任务。但是，我们的这种态度，与另外一些同志，根本不承认有这样的局限性，或者只认为别人有这样的局限性而自己却完全没有，只认为别人需要改造而从来不提出改造自己的任务，是可以形成鲜明对比的。

至于马列毛左派的领袖或者无产阶级运动的领袖，这只能够在长期的阶级斗争实践中经过反复的锻炼和考验，从群众自身当中脱颖而出并为群众所认可。前不久去世的吴敬堂同志，就是这样一位在工人阶级反私有化斗争中涌现出来的英雄和领袖。这样的“领袖”既不可能是某些人“自封”的，也不可能是靠少数人玩一些阴谋诡计就“争”到手的。我们红色中国网工作组水平有限，但是这点政治觉悟，我们还是有的。所谓“领袖”，我们是不会争的，我们既没有那样庸俗，也没有那样愚蠢。但是，对于错误路线的批判、对于正确路线的宣传，我们一刻也不会停止。因为这样的工作，是我们作为马列毛主义者不可推卸的责任！是我们生命的“第一需要”！

一个左青“领袖”怎样成了非法集资黑心资本家

(2019年2月24日)

匿名

谈谈唐玉龙的事情，遗憾的绝不是现在揭露，而是没有及时揭露，了解内情的人是去年春天写这篇文章的，也就是在昨天才在一些左派群里引起关注。

一个共产主义者是否可以高利贷公司老板，答案绝不是否定的。然而，个人谋生发财绝不该跟人类解放事业混为一谈，而唐某的恶劣之处在于此人的 P2P 公司曾向一些左派同路人融资，并赖账不还。

无产阶级事业不会排斥所谓黑心资本家捐钱，然而唐某在左派里的面目不是黑心资本家，而是境内最大的马列毛官场的头子，他和他的团伙，在去年的某事件中拒绝声援落难的进步青年和罢工工人，他自己过着有产阶级的生活，却以革命领袖的资格要求其他青年学生进入工业区奉献革命，一部分真诚的青年去实践了这条道路，他们中有些因为反对唐某及其背后势力遭到了开除，有些同志离开了阶级事业，在家乡只能拿当地最低工资谋生，更多分道扬镳的人被唐某当作竞争对手。

揭露是否会给国家带来监控的便利？个人认为，没有绝对安全的交流通信方式，相比于秘密工作，是让群众了解运动的真相、避免党官僚进一步害人更重要。所谓的保密工作，只是有些人有些势力排斥异己的借口罢了。当然，这不排除唐某及其背后势力依然认为自己是中 国革命中心，不过，虚伪的表演总有谢幕的那一天。

以下为相关投资者去年在网络上发布的文章。

<http://www.ifuun.com/a2018042312342754/>

當你聽到左翼青年時，你或許想到的是有工農立場、積極向上、熱情.....然而，我今天想說的卻是另外一回事——左翼青年和非法集資。



這個人叫唐玉龍，畢業於清華大學，在校期間參加清華求是學會，應該算是一個頗有理想的馬克思主義者。很難讓人把他跟非法集資想到一起，但這卻是事實，下面我就談談他的非法集資：

唐玉龍和 P2P 公司



在理財網站截圖

總之，唐玉龍及其團伙所創建的若干公司，就是同一班人馬，若干塊牌子。而唐玉龍則擔任集團風控總監及在理財董事。除此之外，唐玉龍還擔任車融資（北京車融天下投資有限公司）的法人和執行董事等。



唐玉龍參股、擔任重要商業角色的公司一覽

天眼查 天眼查 都在用的商业安全工具

查公司 查老板 查关系

中投国泰（北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背景	公司发展	司法风险	经营风险	经营状况	知识产
变更时间	变更项目	变更前		变更后	
2017-07-05	投资人	1 许赤瑜 自然人股东 2 王立威 自然人股东 [退出] 3 张舒 自然人股东 4 刘汀 自然人股东 [退出]		1 许赤瑜 自然人股东 2 张舒 自然人股东	
2017-03-20	住所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大街18号8层04-450		北京市海淀区北清路164	
2016-07-07	投资人	1 许赤瑜 自然人股东 2 唐玉龙 自然人股东 [退出] 3 刘汀 自然人股东 4 张舒 自然人股东 5 王立威 自然人股东		1 许赤瑜 自然人股东 2 王立威 自然人股东 3 张舒 自然人股东 4 刘汀 自然人股东	
		1 万霖 自然人股东 [退出] 2 许赤瑜 自然人股东		1 许赤瑜 自然人股东 2 唐玉龙 自然人股东	

從天眼查上查到的信息顯示：唐玉龍 2016 年 7 月轉讓中投國泰股份給許赤瑜。而 1 個月之後，2016 年 8 月，在理財便出現了提現困難。唐玉龍成擔任法人和執行董事的車融資也出現提現困難。



在理財股權結構

「高明」的非法集資手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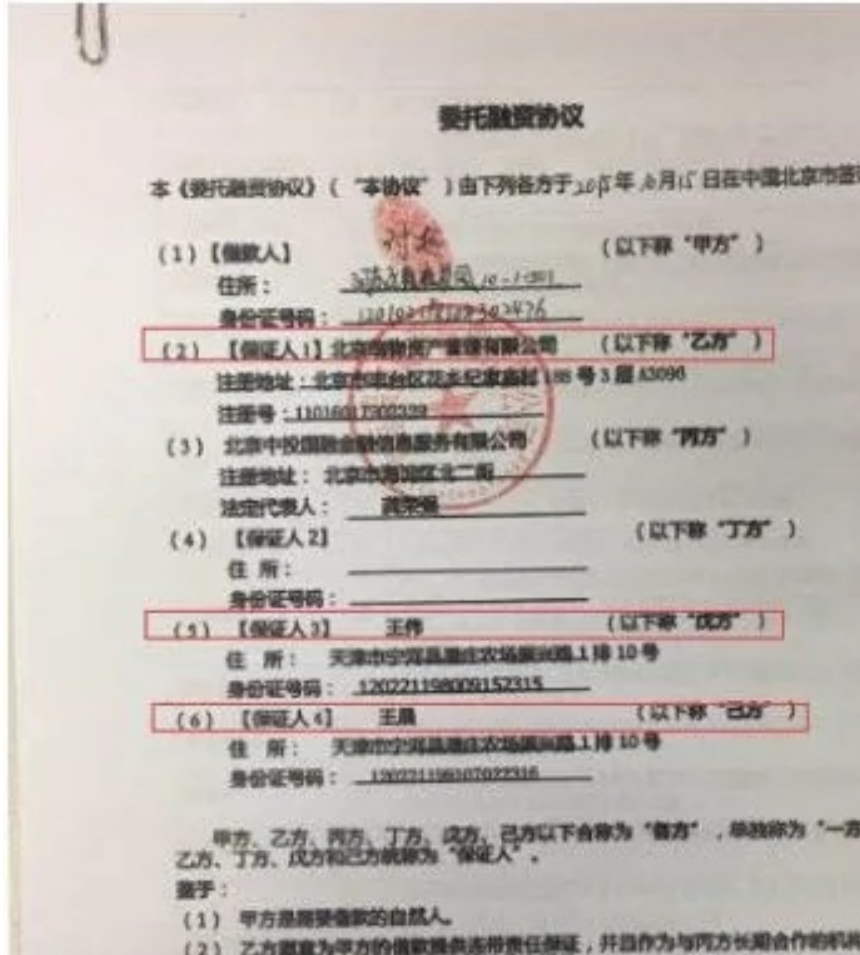
在理財出現提現困難後，唐玉龍聲稱自己不知情，提現困難的事情與自己無關。然而，提現困難跟公司一開始的運營方式（非法集資的方式）是直接相關的。

下面來看看他們是如何運用其高明的風控手段來進行非法集資的：

首先，他們確定合作夥伴：天津裕鴻達投資諮詢有限公司、北京瑞物資產管理有限公司（法人為王晨）、王晨和王偉（兩人為兄弟）。

其實，這些合作夥伴都集中在王偉一個人身上，在後面我們還會看到借款人也多為王偉的親戚朋友，可見，王偉是非法集資的關鍵性人物。

然後，讓合作夥伴做項目的保證人，而合作夥伴同時也是項目的直接或間接的借款人。



在幾乎所有項目中，借款人被偽造成小企業主，表面上看是房產抵押借款，由保證人王偉等人提供保證。但事實上，融到的資金都打款給保證人王偉，或者由借款人將資金轉交給保證人。

序号	批次号	发起时间	姓名	账号	银行	手续费	实付
11	44975220150608144752	2015-06-08 14:47:52	王伟	4100620220228866	招商银行	437.50	350437.50
12	44975220150601135040	2015-06-01 13:50:40	王伟	4100620220228866	招商银行	375.00	300375.00
13	44975220150529134315	2015-05-29 13:43:15	王伟	4100620220228866	招商银行	625.00	500625.00
14	44975220150527145219	2015-05-27 14:52:19	王伟	4100620220228866	招商银行	250.00	200250.00

在理財公司披露的資金流水

在理財出現問題後，公司便把責任推給王偉，說是王偉亂搞把錢黃光了。但這種說法太牽強，不過是推脫責任的一個說法而已。

首先，按照正常的程序，公司本就不能把錢直接打給保證人，而是應該打給借款人，可在理財卻偏偏把所有錢都轉給了王偉。

其次，在理財運營一年多，大多項目的借款人都和王偉有著親密的關係，而資金都幾乎打給王偉，難道這家公司是給王偉開的私人融資公司嗎？

因此，可以推測：王偉本來就和唐玉龍等人是一夥的，不過是用了兩套牌子，分工合作集資套現而已。至於套現後用於何處我們不得而知，或許是用於投資高回報高風險項目，房地產或股票等等……

在正常的情況下，他們套現後用於其他高收益的項目便可以維持資金運轉，還能大賺一筆。但是一旦投資項目出了問題，便會出現資金無法回籠，提現困難。

虛構貸款項目，偽造貸款需求

2015年7月之前，在理財平台發布了初始的14個項目，期限為1-3個月，共涉及13個借款人，集資到1670萬；並將錢直接或者間接（通過名義借款人）打給保證人王晨、王偉。

下面列舉其中兩個項目：



融資方即借款人時利，是王偉公司業務員，已於15年離職



借款人白倍慈，是王偉前妻

與此類似，其他項目借款人均是保證人的親朋好友，比如王偉現任妻子、王偉妹夫、王偉的母親等，還有一些借款人無法聯繫上。

這些王偉的親朋好友，即借款人將其房產（根據披露的房產證，抵押權均已過期）抵押給保證人，保證人王偉最終取得了資金。

那麼，在理財作為融資平台，為何抵押權過期而不知，而且就算抵押權不過期，抵押權也不歸在理財，而是王偉。王偉作為保證人，既獲得房產的抵押權，也獲得了融到的資金。

是在理財太無知太大意，還是故意為之呢？當然是後者。

在這個非法集資的遊戲里，借款人的房產抵押，不過是「障眼法」，實質就是保證人與在理財聯手，「空手」騙取投資人的資金。



借新貸還舊貸，長期佔有投資人資金

2015年7月之後，在理財再無新的項目，只是讓之前的14個項目續貸空轉。而唐玉龍轉讓股份是在一年之後，不可能對此毫不知情。

在理財用新的融資來償還舊的欠款，這樣長期非法佔有投資人的資金，但這一點就已經違法。

下圖為公司內部人士的披露：



該內部人士是唐玉龍的清華校友，當初是因為唐玉龍介紹才進去他們公司的，她也在在理財投資了不少錢，目前無法提現，聯繫唐玉龍和許赤瑜都不回應。

是合作夥伴，還是合夥詐騙？

在理財和王偉的合作，根本就是合夥詐騙，所謂的房產抵押，根本就是幌子（房子抵押給王晨，而非在理財，並且抵押權均已經過期）。而實質就是，在理財的合作夥伴王偉空手融資，在理財幫助他們矇混投資人，騙取投資人的資金。

王偉及其公司，同時也是中投國泰旗下另一家 P2P 公司（車融資）的合作夥伴。在理財法人許赤瑜披露，由於「合作夥伴」的問題，車融資已經損失 2800 多萬。



從 2016 年 8 月提現困難以來，在理財法人許赤瑜找各種借口拖延時間，後面就乾脆玩消失，不回應投資人的任何問題，把熟人的電話和微信拉黑，而唐玉龍則推脫自己的責任。直到目前為止，本人的投資未收到一分錢回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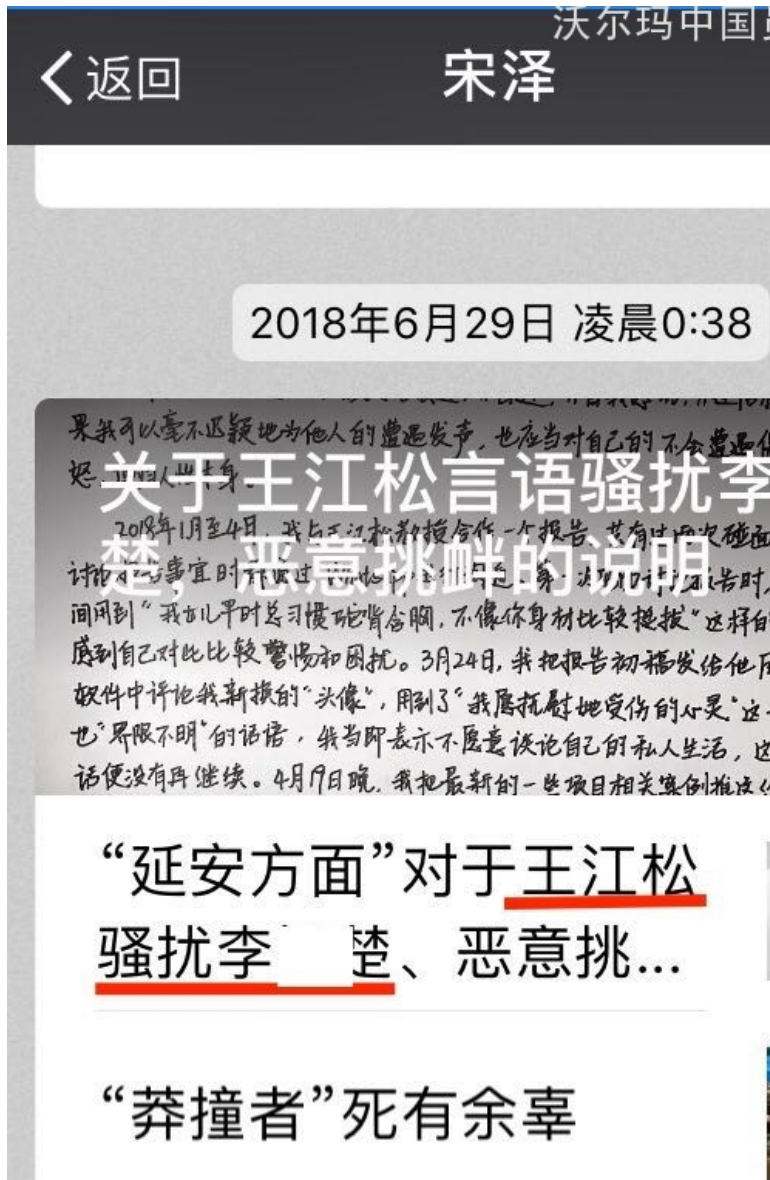
就算拿不回投資的錢，也要把 P2P 非法融資曝光在陽光底下！讓後來人引以為戒！

混迹民运圈、标榜劳工维权的王江松教授所鼓吹的民主是什么东西？
(2019年2月24日)

张军

前言

原中国劳动关系学院的王江松教授近些年来靠披着民主的外衣在民运圈、工运圈里兜售其所谓的民主，混的的可谓风生水起，在这里我们不谈王江松教授的性骚扰女性的私德问题（王江松叫兽屡屡被指控有性骚扰女性的行为）：



我们谈谈王江松教授所鼓吹、标榜的民主是什么东东？看看本文介绍王江松教授为了一己之私大搞山头主义、搞伪民主打压舆论的五行吧：

沃尔玛中国员工联谊会博客失效的情况说明及对有关人员卑鄙行径的谴责

沃尔玛中国员工联谊会新闻发布之 108

张军 沃尔玛中国员工联谊会新闻发言人

一、沃尔玛中国员工联谊会博客屡遭封杀让人痛心与愤怒。

沃尔玛中国员工联谊会（联谊会）博客于 2018 年 03 月 30 日再次被封杀，上次被封杀的时间是 2018 年 02 月 07 日。

自 2016 年 05 月开始，广大沃尔玛员工在联谊会这一网络平台上发起了抵制综合工时制的维权行动以来，联谊会通过博客起到以下作用：

1、团结广大沃尔玛员工相互声援与支持、及时揭露综合工时制的危害、谴责打击和曝光工贼、争取外界声援与支持；

2、国内外媒体、论坛网站及专家学者等大都是从联谊会的博客开始了解沃尔玛工人的维权现状，并引用或转载联谊会博客的文章，这对让外界及时了解、支持沃尔玛工人的维权斗争；

3、积极宣传法律知识、分享维权经验、提醒广大沃尔玛员工在维权中应当注意的维权事项；

可就是这样一个对沃尔玛工人维权立下战功赫赫的的博客却接连遭到王某某的封杀，联谊会从抵制综合工时制以来，仅仅在新浪网的博客先后被封杀的就有：

1、 <http://blog.sina.com.cn/wmuni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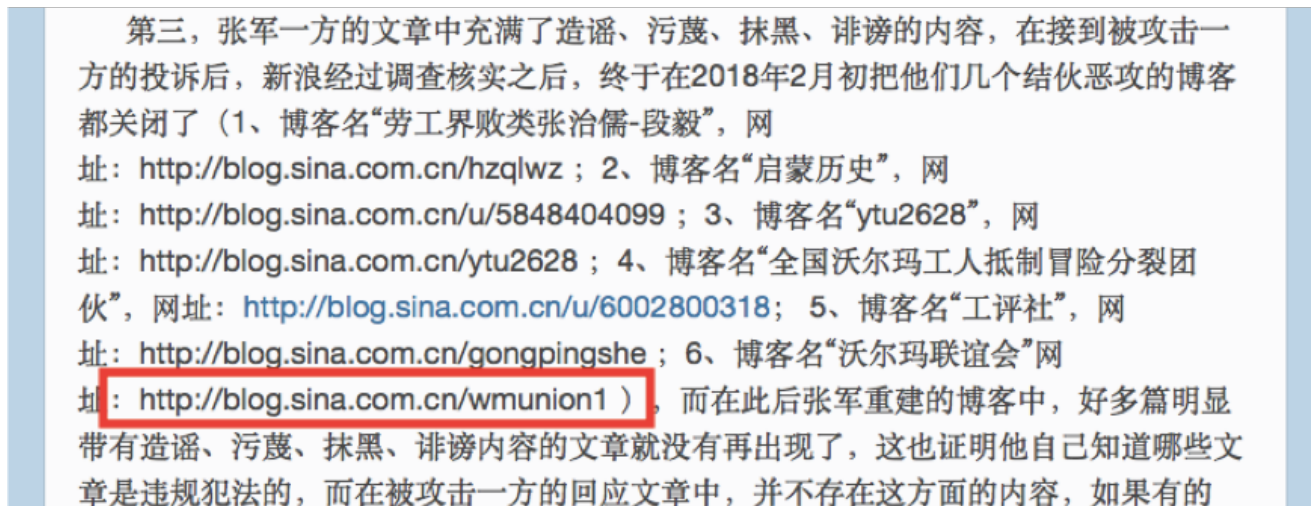
2、 <http://blog.sina.com.cn/strikeunion>

3、 <http://blog.sina.com.cn/wmunion1>

4、 <http://blog.sina.com.cn/wmunion2>

王某某方面也供认联谊会博客的封杀系其所为。

下图中联谊会博客网址链接赫然出现在被王某某方面的封杀名单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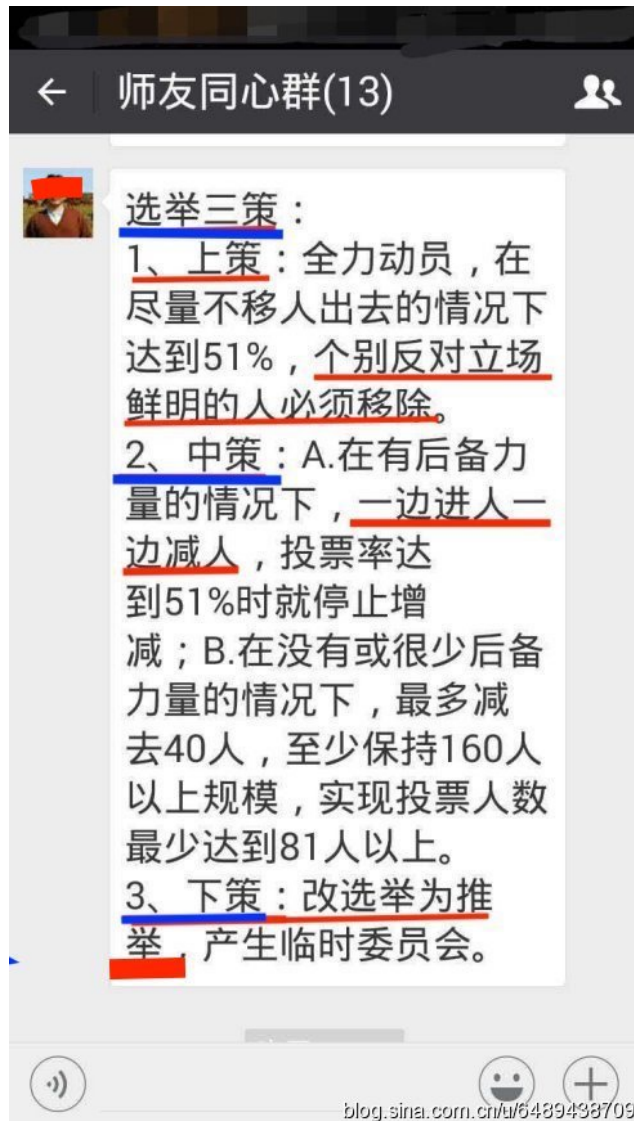


在2018年3月30日联谊会的博客遭到封杀之前，同上次封杀之前一样，先是王某某到联谊会博客对依据事实、证据揭揭露其丑闻的文章予以收藏“取证”



二、接连封杀联谊会博客的王某某是何须人也？

据王某某向沃尔玛员工宣传自己称：原系某学院教授，后来因为参与了劳工的维权，被免除了教授的职务……。



我们仅从王某某幕后主使选举某维权组织的“选举三策”就可以看出他所兜售的民主是什么东西。

三、王某某一直为段毅律师等人组成的所谓沃尔玛工人维权团队摇旗呐喊，向沃尔玛工人鼓吹维权就是要靠他们。

2016年7月初，段毅律师等人跑到南昌劝阻沃尔玛工人罢工转而去搞什么集体诉讼（仲裁），却至今未立案，结果是葬送工人维权的大好形势，这是对工人维权活动一个极大的破坏。工人复工后不久，若干维权积极分子遭到资方打击报复被解聘，对自己因当初没有将罢工进行到底而后悔不迭，这就是王某某一直为之鼓吹摇旗呐喊的段毅律师维权团队所干的“好事”！由此可见，王某某忽悠的主张对于工人来说就是灾难。

事后，王某某以南昌劳动部门迟迟不予立案等所谓的外界原因为借口，来掩饰段毅律师团队对工人维权的破坏作用。

四、王某某争权夺利、好大喜功。

沃尔玛工人维权在遇到最大困难、最需要帮助的时候，王某某不是提出具体可行的维权建议，而是去莫名其妙的搞什么三层组织架构的组织模式，搞什么选举，这些东西对沃尔玛工人维权没有任何实际意义，事实也证明了他们的“全面失败”。

王某某在实施对联谊会的争权夺利中，把什么“总统”、“内阁”、“外交部长”、“政变”等词汇都排上了用场，由此可见一个擅长造谣搞伪民主的人，能担当工人维权的大任吗？

联谊会奉劝王某某一句老话：“**联谊会的职务并非是某些人所想的是权力的象征，也不是某些心术不正的人借以敛财、鼓吹的工具，而是一个荣誉、一个期待、一个责任，更是一个艰辛、付出的担当。**”

五、王某某在得不到工人信任无法兜售选举三策式民主时，就会搞一些小圈子，甚至利用所谓的资金项目支持来笼络人心，做一些挂羊头卖狗肉的事情。

2016年7月初，在联谊会负责人张军与兜售王某某民主的张某某在一个微信群发生言辞冲突时，叶子（化名）在群里目睹了这一切，并说了句旨在平息冲突的话，王某某看到眼里记在心里。不久后，王某某就安排某人联系叶子，以每年给予柒仟多元的项目资金支持为诱饵，隐晦的提出叶子能战队到王某某一边来针对联谊会负责人张军。叶子断然拒绝了王教授的“好意”。

2016年7月下旬，张军在老家与段毅律师见面时，段毅律师曾经明确告诉张军：只要张军承诺不与王某某“为敌”，来年春天就可以帮助张军在烟台成立环渤海 NGO……。

2016年8月初，还是段毅律师对沃尔玛工人维权女工代表游天玉称，王某某教授曾经拿出两万元资助联谊会，但是联谊会表示对此不知情。游天玉就公开质疑王某某到底是把钱给谁了？王某某矢口否认此事，并公开发表演讲辱骂游某某脑子有病、做人没有底线。段毅律师和王某某两人中必有一人在撒谎，到底是谁在撒谎？又是处于什么目的？

我们尚不得而知王某某方面的资金是从何而来，但是可以确定的是：王教授的资金支持方绝对不允许他拿资金去搞这些破坏、分裂工人运动与团结的事情。我们更尚不得而知王江松等人采用“项目”资金支持的这种方式，具体是笼络了多少无耻之徒加入到他们针对联谊会的骂战队伍中去。

六、已经开始有越来越多的沃尔玛员工认清了王某某假、大、空的本质。

沃尔玛员工的眼睛是雪亮的，这两年来，尤其是深圳的沃尔玛员工早已发现王某某等一伙人行事方式的假大空，喜欢搞小圈子，实际上没有做成任何事情，反而把原本一个很好的维权形势给破坏了，已经有深受其害的沃尔玛员工站出来公开揭露他们，比如王某芳、黄某某、游某某等沃尔玛员工等就公开揭露王某某及其一直为之鼓吹的段毅律师团队的丑闻。

王某某看到联谊会还能够继续坚持的做了一点点成绩，是看在眼里恨在心里，就怕沃尔玛员工认为联谊会能做事而王某某不能，就不断的去“举报”联谊会的网络平台，企图把联谊会一个给破坏掉。

近两年来，在深圳、南昌、北京、沈阳、昆明、重庆……等区域联谊会维权代表和联谊会一起共同努力下，联谊会支持了全国各地多起案例是有目共睹的，联谊会还有更多的业绩将会陆续公布于众。

七、联谊会强烈谴责王某某破坏联谊会封杀博客的卑鄙行径！封堵联谊会的嘴就以为能够掩饰他们的全面失败和丑恶行径吗？

王某某等极少数一伙人总是诬陷联谊会博客在造谣抹黑他们，但是却拒不敢指出具体的造谣抹黑之处，**网上言论观点虽然外人难以考证真伪，但却可以凭借王某某等一伙人以往“自认”的言行（视频、截屏等）以正视听、以辩真伪。**

为了反制王某某持续不断对联谊会博客的封杀，联谊会再次建立了新的博客（见文尾），联谊会的网站也在建中，请广大沃尔玛同事们分清联谊会的博客，不要被欺骗。

联谊会的档案库中也对博客、网站等相关资料做了备份，一旦遭到封杀将会很快重建。联谊会将静观王某某下次将在何时封杀联谊会包括博客在内的各种网络平台。

联谊会呼吁广大沃尔玛员工在日常的工作中遇到劳资纠纷问题、在被解聘或即将被解聘时，能及时向联谊会寻求联系和帮助，联谊会将会根据案情具体情况按照援助流程提供诉前法律支持、筹集律师费等。

为什么说“中帝论”就是不折不扣的革命渺茫论？

（2019年4月2日）

作者：风浪起

青年先锋网分上、中、下三篇“转载”了署名“东风”的辩论文章——“帝国主义还是半外围——论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根本分歧”。这篇文章对于红色中国网、井冈山卫士、远航一号以及其他反对“中帝论”的同志极尽歪曲污蔑之能事，又对自己一知半解的世界体系理论加以篡改和曲解。凡此种种，因篇幅限制，笔者就不一一揭露了。

这里仅就东风先生的几个主要错误观点展开一下批判。

中国是“不折不扣的”帝国主义国家吗？

东风先生认为：“要判断中国的社会性质，只能从中国社会的生产关系的根本性质出发，运用马列毛主义的科学原理和概念来得出结论。”

笔者赞成东风先生的观点。但是笔者也要指出，马克思、列宁、毛主席的科学理论都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为了指导一定的革命运动而产生的。无论马克思、列宁还是毛主席都不可能预见到今天中国资本主义条件下阶级斗争的具体条件和具体规律。自本世纪初以来，中国的马列毛左派队伍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是今天中国的马列毛左派在政治上和理论上都不成熟，对于马列毛主义理论的认识并不一致，其中还掺杂了大量的来源于小资产阶级的机会主义和宗派主义的错误思想。所以，在这样的条件下，谁也没有资格自称就掌握了判断马列毛主义科学真理的标准，并根据自认为掌握的“真理”对别人指手画脚。从根本上来说，与当代中国资本主义具体条件相符合的马列毛主义的真理，只能在中国无产阶级过去与将来的斗争实践中才能被发现、被检验，并发挥其伟大的历史作用。

东风先生认为，列宁在《帝国主义论》中已经给帝国主义下了科学的定义，并且引用了列宁所列举的帝国主义的五个基本特征。东风先生进一步提出：“根据列宁的科学定义，我们认为判断一个国家是帝国主义国家的基本标准应该是：第一，该国资本主义发展到了垄断资本主义的阶段、本国垄断资本在国民经济中占据统治地位；第二、该国垄断资本进行了重大的资本输出，对世界市场进行了争夺。我们认为第一个标准是最根本的标准，第二个标准是重要的、但却是附属的标准。...用这两个标准来衡量，中国正是不折不扣的帝国主义国家。”

东风先生对于世界体系理论一知半解、不懂装懂，对于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学习得也很不认真、很不仔细。在“再谈怎样学习列宁的《帝国主义论》”一文中，远航一号同志就已经指出了，仅仅教条主义地照搬列宁列举的帝国主义五个基本特征并且将中国资本主义的若干经济现象将其与一定历史发展阶段的复杂联系割裂开来、然后与列宁所列举的五个基本特征做机械的对比，是不可能对于帝国主义问题达到科学认识的。

那么，列宁对于自己所给出的帝国主义定义是采取怎样的态度呢？在《帝国主义论》第七章中，列宁在提出帝国主义五个基本特征之前，特意给出了如下的说明：

如果必须给帝国主义下一个尽量简短的定义，那就应当说，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垄断阶段。这样的定义能包括最主要之点…过于简短的定义虽然方便（因为它概括了主要之点），但是要从中分别推导出应当下定义的现象的那些最重要的特点，这样的定义毕竟是不够的。因此，如果不忘记所有定义都只有有条件的、相对的意义，永远也不能包括充分发展的现象一切方面的联系，就应当给帝国主义下这样一个定义，其中要包括帝国主义的如下五个基本特征…

大家看，列宁对于自己所给出的帝国主义定义，采取的是谦虚谨慎的态度，也是真正科学的态度。列宁指出，所有定义“只有有条件的、相对的意

义，永远也不能包括充分发展的现象一切方面的联系”。就是说，列宁所给出的关于帝国主义的定义，是“有条件的”，首先是针对列宁时代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和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实践；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要正确运用它，而不是机械照搬。对于任何一个定义，都要将其放到“充分发展的现象一切方面的联系”之中，这样才能够符合实际，才能真正用来指导实践。

东风先生说，只要“该国资本主义发展到了垄断资本主义的阶段、本国垄断资本在国民经济中占据统治地位”，这个国家就是“不折不扣的帝国主义国家”。为了论证中国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了垄断资本主义阶段，东风先生做了这样的说明：“复辟以来，官僚垄断资本（及后来的国有垄断资本）始终控制着国民经济的命脉、控制着银行、金融、军工、交通、能源、通讯、重大装备及材料工业等国民经济的关键领域。此外，复辟以来，私人资本也在官僚资产阶级的扶持下得到大力发展，并在其中发展出了新的垄断资本集团，也成为中国垄断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上可见，中国复辟资本主义以来，就进入了垄断资本主义阶段，本国垄断资本就在国民经济中处于统治地位。”

在列宁时代，世界上的垄断资本主要集中在少数帝国主义国家。因此，将“生产和资本的集中发展到这样高的程度，以致造成了在经济生活中起决定作用的垄断组织”作为帝国主义的一个基本特征，是符合实际的。但是，我们都知道，资本的积聚和集中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一般趋势。现在，距离列宁的时代已经一个世纪了，由竞争到垄断的发展，不仅在核心国家早就实现了，就是在绝大多数外围、半外围国家也基本实现了。今天的世界上，恐怕已经找不到任何一个较有规模的资本主义国家其主要经济成分，还是家族式的自由竞争资本主义。

即使以“本国垄断资本在国民经济中处于统治地位”来说，在大批外围和半外围国家中也是常见的经济现象。比如，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巴西在瓦加斯执政时期，就以国有资本为主导，控制了银行和重工业等主要部门，推进“进口替代工业化”，“通过一系列限制外资和国有化措施，巴西基本上实现了‘国家资源国有化’，并把国家经济命脉控制在政府手中”；“在瓦加斯两

次执政时期... 强调国民经济各部门的主导权和经济活动的决定权，应掌握在本国国有企业和私人民族企业之手。对外资虽持欢迎态度，但它在任何部门都不得占据统治地位。”（见陈才兴，“比较优势、技术模仿：巴西‘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之路”）。

再以外围大国印度为例，“相对于中国，印度的国有企业比例更高，覆盖面更大。印度涉及国计民生的所有行业全是垄断国企，如金融、铁路公路、电信、邮政、公用事业。”（见网络文章，“印度其实是个社会主义国家：计划经济搞得比中国还早”）

再以非洲的埃及为例，在纳赛尔统治时期，实行所谓“阿拉伯社会主义”，“全面推行国有化政策，实行计划经济... 到 1963 年，从国有部门创造的国民生产总值在国家经济各部门中所占比例看，工业和电力部门达 60%，交通部门达 75% ... 国家已经控制 82 家私有公司将近一半的资产。”（见王泰，“埃及经济发展战略及发展模式的历史考量”）

可见，东风先生所列举的关于垄断资本主义的基本特征，适用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许多外围、半外围国家的一般情况。如果不是像列宁那样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忘记所有定义都只有有条件的、相对的意义”，不经常考虑到“充分发展的现象一切方面的联系”，而是照搬几条“基本特征”，那么就不会会如东风先生所愿，轻松论证中国是“不折不扣的帝国主义国家”，而且还会不可避免地得出瓦加斯领导下的巴西、尼赫鲁领导下的印度以及纳赛尔领导下的埃及都是发展到了“垄断资本主义阶段”、“本国垄断资本在国民经济中占据统治地位”，因而都是“不折不扣的帝国主义国家”那样荒谬的结论。如果像中国、印度、巴西、埃及那样的国家全都是“帝国主义国家”，世界上还剩下多少“被压迫民族”呢？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不就成了一个多数人压迫少数人的体系而不是少数人压迫多数人的体系了吗？这难道就是东风先生的“科学的”马列毛主义吗？

中国资本主义的“资本输出”

再来看看东风先生的第二个，据说是“重要的、但却是附属的标准”。东风先生列举了 2016 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一些数据：“2016 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创下 1961.5 亿美元的历史新高，同比增长 34.7%，在全球占比达到 13.5%，对外投资流量连续两年居全球第二。”然后，东风先生很有信心地下结论说：“以上统计数据，充分证明了中国已经成为重要的资本输出国，中国垄断资本是世界市场的主要争夺者之一。”

首先要说明，中国不仅是世界上主要的资本输出国之一，而且仍然是世界上主要的资本输入国之一。截止 2017 年，中国累计对外直接投资存量 1.81 万亿美元，在中国境内的外商投资企业外方注册资本 2.83 万亿美元。两相比较，中国仍然是净直接投资输入国。外商在中国的投资中，绝大部分在制造业等生产性部门以及与物质生产部门直接相联系的商业、信息技术服务业等部门，通过剥削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廉价资源攫取超额利润。

那么，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发生在哪里呢？俗话说，魔鬼常常在“细节”之中。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细节又是怎样呢？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国家数据”，2017 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 1.81 万亿美元，其中，对亚洲直接投资 1.14 万亿美元（占全部对外直接投资的 63%），对非洲直接投资 430 亿美元（占全部对外直接投资的 2.4%），对欧洲直接投资 1100 亿美元（占全部对外直接投资的 6.1%），对拉丁美洲直接投资 3900 亿美元（占全部对外直接投资的 21%），对北美洲直接投资 870 亿美元（占全部对外直接投资的 4.8%），对大洋洲直接投资 420 亿美元（占全部对外直接投资的 2.3%）。以上，中国对于欧洲、北美洲和大洋洲的直接投资都属于对帝国主义地区的投资，显然不可能到那里去剥削“被压迫民族”。

在中国对亚洲的直接投资中，对香港的直接投资是 9800 亿美元（占全部对外直接投资的 54%），对新加坡的直接投资是 450 亿美元（占全部对外直接投资的 2.5%），此外中国对澳门直接投资 97 亿美元，对日本直接投资 32 亿美元，对韩国直接投资 60 亿美元。

中国对拉丁美洲的直接投资中，对开曼群岛的直接投资高达 2500 亿美元（占全部对外直接投资的 13%），对英属维尔京群岛的直接投资高达 1200 亿美元（占全部对外直接投资的 6.7%）。

可见，中国的所谓对外直接投资中，有大约 1.4 万亿美元（占全部对外直接投资的 77%）是投在了香港、澳门、新加坡、开曼群岛和英属维尔京群岛等境外金融中心和避税天堂，带有明显的资本外逃和洗钱的性质；另有约 2500 亿美元（占全部对外直接投资的 14%）是投在了欧洲、北美洲、大洋洲、日本、韩国，其中绝大部分是帝国主义国家或非帝国主义的核心国家。真正投在广大亚非拉外围地区的中国资本，累计不过约 1600 亿美元，约占中国全部对外直接投资的 9%。

这说明，中国资本主义的所谓“资本输出”绝大部分带有资本外逃或者为中国资本家另谋“后路”的性质，只有极少部分可以算是剥削“被压迫民族”的，并且这种剥削之不过相当于中国无产阶级被外国资本剥削量的一个零头。中国资本主义的“资本输出”因而带有明显的半外围而绝非帝国主义的性质。

“中帝论”就是革命渺茫论

在以往的辩论中，井冈山卫士、远航一号等同志都曾经指出，认为中国是帝国主义国家，实际上就是认为中国资本主义可以通过对外围地区的剥削，攫取大量的超额剩余价值，从而使得中国的资产阶级可以从无产阶级中培养大量的“工人贵族”，奠定改良主义的物质基础。在这个问题上，“中帝论”者实际上与他们表面上最“痛恨”的工业党、强国派、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在认识上并无二致，都认为中国资本主义必然越来越强大，进而可以向美帝国主义争霸。正因为如此，井冈山卫士、远航一号等同志才指出，坚持“中帝论”，实际上就是放弃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前途。

东风先生似乎意识到，井冈山卫士、远航一号等同志打中了“中帝论”的要害。东风先生也不得不承认，“在主张‘中帝论’的同志中，也有一

些人否认中国帝国主义的特殊性，否认中国工人阶级的革命潜力，否认社会主义革命主要策源地的伟大前景”。东风先生没有说明，这些信奉“中帝论”的同志，为什么会否认“中国工人阶级的革命潜力”，为什么会“否认社会主义革命主要策源地的伟大前景”，这种否认与“中帝论”自身之间是不是存在着逻辑关系，与信奉“中帝论”的许多同志的小资产阶级阶级属性之间又是不是存在着必然联系？

东风先生接下来用了很长的篇幅来辩解：“把中国定性为帝国主义，绝不等同于‘革命渺茫论’。”在东风先生看来，那种主张“革命渺茫论”的“中帝论”，是“不正确”的“中帝论”，而东风先生所主张的“正确”的“中帝论”则认为：“中国帝国主义存在尖锐的内外矛盾，正是当前帝国主义列强中的薄弱环节。”

东风先生是如何来论证中国帝国主义是“当前帝国主义列强中的薄弱环节”的呢？“首先中国帝国主义具有极其尖锐的内部矛盾。由于中帝没有老牌帝国主义列强的国际体系霸主地位，没有稳固的势力范围，垄断资本只能主要以剥削国内剩余价值为主，而没有充裕的超额剩余价值来收买无产阶级、缓和社会矛盾...这就必然使得中帝要努力保持‘世界工厂’的地位，要始终维持一支规模最为庞大的、廉价的（也就是受到深重剥削压迫的）无产阶级队伍。从而必然使得阶级分化难以延缓，整个社会日益分化为一小撮权贵富豪（国有及私人垄断资本巨头）和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底层无产大众，阶级矛盾极其尖锐化。”

这一段话，对于红色中国网的读者来说，恐怕是有些依稀仿佛、似曾相识。且看去年远航一号同志答复“太平洋的风”的文章中，有这样一段论述：

“在当前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中国不是一个帝国主义国家，而是一个半外围国家；这种半外围的地位，决定了中国资本主义不可能在‘从自己国家工人身上榨取的利润之外’获得大量的超额利润，从而也就没有培养工人运动改良主义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又因为中国是一个主要从事出口制造业的半外围国家，这就决定了中国必然有一支规模庞大的无产阶级队伍，并且资本主义的

发展必然为无产阶级的壮大和组织准备物质的和社会的条件；发展起来的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日益增长的斗争能力和要求必然要超越中国资本主义所能够容纳的范围。这些，在我们看来，是中国的无产阶级斗争必然要走上革命道路并且突破资本主义狭隘界限的基本历史依据。”

在“红色中国网工作组致青年马列毛左派积极分子的建议书”中，有这样几段论述：“中国资本主义的基本特点是什么呢？是所谓“帝国主义”吗，是所谓与美帝争霸吗？都不是的。中国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一个半外围国家。就是说，中国不再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外围国家... 中国也不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核心国家，因为中国在与核心国家的经济交往中仍然受到不平等交换的大量剥削，因为中国的资本家阶级在国际资本主义的分工中得不到超额利润或超额剩余价值而只能得到一般利润。中国经济参加国际资本主义分工的主要部门仍然是出口制造业，中国的出口制造业仍然要依靠剥削大量廉价劳动力和廉价资源来维持其所谓竞争力。”

“作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一个半外围国家，中国经济参加国际资本主义分工的主要部门是出口制造业，而出口制造业又建立在对大量廉价劳动力残酷剥削的基础上。所以，在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必然要造成一个数量庞大的工业无产阶级，而中国的无产阶级又必然要逐步地组织起来并且按照在实践中行之有效的方式对资产阶级展开越来越有力的斗争。”

“在半外围资本主义发展的一定阶段，由于无产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壮大，无产阶级的斗争和小资产阶级的社会运动都将发生高涨。作为半外围国家，既不能在高技术领域与核心国家竞争，又不能在低成本领域与外围国家竞争，从而其资本积累的要求与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社会和政治要求发生尖锐不可调和的冲突，进而陷入积累危机和政治危机。”

东风先生想要说明“中国帝国主义”有着“特殊性”，有着“极其尖锐的内部矛盾”，但是他从“中帝论”出发又无法得到他想要的结论，于是便只能抄袭红色中国网，在事实上（虽然不是口头上）承认中国实际上是世界资本主

义体系中的一个半外围国家，因而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不能够获得“充裕的超额剩余价值”。

然而，由于东风先生毕竟是在抄袭，所以颇有些知其然却不知其所以然。东风先生只知道抄袭中国资本主义在世界上得不到“充裕的超额剩余价值”，却不能够真正理解半外围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条件。毕竟，世界上得不到“充裕的超额剩余价值”的资本主义国家数以百计，但其中的绝大部分在可预见的将来是不具备革命条件的。可见，仅仅是得不到“充裕的超额剩余价值”是不足以造成无产阶级革命（乃至其他革命形势）的充分条件的。

半外围的资本主义国家之所以阶级矛盾会特别尖锐，之所以可能产生无产阶级革命的条件，不仅仅是因为这些国家得不到“充裕的超额剩余价值”，而且还因为半外围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化有相当的发展，因而可以为无产阶级的发展壮大准备必要的物质和社会条件，从而造成无产阶级力量上升进而突破半外围资本主义所能容纳的狭隘界限的条件。

东风先生因为是抄袭红色中国网，就像他机械照搬列宁的一些语录一样，食而不化，因而只能得出诸如“阶级分化难以延缓”、“整个社会日益分化”一类似是而非、含糊其词的结论，却只字不提半外围条件下的资本主义工业化必然造成无产阶级的发展壮大和斗争力量上升。

这恰恰说明，无论东风先生怎样狡辩，他与那些不革命、不正确的“中帝论”者一样，实际上“不相信无产阶级的力量、畏惧资产阶级，夸大资产阶级的强大，用口头激进来掩盖自己实际上认为革命无望、社会主义遥遥无期的真实心理。”

“热战”和“冷战”

由于东风先生不懂得或者不相信中国无产阶级的力量，那么就只有把希望寄托于“尖锐的外部矛盾”了。在东风先生看来，“中帝”必然要“挑战美帝的霸主地位，力争取美帝而代之，或至少从其领导的统治体系中分割出一大块，从而建立中帝稳固的势力范围，获得充足稳定的超额利润来源，以缓和内

部矛盾，保证垄断资本的统治和继续发展。”为此，“老牌帝国主义列强一定会竭尽所能地运用自己的军事和经济优势来遏制中帝（这就是贸易战的背景）。要打破这种遏制，改变力量对比，不经过一场全面的、毁灭性的战争，或者长期、残酷的冷战，是不可能的。”

这里且不论从中国资本主义的基本特点、中国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以及中国资产阶级上层的胆识来说，中国资本主义有没有可能真地向美帝国主义争霸并且发展到与美帝“殊死”斗争的地步。就从纯军事观点来说吧，中国资产阶级虽然腐朽，但是对于世界资本主义秩序一向是“很负责”的，不掌握绝对的军事优势（特别是海空军的优势），恐怕是不敢贸然发动一场“全面的、毁灭性的战争”的。东风先生自己也说，“中帝的军事实力尚与美帝有较大差距，经济实力与老牌帝国主义列强整体相比也仍处于劣势。”即使是美帝维持其现有的军事实力不变（显然是不可能的），中国资本主义的军事实力要赶上美帝现在的水平恐怕也要几十年的时间（且不论在高技术武器方面的差距不是光凭扔钱就可以弥补的），要想再确立对美帝的绝对优势，还要再加上几十年。如此说来，要等待东风先生所谓的“全面的、毁灭性的战争”，没有一个世纪左右的时间恐怕是等不到的。

那么美帝国主义会不会主动针对中国发动一场“全面的、毁灭性的战争”呢？这里且不说美国人民必然要进行的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斗争，美国资产阶级也是讲现实的。以美国近年的战争经验来说，美国在本世纪初，动用了其全部陆军一半以上的兵力、花了上万亿美元，出动了所有最先进的常规武器，居然消灭不了伊拉克、阿富汗两个贫弱国家中的游击武装，乃至建立不起稳定的亲美政权。有了这样的经验，美国资产阶级还会贸然对某个大国发动“全面的、毁灭性的战争”吗？反过来说，如果美国资产阶级真的有把握对中国发动“全面的、毁灭性的战争”，这难道不会同时“全面”“毁灭”中国无产阶级的革命力量吗？

与以往的“中帝论”相比，这次东风先生有了一定的“进步”，或者说变通，那就是不再坚持中美争霸必然导致帝国主义大战，而是多留了一手，“热

战”行不通了，就转进为“长期、残酷的冷战”。据说，“冷战”也是中帝和美帝“殊死”斗争的一种方式。什么样的“冷战”可以算“长期、残酷的冷战”呢？过去美帝和苏联之间的“冷战”，可以算“长期”，但是能算“残酷”吗？苏联在“冷战”的绝大部分时间里都顺利地发展了它的经济力量和军事力量。苏联垮台，是官僚特权集团窃取了领导权以后苏联社会主义内部矛盾发展的结果，外因只是次要因素。

美国现在对中国进行的所谓“贸易战”可以算“残酷”吗？有意思的是，东风先生口口声声反对民族主义，但是对于“贸易战”的看法与民族主义分子如出一辙，都认为是因为中国“强大”了、美帝国主义要蓄意围堵中国的结果。

东风先生，你算算帐，所谓“贸易战”，涉及的不过几千亿美元商品，其关税额不过几百亿美元，相对于中国约 15 万亿美元的经济规模，不过百分之零点几；再加上对中兴、华为等个别资本家的敲打。这样一点点威胁，不要说与美帝对毛主席领导下的社会主义中国长期进行的贸易和技术威胁不可同日而语，就是与 1989 年后美帝实行的“制裁”相比也是小巫见大巫。这算得上“残酷”吗？算得上“殊死”吗？对于这样一点点威胁，就如临大敌，不过是充分说明了作为半外围地位的中国资产阶级的买办性和依附性。

不要说社会主义中国，哪怕现在的中国还有一定的国家资本主义的调节能力，面对美国对中兴、华为的威胁，完全可以以此为契机，独立自主地发展半导体产业方面的核心技术，就此摆脱对国外技术的依赖，而何必去许诺买上万亿美元的美国货，外加“每天”五百万吨大豆，乃至欢迎联邦调查局派员到中国公司现场监督对于美国“制裁”的执行，来讨美帝国主义的欢心？现在吓得连“中国制造 2025”都不敢说，这哪里有一点与美帝国主义“殊死”争霸的样子。

不过，与反对“中帝论”的同志相比，东风先生对于中帝在经过“殊死”斗争以后成为世界霸主的前景，似乎还是很有信心的（我看比中国资产阶级都

有信心），以至于在那里很认真地探讨“中帝能为全世界人民提供一个超越现有帝国主义统治体系的更好的世界吗？”

按照东风先生的“革命”设想，所谓中国帝国主义是“帝国主义链条的薄弱环节”，无非是中帝“如果夺取了世界霸权，就必然更加加重对全世界人民的剥削压迫，造成更深重的灾难、更严重的危机。”“即便夺得了世界霸权，也绝不可能‘千秋万代’，反而会大大加速全球资本主义的崩溃。”

且不说东风先生所许诺的这些空话有没有任何实际的内容。如果咱们把东风先生心目中的“革命”时间表推算一下，要等待中帝和美帝进行一场“全面的、毁灭性的战争”，这恐怕要等上一百年。然后，如果美帝获胜，全球资本主义还不一定崩溃，因为剥削压迫全世界人民的人口还不够多，全世界人民的灾难还不够“深重”。只有中帝获胜了，才能带来“更深重的灾难”，“加速全球资本主义的崩溃”。这个过程，恐怕又要等上少则几十年、多则上百年。

东风先生，说你是“革命渺茫论”，可不可以说，是名副其实、不折不扣呢？

自己“证伪”自己的阳和平先生 —— 尴尬不尴尬？ (2019年5月20日)

红色经济观察编写组

红色中国网开始发布今年的《红色经济观察》系列以来，引起了许多朋友的关注，其中也包括我们的老朋友阳和平先生。阳先生为此专门撰文：“工资上涨真的能压垮资本家吗？——用数据说话来分析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起源”，发表于激流网（<http://jiliuwang.net/archives/81798>）。

在这篇文章中，阳和平先生花了不少心思，费了不少力气，一心要批倒利润挤压危机学说。所谓利润挤压危机学说，就是认为在一定条件下、资本主义积累会导致工人阶级力量上升并导致资本家利润率下降进而引起经济危机的观点。在最近几期红色经济观察中，红色经济观察编写组分别论述了工人阶级力量的上升或下降对于中美两国资本家的利润率和资本主义积累的影响。这些论述，与利润挤压危机学说有一定的联系。所以，阳先生的批判主要是针对红色经济观察编写组的。

阳和平先生对于利润挤压危机理论的概述是这样的：“这种理论大致可以概括为：在经济复苏期，随着失业率的下降，工人阶级在经济上讨价还价力量的上升，引起工资水平的上升，进而挤压了资产阶级的利润。此刻，资产阶级不得不反扑，用减少投资，关闭工厂，打压工会，抬高失业率，制造经济危机的手段来制服工人阶级。而后利润率得以恢复，经济复苏，工人阶级的力量又在上升，直到资产阶级的再次反扑。”阳先生的这段概括，好像符合利润挤压危机学说的思想，但是有几个关键的地方不准确（不准确的地方下面另行说明）。

阳先生认为，正确的经济危机理论只能是生产过剩危机论：“生产过剩危机论的基本观点是除非资本放弃逐利的本性，资本主义的生产过剩危机是不可克服的。虽然微观上单个企业工人在工资上的妥协有可能挽救临近破产的企业，但是宏观上却适得其反。工资普遍地下降会加重生产过剩的危机。”从阳先生的这段叙述以及阳先生以往的文章来看，阳先生所理解的资本主义生产过剩是生产过剩的一种特殊形式：即在“工资普遍下降”的条件下，导致工人阶级购买力下降，进而引起消费水平下降，从而导致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这种形式的生产过剩经济危机学说，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文献中，也叫做消费不足危机学说。

在阳先生看来，利润挤压危机理论必然导致改良主义的结论：“利润挤压危机论的不可避免必然结论是：只要工人阶级对工资的要求不‘过分’，或资产阶级能够有效地打压工资，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是可以克服的。……无论

利润挤压学说信奉者们的主观愿望是什么，客观上它给改良主义提供了一个虚伪的理论基础”。

阳和平认为，这种“改良主义”的利润挤压危机理论，既不符合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论述，也与资本主义经济的“事实”不符。为了说明后一点，阳和平先生特意采用计量经济学的方法，做了好几组回归分析，以达到“证伪”利润挤压危机学说的目的。

下面咱们就先从马克思的《资本论》说起。

《资本论》中的“绝对生产过剩”

为了反驳工资上升可以导致利润率下降的假设，阳和平先生引用了《资本论》第一卷第 23 章中的一段论述：“积累量是自变量，工资量是因变量，而不是相反。”

确实，“积累量是自变量”。但是，是在什么条件下呢？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工人在一定时期的就业水平和工资水平都是由资本积累的水平 and 速度来决定的。但是，资本积累的水平 and 速度又是由什么决定的呢？显然，是由资本家的利润率来决定的。那么，资本家的利润率是不是会受到阶级斗争以及由阶级斗争所决定的工资水平的影响呢？

就在阳和平先生所引用的同一段落中，马克思还有这样一段话：“积累由于劳动价格的提高而削弱，因为利润的刺激变得迟钝了。积累减少了。”显然，这段话的意思是，在一定条件下，劳动价格（即工资）的提高可以导致利润率下降，而利润率下降又会导致积累减少。也就是说，在一定条件下，是工资的提高引起了积累的削弱或减少。我们能因此就说马克思违反了他自己所说的“积累量是自变量，工资量是因变量”吗？

阳和平先生坚持认为，（由工资下降和消费不足引起的）生产过剩危机说是唯一正确的经济危机理论。与阳和平先生不同，红色经济观察编写组以及绝大部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都认为利润挤压危机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几种可能倾向之一。在资本主义积累过程中，可能发生的矛盾是多种多样的，可能因为资本家的残酷剥削而导致消费不足，也可能因为工人阶级斗争力量上升而导致利润挤压，还可能因为资本家大量用机器替代劳动而导致资本有机构成快速上升、进而引起利润率下降。红色经济观察编写组确实认为，目前中国资本主义积累的主要矛盾是由工人阶级力量上升和资本有机构成快速增长共同导致的利润率下降。但是，在资本主义的某一个发展阶段，其主要矛盾到底以什么形式表现出来，必须根据实际情况，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而不是教条主义地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只能采取某一种形式，而其他的任何形式都是离经叛道。

事实上，对于上述三种不同的危机倾向，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都有所论述。在《资本论》第三卷中，马克思在论述了著名的“利润率趋向下降的规律”以后，在第 15 章中第三节中又做了进一步阐述：“只要为了资本主义生产

目的而需要的追加资本=0，那就会有资本的绝对生产过剩。但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是资本增殖，就是说，是占有剩余劳动，生产剩余价值，利润。因此，只要资本同工人人口相比已经增加到如此程度，以致既不能延长这些人口所提供的绝对劳动时间，也不能增加相对剩余劳动时间（后一点在对劳动的需求相当强烈从而工资有上涨趋势时，本来是不能实现的）；就是说，只要增加以后的资本同增加以前的资本相比，只生产一样多甚至更少的剩余价值量，那就会发生资本的绝对生产过剩；这就是说，增加以后的资本 $C+\Delta C$ 同增加 ΔC 以前的资本 C 相比，生产的利润不是更多，甚至更少了。在这两个场合，一般利润率也都会急剧地和突然地下降，但是这一回是由资本构成的这样一种变化引起的，这种变化的原因不是生产力的发展，而是可变资本货币价值的提高（由于工资已经提高），以及与此相适应的、剩余劳动同必要劳动相比的相对减少。”

这里，马克思论述了“资本的绝对生产过剩”发生的条件。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积累的一定阶段，“资本同工人人口相比”可能增加到如此程度，以至于“对劳动的需求相当强烈从而工资有上涨趋势”，从而既不能增加“这些人口所提供的绝对劳动时间”，也不能增加“相对剩余劳动时间”（就是说不能够在总劳动时间不变的前提下，通过减少劳动力价值来增加剩余价值），而“增加以后的资本同增加以前的资本相比，只生产一样多甚至更少的剩余价值量”，就会发生“资本的绝对生产过剩”，一般利润率就会“急剧地和突然地下降”，进而导致严重经济危机。

马克思特别说明，这种情况下的利润率下降，“变化的原因不是生产力的发展”（就是说，不是因为由技术变化所决定的资本有机构成上升），而是“由于工资已经提高”。马克思还指出，这种“资本的绝对生产过剩”是表现为总资本增加以后，“只生产一样多甚至更少的剩余价值量”。就是说，“资本的绝对生产过剩”指的是“生产”的剩余价值变少了而不是已经生产出来但不能“实现”（即在市场上按照价值卖出）的剩余价值变多了。

在阳和平先生看来，只能有一种生产过剩，那就是由于消费不足从而导致剩余价值实现困难所引起的生产过剩。阳和平说：“工资的上升从来不会达到威胁资本积累的程度。在马克思的眼里，工资是不可能真正地‘挤压’利润的，起码不至于达到资产阶级无利可图的危机地步。”也就是说，在阳先生看来，马克思所论述的由于“资本同工人人口相比已经增加到如此程度”、从而“工资有上涨趋势”所导致的“资本的绝对生产过剩”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

熟悉政治经济学和《资本论》的读者应该知道，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所说的“剩余价值量”是以价值即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为单位的。所以，在“绝对劳动时间”不变的前提下，剩余价值量减少，就意味着，在新生产的总的价值量中，剩余价值的份额下降了。所以，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所论述的“资本的绝对生产过剩”，就是说，当资本主义经济中的产业后备军下降到

一定程度，工人斗争力量上升，从而导致国民收入中工资份额上升、利润份额下降。换句话说，这里的“资本的绝对生产过剩”讲的就是利润挤压的危机倾向。

不诚实的阳氏验证法

那么，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已经提出的利润挤压危机倾向是否符合资本主义发展的实际呢？应当说，在马克思的时代，由于多数资本主义国家仍然处于无产阶级化的早期，工人斗争力量还不强，因而利润挤压的危机倾向不明显。十九世纪的经济危机多数是由于工人阶级购买力相对或绝对下降、消费不足引起的。

但是，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完成了无产阶级化，工人斗争力量大大增强，利润挤压危机倾向就成了上世纪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最主要的经济危机形态。即使在新自由主义时期，在一定条件下，仍可以发生工人阶级斗争力量上升所导致的利润挤压危机。今天，随着中国无产阶级化的发展、中国阶级力量对比的变化，中国的资本主义积累也开始表现出利润挤压的危机倾向。可见，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到底是由什么原因造成的、采取什么形式，是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而变化的。

但是，在阳和平先生看来，只有一种正确的危机理论，那就是他所理解的“生产过剩”危机（而绝不可以是马克思所理解的“资本的绝对生产过剩”）。因此，阳和平先生下决心要用“更明确的实证分析来回答到底是利润挤压还是生产过剩造就了经济危机”。

怎么样进行“实证分析”呢？阳和平先生声称，必须要“用回归法来验证”，并且煞有介事地做了多组“多元向量四阶自回归”。

我们不反对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中采用一定的统计方法。但是，研究的方法必须服从于研究的目的。我们知道，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并没有用什么“回归法验证”，并不妨碍《资本论》成为“工人阶级的圣经”。即使是现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所讨论的问题，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可以用并非特别深奥的统计方法来说明。目前在资产阶级经济学中所流行的各种计量方法，与其说是为了探求真理，不如说是将资产阶级经济学故意神秘化、玄学化，从而达到蒙蔽劳动群众并且有利于少数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垄断话语权的目。

无论是激流网还是红色中国网，都不是资产阶级学术刊物，也不是用来给少数权威卖弄脱离群众的所谓“高端”知识的地方，而是面对广大进步知识分子和有政治觉悟的劳动群众的进步网站。请问阳先生，你的“多元向量四阶自回归”是为了给普通劳动者看的吗？即使是你的粉丝、拥趸，有几人看得懂你的“回归法验证”？

无论采用什么统计方法，统计分析要达到其应有的目的，所采用的统计指标和数据必须要符合被验证的理论概念。如上所述，马克思的“资本的绝对生产过剩”的思想指的是当资本主义积累导致产业后备军不足时，工人工资上升会引起“剩余价值量”减少，即利润份额下降和工资份额上升。现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利润挤压危机学说也一贯认为，利润挤压危机倾向发生的条件是，资本主义积累导致产业后备军下降，有利于工人斗争，从而导致劳动收入份额上升、利润份额下降和利润率下降。

所以，要检验利润挤压危机学说，正确的做法，是观察和分析随着产业后备军的规模变大或变小（通常可以用失业率来代表），劳动收入和资本家的总利润占国民收入的份额分别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如果说，当失业率低时，劳动收入份额趋于上升、利润份额趋于下降；当失业率高时，劳动收入份额趋于下降、利润份额趋于上升，那么就符合利润挤压危机理论，否则就不符合。（我们在附录中说明了可以怎样用简单但是正确的方法来检验利润挤压危机学说）

但是，阳和平先生却是这样概括利润挤压危机学说的，“在经济复苏期，随着失业率的下降，工人阶级在经济上讨价还价力量的上升，引起工资水平的上升，进而挤压了资产阶级的**利润**”。这里，阳和平先生笼统地说，工人阶级“讨价还价力量的上升”，影响的是“工资”、“利润”而不是二者占国民收入的份额。这样，就为下面的阳氏验证法提供了理论“依据”：

“我们必须对利润挤压说的精确含义在数据上有一个具体的表达。比如到底是平均工资的上涨挤压了利润还是工资总额的上涨挤压了利润？……严格意义上的利润挤压说应该是平均工资的上涨。即便如此，利润挤压说的支持者们往往还是用劳工在分配上的占比来论证自己的观点。……如果工资上涨‘挤压’利润造成了经济危机的理论成立的话，那么利润额度的变化应该和工资水平的变化成反比。也就是平均工资增长快了，利润必然增长慢，或下降。相反地，如果平均工资下降，利润应该是上升的。”

也就是说，阳和平先生虽然明知利润挤压危机说指的是由于产业后备军的变化引起工人斗争力量的变化进而引起劳动收入占国民收入比例的变化，他偏偏不去验证其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所主张的利润挤压危机学说，而要验证他所理解的“严格意义上的利润挤压说”。而他所理解的“严格意义上的利润挤压说”是什么呢？简单来说，只有观察到工资和利润的变化成反比，才算符合阳和平先生的“严格意义上的利润挤压说”。

我们知道，在资本主义经济正常运行的条件下，一般来说，劳动生产率是趋于增长的。伴随着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利润和工资自然都会增长。按照阳和平先生自己定义的“严格意义上的利润挤压说”，这就算“证伪”了马克思主义的利润挤压说。

为了说明阳和平先生的“证伪”法多么荒谬，让我们打个比方。我们知道，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会发

生无产阶级化。要验证马克思主义的这一观点，正确的做法是观察在一个资本主义社会中，无产阶级的总人口的比例是否上升了。但是，按照阳氏验证法，就不能这样验证。按照阳氏验证法的逻辑，只有观察到了无产阶级的数量上升的同时资产阶级的数量下降了，才算验证了无产阶级化的假设，否则就是“证伪”了无产阶级化的假设。

这种阳氏验证法，其实质，就是通过故意歪曲自己所反对的理论与实际观点，将一个原本正确的观点曲解为明显错误的观点，以达到混淆视听、打倒对方的目的。无论在学术上还是政治上，这都是不诚实的，是一种拙劣的伎俩。

画龙要点睛，画蛇怕添足

可笑的是，即使采用了上述偷天换日的办法，第一轮回归下来，还是得不到阳和平先生所期待的回归结果，无法充分“证伪”即使是经过阳先生重新定义的“严格意义上的利润挤压说”。阳先生只好承认“表一还不能回答统计数据到底支持了哪个危机论。”

阳先生于是声称，第一轮回归没有扣除库存的影响。据说，如果不扣除库存的影响，就不能正确地检验利润挤压说或生产过剩说。“按照生产过剩论的思路，影响投资和利润的核心因素是库存的变动，因为库存的上涨妨碍着商品中剩余价值到资本的转变。”

阳先生这里所说的“库存”，准确地说，指的是支出法国内生产总值中的“存货变动”。在资产阶级的国民经济核算中，“存货变动”属于投资的一部分，不仅包括未销售的最终产品的变化而且还包括资本家囤积的原材料的变化。所以，如果存货变动增加了，未必就是表示剩余价值实现的困难，而反而可能是因为资本家投资信心上升引起的原材料囤积的增长。

我们暂且不与阳先生纠缠这个问题。在据说是扣除了库存影响的第二轮回归以后，阳先生总算是得到了他所期待的结果：“在扣除了库存变动以后，平均工资、工资总额、就业等等的劳工指标都预测不了利润的变动，而利润的升降明显地导致了平均工资、工资总额、就业等等劳工指标的升降”，“利润挤压说因此被证伪。”

画龙要点睛，画蛇怕添足。阳先生在顺利“证伪”了他自己所“严格定义”的利润挤压说后，本该鸣金收兵、胜利班师。但是，阳先生还不满足，还要宣布他另外的重大发现。在阳先生的表二下面，他的第三个重大发现是：

“美国本土的失业率和投资主要取决于中小资产的收入，而非公司的利润”。

阳先生这里所谓的“中小资产的收入”到底是什么呢？查阳先生的英文数据来源，原来是“Proprietors' Income”。正确的翻译，应当是“业主收入”。其中，也有一些小资本家收入，但是其主要成分大致相当于中国一般所说的“个体户”收入。“美国本土的失业率和投资”竟然主要取决于个体户的收入水平！这不是很奇怪吗？

是因为美国的“业主收入”规模特别大吗？2018年，美国的业主收入占美国收入法国内生产总值的7.7%。业主部门在就业上所对应的是“自我就业者”。2017年，美国的自我就业者总数952.5万人，占全部就业人员总数的6.6%。这样一个部门，占美国整个经济约十五分之一，并且并非什么大垄断资本家，而不过是几百万个个体户，竟然能够决定整个美国经济的失业率和投资？阳先生经过反复调整终于获得的回归结果，竟然得到如此令人瞩目的结果，他的其他结论还可信吗？

阳先生证伪了阳氏生产过剩危机论

阳和平先生在证伪了他自己“严格定义”的利润挤压说以后，意犹未尽，认为还要探讨“消费占比”与工人阶级力量强弱之间的关系。结果，阳先生发现：“劳工收入占比与消费占比是负相关的，否定了劳工收入占比的提高意味着消费占比的提高。”

我们这里且不深究阳先生的这个发现是否可靠。假设阳先生的这个发现是正确的，这个发现能够推翻利润挤压危机论吗？利润挤压危机学说强调的是当工人斗争力量上升时，由于劳动收入份额上升引起的利润份额下降和利润率下降。无论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份额如何变化，只要劳动收入份额上升，利润份额就必然下降（除非其他条件如税收等发生非常大的变化），因而“利润挤压”就必然发生。个别网友在理解利润挤压危机学说时可能有不严谨的地方，但是阳和平先生连上述的简单算术题都不会做吗？

我们倒是因为阳和平先生的这个重大发现为阳和平先生自己的生产过剩危机说而担心起来。因为，虽然利润挤压危机说不依赖于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阳和平先生的阳氏生产过剩危机说却是百分之一百地依赖于消费份额的变化。试想，如果阳先生的发现是确实的，劳动收入份额和消费份额成反比变化，那么当工资普遍下降时，消费就会不减反增，从而有效需求也会不减反增，那么怎么会发生生产过剩的危机呢？

这岂不是说，资本家越是残酷地剥削工人，消费就越能上升，从而资本家剥削来的剩余价值就越能得到充分的实现？阳先生就是这样论证“资本主义的生产过剩危机是不可克服”的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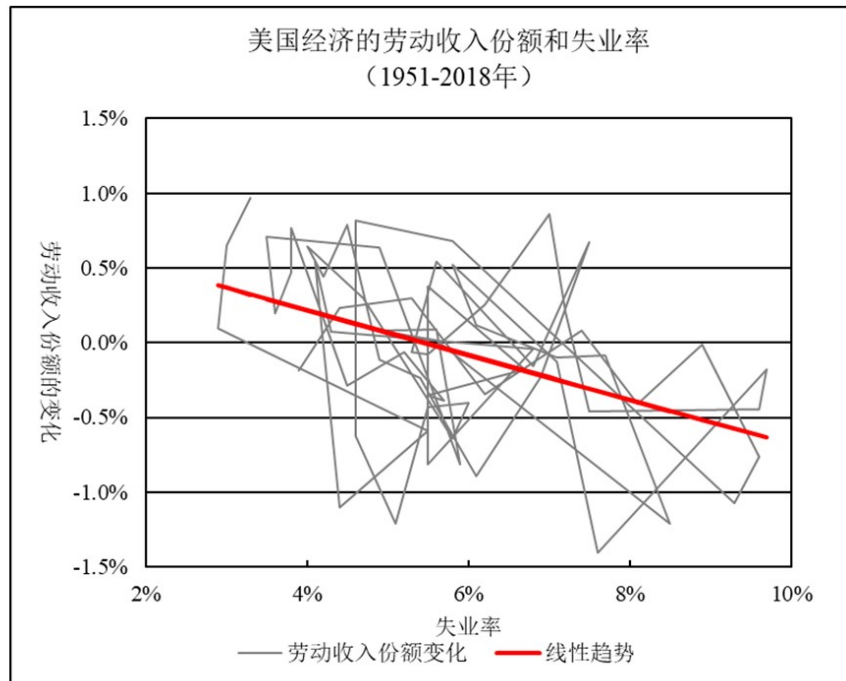
这样看来，阳先生不仅成功地“证伪”了他自己“严格定义”的利润挤压危机说，而且还成功“证伪”了他自己的生产过剩危机说。或许是因为，阳先生的生产过剩危机说尚未经过“严格定义”，才经不起阳氏验证法的检验？

如此“证伪”自己的阳和平先生，尴尬不尴尬呢？

附录：美国经济的劳动收入份额和失业率

下图说明了1951-2018年间美国经济历年的失业率与劳动收入份额变化之间的关系。劳动收入包括雇员报酬和业主收入中的劳动部分（按业主收入的

70%粗估)；劳动收入份额是劳动收入占收入法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失业率与劳动收入份额变化(当年劳动收入份额减前一年劳动收入份额)之间存在着明显的负相关关系。就是说，失业率低的年份，劳动收入份额趋于上升；失业率高年份，劳动收入份额趋于下降。线性趋势为： $\text{劳动收入份额变化} = 0.008 - 0.150 * \text{失业率}$ 。就是说，失业率每上升一个百分点，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化率就会下降 0.15 个百分点。失业率前面那个系数在 0.035% 的水平上显著。就是说，有 99.965% 的概率在失业率与劳动收入份额变化之间存在着系数为负的关系。以上结论都说明，在战后的美国资本主义经济中存在着明显的利润挤压危机倾向。(当然，上述统计结果是对 1951-2018 年的概括性分析；具体到每一个经济周期中是否存在利润挤压倾向，还必须具体分析。)



香港大專學界關於所謂“英美港盟、主權在民”集會的聲明

香港大專學界國際事務代表團 Hong Kong HIIAD

各位香港市民：

是日 2019 年 8 月 7 日，我們謹此宣布大專學界將會聯同連登「我要攞炒」團隊，於下星期五 8 月 16 日晚上 8 時，假中環遮打花園舉辦萬人集會。是次晚會主題是「英美港盟 主權在民」。我們期望以這個集會為契機，聚合本地及國際力量，抵擋政權打壓。

六月至今，香港人努力不懈、萬眾一心，誓要改變香港眼下的種種黑暗。那怕是警隊襲擊市民、黑社會橫行無忌、當權者濫捕和抹黑抗爭者，香港人仍然堅守最後防線，保衛香港。大專學界在此重申，我們定必無懼奮戰，永不割席，堅守五大訴求，勢與港人同行到底。

香港之所以尚未淪陷，除了不分派別、無大台的絕地抗爭以外，同樣有賴一群擁有國際視野的香港人默默奮鬥。否則，香港可能早已淪為中國的一個普通城市，法治名存實亡。抗爭者不單捨棄傳統包袱，亦創新地開拓民間外交的路徑。大專學界與連登「我要攞炒」團隊深信兩條戰線唇齒相依，互為表裡，理應全力互相支援，以圖破局。

因此，我們 11 間大專院校學生會，於七月中聯合成立了「大專學界國際事務代表團」以加強與國際社會的聯繫。大專學界樂於與過去兩個月將香港問題帶到國際層面的連登「我要攞炒」團隊 (及其 Stand With Hong Kong 文宣行動) 合作，一同在下周五舉辦集會，全民集氣，呼籲英國政府確認中國違反《中英聯合聲明》、英美兩國各自制訂通過《香港民主及人權法案》，還權於民，保護香港。

Stand With Hong Kong 是「我要攞炒」團隊就中國違反《中英聯合聲明》發起眾籌成立的義務文宣行動。過去三星期，他們已經在新首相約翰遜當選當日於英國七大報章雜誌及多個網站刊登廣告、製作動畫影片、成立網站、發起聯署、舉辦倫敦紅色巴士遊行、組成單車隊抗議及於五個英國城市巨型廣告版刊登廣告。

在 8 月 16 日的遮打萬人集會中，就着過去兩個月的五大訴求之首(立即實行真雙普選，拒絕政治篩選)，我們將透過嘉賓演講和英國、美國和香港的短片分享，呼籲：

- (1) 英國確認中國違反《中英聯合聲明》國際條約；
- (2) 英美國會各自制訂通過香港人權民主法案，制裁損害香港自治、自由、人權與民主的官員，如凍結他們的英美資產、禁止他們入境。

假如中國決不撤回 2014 年的 831 決定、歸還香港應得的真普選，即使林鄭下台、展開獨立調查，過去兩個月的亂局只會一再重演，香港與中國將玉石俱焚。由二百年前開埠起，香港一直為世界的自由港、國際城市。此抗爭絕非僅僅是港人自主之戰，更是自由世界對抗極權的重要一役。

願我們香港人於生死存亡之秋，以悲憤心情為鐵志，化慘痛經歷為睿智，在國際社會與本土層面跟中國極權以死相搏，重光香港。

廣大香港市民，我們誠邀您出席 8 月 16 日晚上 8 時舉行的「英美港盟 主權在民」晚間集會，與我們一起攜手創造奇蹟，突破困局。

香港大專學界八一六集會的訴求到底是什么？

作者：趙平復 • 2019 年 08 月 10 日 •



文字摘自「英美港盟，主權在民」集會宣傳海報上的口號和訴求。
《國際》設計圖片。

政治文宣的翻譯能說明事物的階級性質。「香港大專學界國際事務代表團」在中文文宣表明其 8·16 集會（口號「英美港盟，主權在民」）的合作夥伴是連登「我要攞炒」團隊，但在相關的英文宣傳中，這句口號和「我要攞炒」都沒有被翻譯出來。

「英美港盟」即「英國、美國和香港結盟」的一種可能英譯是：“UK, US and HK in alliance.” 接著的「主權在民」可以譯為：“shall put sovereignty to the people.”

8·16 集會海報的英文標語是：“Stand with Hong Kong, Power to the People”. 一種可能的中譯是「支持香港，權力歸於人民」。這種表述同「英美港盟，主權在民」的明顯區別在於：後者明確地要求英美干預

讓香港獲得主權，而英文版則代之以更為「政治正確」、不涉及「結盟」和「主權」的「支持香港民主」的表述。

「我要攞炒」的意思，是「不惜玉石俱焚」、「同歸於盡」、「兩敗俱傷」。翻譯成英文可以是：“I want mutual destruction”，“I want damage on all sides”，“If we burn, you burn with us”等等。如果要明確口號針對的對象，更可以譯為：“I want to burn with the enemy”甚至“I want Hong Kong to burn with us”，“I want China to perish with us”。但把話說得這麼明顯，未必對「國際遊說工作」有幫助。在英文的文宣中，「代表團」沒有提及「我要攞炒」，而只用其宣傳平台「Stand With Hong Kong Fight For Freedom」（支持香港，為自由而戰）的名義。

這種選擇，其實也在以迂迴的方式告訴我們，所謂「支持香港爭取自由民主」口號的背後，實際上意味著怎麼樣的國際鬥爭。

香港電台在 8 月 7 日的一則英文報導引述「代表團」某發言人稱：西方國家「會為了遏制中國而支持香港」（“They will support Hong Kong in order to contain China”）。這篇報導沒有中文版。

「我要攞炒」在介紹其致列強的公開信的帖子的最後，是這樣說的：

最後，在此溫馨提示香港政府 —— 假如中英聯合聲明被判失效，根據 1841 年穿鼻草條約、1842 年南京條約及 1860 年北京條約，**英國有權強行回收香港島及九龍半島。**

千祈唔好迫英國寧作玉碎，不作瓦全。

這段話可以翻成如下的英文：

Lastly, we'd like to send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this kind reminder: should the Sino-British Declaration be declared void, according to the Convention of Chuanbi, the Treaty of Nanking of 1842 and the Convention of Peking of 1860, **Britain has the right to forcibly recover Hong Kong island and the Kowloon peninsula.**

Don't ever force Britain into a position where she feels it is better to die in glory than live in dishonour.

8·16 集會的首項訴求正是：「英國確認中國違反《中英聯合聲明》」。

香港运动已成为法西斯运动，左派不要自欺欺人

(2019年8月15日)

水边

北京时间8月13晚，两名中国大陆居民（其中一名是记者）在香港机场被大群所谓“示威者”以极为残忍的方式侮辱殴打，原因居然是这两个人被发现有内地身份证和护照。这种针对大陆群众的暴行，在性质上非常严重。发展到今天，香港的政治运动的主流已经明显掌控在右翼手中，而且日益表现出法西斯的特征。国内外左翼必须要厘清认识，不能小视香港法西斯，更不能自欺欺人。

香港的法西斯运动，物质基础是香港乃至世界范围的资本主义整个经济社会体制的衰落，而文化基础则是香港本土主义在近十年来的兴起。应该说，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事实上，在过去短短十年时间里（也正是世界经济危机之后），整个世界范围内都兴起了新一波的法西斯浪潮。这些新的法西斯主义普遍的特点是把资本主义带来的巨大问题怪罪到某一些特定的群体身上。

当然了，现在把犹太人当替罪羊是资产阶级很难说出口的事情了，但是满世界都有各种犹太人的替代品。在欧洲，有中东非洲的第三世界的移民当靶子，在这个基础上，英国的独立党(Ukip)，法国的国民战线(National Front/Rally)，德国的另类选择党(AFD)等极右翼党短时间内就获得了大量的选票。在北美，最天然的敌人是墨西哥人，再加上穆斯林，在这个基础上捧出了当今的美国总统特朗普。

虽然印度也有了莫迪这样的带法西斯色彩的领袖，大陆也一样有法西斯思想传播，但是，当今世界的法西斯势力主要还是集中在发达资本主义地区。而且，在很多情况下，法西斯势力掌握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地区的大量的基层群众，包括工人阶级。

由于传统欧美政治里面经历过二战后的革命运动的冲击，保留了一小部分体制内的中间派和左翼势力，比如美国民主党中桑德斯，沃伦为代表的激进派，比如英国的科尔宾领导下的工党等。这些势力暂时还与法西斯势力有斗争，使得政治运动没有完全一边倒。

香港的政治有其与世界发达资本主义地区一致的情况，那就是在资本主义矛盾尖锐的情况下，产生了排外，尤其是歧视排斥大陆群众的思潮。对大陆人的歧视是长期的现象，但是把歧视提升到了排斥大陆人，乃至要清除大陆人和大陆的影响（各色光复运动），这是近十年才发展起来的。在另一方面，香港有其特殊的地方，过去的左翼政治势力在港英政府打压下没能传承下来；后来中国大陆自身的剧烈变化，也给香港左翼政治提出了很多难题。到了现在，香港左翼是被边缘化的，基本上发不出自己的声音。所以，在近十年来的香港政治运动当中，右翼势力，以及其中的法西斯部分，得到了长足的，几乎没有阻碍的发展。这里面被提升到理论层次的，就是一批所谓港独理论。

这些形形色色的港独理论，都无非强调香港的特殊性，香港的可能实现的伟大前景，而又要说香港是一个受害者，被其他外来势力影响，导致了现实各种问题。很自然，这种影响香港，甚至说是对香港盘剥压榨的势力，就被归在大陆，共产党，等等因素身上。这种理解，是对现实的完全扭曲。我们都知道，香港是带有依附性的发达城市经济体，香港的大量资本，正是来源于对大陆劳动者的血汗的盘剥，香港的大量劳动者，事实上也是为这些垄断盘剥性行业服务的。很明显，如果要在大陆和香港之间计算一个关系，大陆肯定是在不停的给香港输送剩余价值。这都还没有提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大陆给香港的水电食品的稳定供应这一项。

但是，法西斯的理论不需要科学事实，只需要挑起某种简单化的情绪。就好比，不管美国是多么的剥削其他发展中国家，这也不影响美国大批群众认为是发展中国家在榨取美国的利益，是发展中国家的人跑到美国，导致了美国的种种问题。在香港，这个故事也一样，在这里，受害者是一般性的无阶级的香港人，而坏人就是大陆的一切人和事情。

在这个背景下，才会有大量的侮辱歧视大陆人民的情况出现，不管是骂大陆人是蝗虫，还是骂中国是支那，都已经是非常强烈的排外情绪的表现了，这正是法西斯的温床。但是这种排外情绪，在香港大行其道，没有政治力量真正的与其做斗争。以至于我看见一些所谓的香港左派，不仅不批判香港的排外和运动法西斯倾向，而且其政治经济分析也基本是在这种港独的框框里面进行，这是让人非常遗憾的。

在近期，香港著名的左翼人士区龙宇撰文，承认了香港政治当中排外的成分，但是同时又说，“左翼應該怎樣做？是坐在沙發上評論其不足，然後坐等運動發展到一個理想水平才去加入/動手？還是一頭扎進運動，促進左翼的發展？” [i]。听起来似乎是那么回事。但是你却从一开始就没有领导权，却觉得本来就边缘化的左翼扎进法西斯运动中能够获得领导权，再去把运动带到左翼的方向？要是香港左翼有这个本事，那香港的法西斯势力一开头就根本发展不起来啊。

所以不要自欺欺人，这里主要是说给香港左翼的同志，也是要说给大陆和海外各种抱有良好愿望的左翼同志。现实的香港的运动是法西斯导向的，是与世界法西斯势力一个根上长出来的。首先要承认这一点，还要承认靠左翼打入这种法西斯运动，是完全不会改变法西斯运动性质的。香港（以及大陆和台湾的）左翼要发挥进步的作用，就必须把自己和全中国，全天下的劳动人民的斗争结合起来，要继承伟大的苏联和中国革命的遗产，而不是跟着运动跑，从而跟十几亿中国人民割裂开来。

[i] <http://www.youth-sparks.com/bbs/viewthread.php?tid=14863&extra=page%3D1>

为什么说当前香港的群众运动是反动的？为什么这次运动是必然要失败的？

(2019年8月19日)

远航一号

编注：半条命网友在红色社区发表了下面的贴文，并要求红色中国网主编远航一号做出回答。

半条命：

独立是个比较敏感的话题，作为一个中国人其实谁也不想看到国家四分五裂。但如果从历史角度来看，国家的变迁总是分分合合。相对稳定的国家形态，也总会经历战争的洗礼。从古至今不管是哪个民族做为统治者，对于民众来说只要能保持一种相对公平、安定的社会形态，那么反抗的声音就会少一些。只有在社会公平性（贫富差距）差距较大时才会产生激烈的对抗行为。而这些行为的目的大致分为三种：1.协商以达到双方或多方共存的目的；2.你死我活最终为改朝换代；3.‘独立’自谋生路意图更好的发展。

分析下香港吧，其实它的情况是比较特殊的，虽然他们与大陆血脉相连，然而在清朝时期香港就已经划归英国。在整个抗战时期、内战时期乃至解放，香港始终处于英国的统治之下，长期的英式文化教育早已经将港民英国化了，对于中国政府根本没有多少感情可言。从情感上说这就好比是生父与养父的区别，生而不育亲儿子也不会待见你一样。

那么从文化上来看的话，历史上，当汉族在被外族统治之后，外族不但没有改变汉族的文化，反而开始学习起汉族的文化来；而且接触汉文化越久，反而把本民族的传统文化丢弃了。那么站在那些外族本民族的立场（民族主义）或国家立场（爱国主义），丢了传统就是忘本，那是不是应该被唾骂呢？当然不会，因为先进的东西大家都能感受到。这就好比中国的油灯、蜡烛为什么会被西洋的电灯所替代是一样的道理。

那么说下现在的中国，不论是大陆还是香港两地的贫富差距都是巨大的。我们大陆人不满现在的政府，而港人也不满现在的政府。大陆人不独立是因为文化相同又是亲爹带大的。许多老一辈的人仍然在感激毛时期共产党的好。然而对于港人来说，本来就对中国没多少感情，再加上文化和目前中国那四不像的制度，就更加让港人怀念起昔日英国的民主制度了。虽然英国的虚伪民主比共产主义的真民主落后，但是相对目前中国的四不像来说那是要进步不少的。

不管香港的独立真也好假也好，200万人参与的运动均代表了大多数民众的意愿，民运是无疑的。如果左派希望香港回到中国的怀抱，那就要让港民认识到更先进的共产主义制度。

俗话说酒香不怕巷子深，好东西还怕别人不要吗？

远航 一号：

谢谢参加讨论。

红色中国网编辑部还没有就香港和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问题做出相应的决议，但是基于水边、远航一号等编辑已经发表的观点，可以做如下的初步总结：

1. 我们承认，香港在近现代以来事实上已经形成了独立于中国大陆以外的资本主义国内市场；这个独立的资本主义国内市场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香港存在着区别于中国大陆的独立的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以及独立的阶级斗争运动规律。
2. 我们不反对从马列主义立场出发，对于香港人民的民族自决权问题，进行纯理论的探讨。
3. 由于历史的原因，绝大多数中国人民在可预见的甚至遥远的将来决不可能接受任何形式的香港独立。这是任何严肃致力于中国国内阶级斗争的个人或政治派别都必须面对的客观现实。谁无视这个客观现实，谁就必然被中国人民抛弃。
4. 由于香港的特殊的阶级斗争的条件，香港的群众运动不可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因而不可能是以社会主义为方向的。
5. 由于香港的群众运动事实上由小资产阶级领导（不是资产阶级领导，更不是什么美国策划），同时由于小资产阶级不可克服的局限性，不可能真正把无产阶级发动起来（罢工、银行挤兑均失败），香港群众运动也不可能争取到完整的资产阶级民主。这与中国部分小资左派的主观愿望无关，是由香港阶级斗争的客观条件决定的。

6. 香港的群众运动客观上造成了香港资本主义的不稳定，给中国资产阶级的政治和经济统治增加了某种不确定性。但是到目前为止，承担代价的主要是香港劳动群众，而不是陆港资产阶级。

7. 作为中国的马列毛主义者，我们可以容忍香港的群众运动在其政治宣言中提出某种独立的要求，但是**我们完全不能容忍作为香港群众运动实际上领导集团的香港各大专学校学生会等团体向英美帝国主义摇尾乞怜，请求他们干涉中国内政，甚至恢复自鸦片战争以来强加于中国人民的不平等条约。这不仅是对中国革命的反动，而且是对二十世纪以来一切亚非民族解放运动的反动。**

8. 作为一个以争取完整的资产阶级自由民主政体为目标的运动，不仅要在口头上提出争取普选等目标，还必须在全部言行中承认并遵守现代资产阶级自由民主政治的一些基本原则，其中包括坚决拒绝一切歧视和压迫少数群体的语言和行为（内地人民在香港即少数群体），尊重少数派别的言论自由，未经正当程序不得侵犯他人的身体、人身自由和财产。所有这些原则在这次运动中都被大量地、普遍地违反，而参加此次运动的主要群体（香港青年学生）则在事实上被一群强烈歧视中国人民、鄙视中国的港独分子领导着。

9. 基于上述两点，我们认为，香港此次群众运动事实上是一次反动的法西斯主义运动或右翼民粹主义运动（这里，我们是在右翼民粹主义的意义上使用“法西斯主义”这个词），无论其有多少人参加、提出哪些欺骗性的诉求，从其具体言行来说，都是一次反动的运动。

10. 当然，香港群众运动反动性，归根结底来自于香港资本主义的矛盾。类似的矛盾也发生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其他核心地区。在世界资本主义的新自由主义时代，核心地区（含香港）的资产阶级不再愿意与本地工人阶级、小资产阶级分享他们从外围、半外围剥削来的大量超额剩余价值，从而导致原有的社会妥协破裂。在香港，由于人多地狭，而经济完全金融化，上述矛盾更加尖锐。由于这些矛盾在资本主义范围内无法解决，核心地区的工人阶级、小资产

阶级往往企图通过排外、歧视压迫驱除少数族群等办法来维持他们原有的对高价值劳动力市场的垄断，幻想用这个办法来恢复他们往日的好日子。由于这种反动的群众运动阻止不了资本主义的压迫和剥削，因而是必然要失败的。

11. 中国大陆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迟早是要胜利的。中国大陆的无产阶级斗争的发展可以不依赖于香港、台湾等地阶级斗争的发展。但是，香港、台湾等地的无产阶级要争得解放（甚至是在资本主义范围内争得较大的改良）却只有在中国大陆的无产阶级革命斗争胜利以后才有可能。

12. 所以，只有当香港的劳动群众自觉自愿地将自己的斗争作为整个中国劳动人民解放斗争的一部分的时候，香港的群众斗争才是有希望的，才可能是进步的，才可能逐步接近他们的目标。如果不这样做，香港的任何群众斗争必然得不到绝大多数中国劳动群众的同情（个别与世界资本主义市场有高度联系的中国“左派”或右派小资除外），因而必然是要失败的。对于必然失败的运动，中国的马列毛主义者除了帮助他们分析失败的必然原因并揭露他们依靠帝国主义、歧视中国人民的反动性以外，不能提供任何其他帮助。

乌克兰反共“左翼“的今天，就是香港”左翼“的明天 (2019年10月)

赵平复

敝人以為，喋喋不休的香港親帝「左翼」關於他們在這場自己有份推波助瀾的「民主海嘯」之中的「失語」論，是似是而非的矯情話術。

香港「左翼」的 99%以上首先是帝國主義「民主派」，他們的基本立場就是對於帝國主義文明制度的優越性的信仰，亦因此認同帝國主義對於中國的落後性和中國革命的變態性和野蠻性的鑑定。

他們同公然的保守右翼主導的「民主派」的不同之處，在於他們拾取了西方反共「左翼」、特別是冷戰末期產生的「多元社運」的唾沫，認為必須表示關顧窮人和各種小眾，才能構建「進步的」（即可用在反中宣傳上的）「本土共同體」。

香港「左翼」口中的「馬克思主義」，是服從以上的親帝反中港獨綱領的一種話術：是竭力將反共民粹操作包裝為「階級鬥爭」，將資產階級的本土優先福利政策等同為「社會公義」，在理論上、倫理上徹底否定無產階級專政和共產主義的羊頭狗肉。

既然如此，香港反共反中狂飆以來手足舞蹈、滔滔不絕的「左翼」的所謂「失語」，又到底是什麼東西呢？

一言以蔽之，就是他們一直渴望和推動的「本土共同體」，再一次以其原生的、赤裸的反共反中的、亦因此必然是極右法西斯的姿態展現人前——而且證明了自己完全不需要「左翼」建議的各種「政治正確」的裝扮，也可以得到「國際社會」的吹捧。

所謂「失語」，就是他們要當高大上領導的慾望完全落空了，法西斯草莽沒有理會他們，他們很可能連「軍師」也當不上了；所謂「失語」，就是他們面對西方左翼友人提問時的尷尬：這不是一場你們一直在指導的進步運動嗎？為什麼這麼多人打砸搶燒中資商店、高舉星條旗呼籲列強介入？

作為親帝「民主派」大小幹部、靠政治吃飯的他們只剩下一條活路：就是全身投入已經進化為法西斯的本土民粹運動，對內不斷發出「注意言行不要太右」的溫馨提示，對外不斷宣揚本土民粹運動本質上是「好」的、只需要加上他們的政治正確口號，就會近乎完美的假話廢話。

烏克蘭的反共「左翼」的今天，就是香港「左翼」的明天——前者每次發言都首先強調自己仇恨共產黨、仇恨俄羅斯，100%的愛本土，而「左翼」不過是實現樂活的政策倡議而已。但他們還是會被主流的極右民眾訕笑，罵他們是只會嘴炮的機會主義者、自以為是的讀書人。右派當權者指著他們說：看！我們的民主是多元的，「左翼」也可以參選！

這種「左翼」的唯一用處，在於用英文發表各種關於本土的神話，讓他們在帝國主義國家內的同志們可以對本國的幼稚青年說：看！我們的戰友在推翻共產黨之後還會再接再厲！他們正在努力向著我們的民主體制進發呢！

“香港人”，你“抗争”的是什么？

(注：这里“香港人”，是那些自号和自命“高等”的香港人渣)

老王社长 (2019年11月18日)

“抗争”！多正义凛然的动词。香港的暴乱者们和他们的支持者们，海内外为之叫好捧场者们几月来不绝于口。人们只要一听“抗争”，好像便必得肃然起敬，好像便在这些“英雄”前矮了一截，短了一口气。

我倒要问，“香港人”，你“抗争”的是什么？你在向谁“抗争”？

你们“抗争”的是“反送中”。

“反送中”，好抽象哦，可售其奸。翻译成大白话就是：“**反对将在大陆刑事犯罪的香港人遣送回大陆追究审判**”！

你们这是在向谁“抗争”呢？是向特区政府抗争？是向北京中央政府抗争？不！**你们是在向大陆和台湾十四亿中国国内人民“抗争”**；你们的锋芒实质是在向着他们！

你们实际是在宣告：

我“香港人”可以在大陆在台湾任意犯罪，任意地杀人放火强奸拐骗贩毒绑架....，为所欲为，只要我逃回了香港，你们国内人就不得追究我们“香港人”，不得审判我们“香港人”。我们“香港人”从来是高于你们“中国人”的人上人，从来是拥有法外特权的高等人，准洋人。现在。你们居然要“修例”，要将我们“香港人”在大陆台湾的犯罪人遣送回大陆台湾接受你们的追究审判，那还了得？那不是将我们“香港人”与你们大陆人台湾人平等了吗？那不是剥夺我们“香港人”历来就优越的特权了吗？这还有“一国两制”？这还有我香港人“人权”？我们就要“抗争”！我们就要“暴乱”！我们就要“守护香港”，“光复香港”！我们就要“革命”，成立“临时政府”港独，暴力夺权！

“香港人”，你们的“抗争”，**戳穿就是这个**。老王几月来给你们面子，忍着，没有戳破你们，因为支持怂恿你们的不少“民主派”，都

曾是老王的朋友，批评只好委婉些。现在，你们的烧杀打砸抢掠毁坏恐袭，昏天黑地，忍无可忍，必须戳破你们了。

昨天，我就戳破了那个香港的前“全国政协委员”刘梦熊（北京瞎了眼！）。他居然辩说，为追究几个在大陆犯罪的犯罪分子“修例”，而引起“香港人抗争”，失去了香港对大陆的金融特殊地位，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以此理由，一直辩护暴徒们的暴乱和港独叛行。

好个“芝麻、西瓜”。大陆台湾全国十四亿人民的人身财产安全是“芝麻”？香港那点金融特殊地位是“西瓜”？为了保住那“西瓜”，就可以任由夹持着“西瓜”的“香港人”，将大陆台湾全国十四亿人民的人身财产安全这“芝麻”，置于他们不受追究的法外刑事犯罪的恐怖之下？刘梦熊，你凭什么？！“香港人”，你凭什么？！！凭什么你们可以如此轻侮国内人民？就因为那一旦西方生气就没有了，天就塌下来了“西瓜”？

刘梦熊说，香港犯罪人是少数几人。

犯罪人少，就不要法律了？只要“香港人”有了对国内人民犯罪可逃避追究的法外特权，少数人就会变多数人，国内人民就必将处于“香港人犯罪”的恐惧之中。当然，这些是“芝麻”，金融是“西瓜”。

有人辩解说，香港人人反共，是害怕被作为政治犯“送中”，只好连刑事犯一起保护，反对“送中”。这是由头，老王早批驳过，不赘。这里只再说一句，今日“反送中”的香港人，几人没回大陆？他们天天自我“送中”，却装作害怕作“政治犯”被“送中”？无非“香港人”的优越心理，要维护自己的历史特权罢了。如果你真的只为保护“政治犯”，并不意在保护对大陆人民的刑事犯罪，就请你支持特区政府修例，因为它明明白白规定了，“送中”排除一切政治事项。

好的，弄明白了。现在，究竟谁应该“抗争”？是大陆人民台湾人民应该起来抗争，应该起来争自己的人权。应该大声地向“香港人”说：“必须修例！过去没有修例而无法引渡对我们犯罪的香港罪犯，使之逍遥法外是大错。今后，就必须将你们在国内犯罪的分子遣送回国追究审判。香港人没有法外特权。你们的特权，就是对我们国

内人民人权的剥夺和侵犯！”

还应该大声地向北京，向香港特区政府说：“必须修例！你们屈服于‘香港人’的暴动叛乱，终止送中修例，实质是默认了香港人对国内人民拥有刑事犯罪后可逃避追究审判的特权，这是完全错误的，本身，就是对十四亿人民不可接受的犯罪！”

这才是正义的抗争。

2019年11月18日

“和勇并进，统战资本”——香港已出现获取初步胜利的历史机遇

新品葱（2019年12月2日）

上周hk区议会选举，泛民大胜，有些葱油就觉得港府或北京会屈服于民意压力选择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但其实仔细分析便会发现这是根本不可能的。

纵观这半年来的抗争，对于北京来说一个最重要的改变并非是撤回条例或者议会大败，而是其在港的执政基础已发生了重大变化。一直以来中央在香港的执政基础其实是依靠着董先生（自治官僚）和李先生（资本家），但在这次的事件中李先生们从七月开始骑墙，并因为国内的废青论让其成为了内地舆论所公认的乱港黑手之一。从很多官媒的言论和传闻中我们就已经能看出，北京目前实际上对李先生们是相当不满的。而除了李先生，经过了二十年，我们也能看到北京在香港的另一执政基础也已经从董先生变成了林郑。相对于港府官僚来说，林郑的一个最大特点是她本质是北京的傀儡官僚，而非过去董先生式的自治官僚。在过去反23条的运动中，董先生依然有着一定妥协的空间，但在本次反送中运动中，林郑在运动初期就已对独立委员会的诉求无妥协空间，完全沦为了中共傀儡。

既然李先生们靠不住了，林郑们也已经成为了傀儡，那北京现在在港的执政又是靠着什么呢？明眼人一下就会发现，在这次事件后港警已经完全超越李先生成为北京在港最重要的执政根基。这也是为什么我认为北京不会调查港警的原因，毕竟没有政权会蠢到和自己的根本执政根基割席。

说到这里，我想重新回到这个帖子的主题：

“为什么说香港已出现获取初步胜利的历史机遇了呢？”

答案很简单，虽然拥有港警的暴力机器，除非遇到真正的暴力革命（这会非常难，特别是在没有内地支援的情况下）很难真正被暴力推翻，也的确是能在表面上控制住社会。但香港的政治制度原本并非是为了暴力控制而设计的，作为香港整个制度关键的特首选举委员会事实上是为了过去“李先生”和“董先生”共治所建立，而这个制度在短期内哪怕是北京也很难去改变。既然短期内北京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这个制度，而李先生们却有着被北京踢出执政根基的倾向，那泛民们其实只要能统战李先生们，哪怕只是让李先生们中的一小部分倒戈，并凭借区议会和明年立法会选举所获得的新席位和部分功能界别的支持，就有可能直接改变未来特首选举委员会的势力构成，甚至直接拿下控制权，真正地“和平演变”香港。

就我个人认为，要达成“和平演变”的目的，对于和理非、勇武以及内地反贼们有许多策略和教训可以使用和反思，我这边提供一些，其它想法大家也可在评论区讨论：

对于和理非来说：

1. 重视每一次选举。包括动员和宣传，拿下可能拿下的每一个席位，以争取选举委员会的最大席位。

2. 统战资本家。在共产党和内地民众对香港资本家恶语相向的时候，善意对待资本家们，告诉他们香港市民才是他们真正的根基，尽可能地使其倒戈。

3. 和理非式的对外文宣。在这半年的抗争中，文宣的重要性已体现得淋漓尽致。而在未来的斗争中，除却少数象征性的勇武抗争画面，和理非要保持对外和对中立市民的和平文宣。对于这一点来说，虽然我赞同勇武的重要作用，但很难否认和平的形象能获取最大的国际和本地民意支持。

对勇武来说：

1. 持续对警方施压。勇武的施压能让警方在高压之下犯错，这一情况在过去 721、831、蒙面法等事件中已出现多次。争取让警方在未来干出更多的蠢事、出现更多的猪队友，并依靠和理非的文宣进一步抹黑北京和警队，获取最大的民意支持。

2. 杜绝阵地战，坚持流水式抗争。在过去几周中，中大一役虽还能说是惨胜，但理大一役已很难称之为是胜利了。面对港警的全副武装，阵地战很难真正获取多大的成果，徒增伤亡。在未来的抗争中应予以放弃并重拾流水式抗争的策略。

3. 勇武抗争应明确对象。勇武抗争在这次运动中作用很大，它维持了整个运动近几个月来反对派的士气。但在勇武们使用暴力的时候也应当清楚，你们的对手是警队、是港府、是中共，而并非普通中立甚至浅蓝的市民和内地的学生。在和理非文宣盯着警察港府的时候，对方的文宣也在紧盯着你们。所以在你们使用暴力的时候应当明确目标和程度，在做堵路和不合作运动的时候采取的策略也应尽可能减少对普通市民的影响，以最大程度靶向打击警队和中央为优先。争取民意对你们的支持。

对内地反贼来说：

1. 杜绝墙内冲塔。墙内冲塔毫无意义只会白白增添我方未来力量的损失，应当以争取自己的安全为优先，对香港的支持也以匿名或者金钱上的帮助为主。

2. 践行加速主义。上周 *Foreign Policy* 上 [Hong Kongers Break Beijing's Delusions of Victory](#) 的文章已经表明，北京因为自己内部的威权统治已失去了可靠的情报来源，并被自己的文宣所欺骗。既然如此，我们完全可以通过宣传转发它自己的虚假文宣，并向外宣传此类言论，比如资本家乱港论，加速它和资本家割席的速度也加速我们统战资本的速度。让其因自己的宣传失去在香港的执政基础，并加速自己的灭亡！

“和勇并进”是这次运动能延续到现在的重要基础；“统战资本”则是未来获取香港在特首选举上初步胜利的的必要步骤。作为一个大陆反贼，希望通过在品葱上的发文，让更多的香港人、大陆人甚至台湾人认识到这一策略，也欢迎葱油们和香港手足们对以上内容进行讨论并传播！（特别希望香港手足们能发到港人电报群及连登上进行讨论甚至实践其中的策略）

愿我们终有一天能在阳光下相见。

光复中国，时代革命！

此次香港反动群众运动中的各阶级

(2019年12月2日)

远航一号

这是作者在港独策略文章“和勇并进，统战资本”下的长跟帖：

这篇港独策略文章说明一些重要问题。

一，所谓和，从来都是骗局，都是为暴打掩护，所谓香港大多数人民是和平理性的完全是欺骗。实际情况是，少数人（绝对数量也很大）动手打砸烧，尤其是打中国人，多数人捧场打掩护。

二，这次反动运动确实是香港小资产阶级领导的，不是香港大资本家领导的，更不是如北京当局自欺欺人那样，是什么外部势力干预。但是，反动的香港小资产阶级为了达到其仇华排华，独占自以为高价值的香港劳动力市场，驱除来自大陆高技能移民劳动力的威胁，却不可能真正发动香港工人阶级（所以自运动以来，打砸有能，罢工无能），并在其反动世界观的驱使下，必然寻求在他们看来更大力量的支持。

这个更大的力量，首先是幻想美英帝国主义来保护香港，所谓英美港盟。但中美英资产阶级根本利益一致，都希望香港“稳定繁荣”，就是可以从事正常的资本积累，继续有效衔接世界资本主义国际分工。所以，在香港问题上，美英帝国主义装腔作势，恶心一下中国资产阶级，那是可以的。实质性的动作，为了个香港破坏世界资本主义大局，那是万万不会的。需要说明的是，国内部分左青，与反动的香港小资产阶级有一样的幻想，因而才编造什么中国帝国主义挑战美帝、中美必有一战一类的昏话。

除了“感谢美国”以外，港独势力也意识到，还需要内部的社会基础。在这方面，他们还是不可能去发动工人阶级，于是正在决心全心全意投靠香港的资本

家，企图统战资本，把北京的社会基础变成他们的社会基础，拥护香港资产阶级领导港独。这再次说明，此次的反动群众运动，没有一丝一毫的进步成分。他们对待大陆人民的态度就是罗马公民（香港人）对待蛮族（支那蝗虫）的态度。

至于香港资产阶级，目前处于分裂状态。传统上，香港大资本家从来无所谓爱国，而是借着中国资本主义复辟，在中国廉价劳动力被国际资本剥削转移大量剩余价值中分一杯羹；此外，内地大搞私有化，国有资本大批流失，香港资产阶级也利益均沾。以往，香港大资本家还愿意把自己获得的超额剩余价值拿一些出来，与香港小资甚至是工人阶级分享。这就是建立在中国人民血汗、中国农民工断手断脚基础上的香港资本主义社会契约。现在，由于香港经济金融化，香港资本家不再愿意承担这个社会契约的包袱，想把它甩给大陆资产阶级，后者除了小恩小惠也是一毛不拔，于是造成香港社会矛盾全面激化。

香港资产阶级目前大致分为两派，一派还是幻想恢复香港繁荣稳定，但不愿与港独势力彻底决裂，希望不得罪人，希望大陆资产阶级出面。如果不是因为还有这一派，估计香港政府连警察都调动不了。还有一派，也不是港独派，真港独了，香港几百万好吃懒做无能暴戾的小资，谁来养？但是他们误以为，这次还像以前一样，可以以港独来要挟中央，中央又会发大礼包，甚至给他们更高度自治。结果客观上进一步纵容反动群众运动升级。

最后，代表大陆资产阶级的北京当局，并不真正在乎中国在香港的主权，更不在乎中国普通人民在香港的死活。他们只在乎他们自己在香港未必拿得上台面的经济利益。只要能与香港资本家一起发财，基本法体制可以永远维持下去。所以要一国两制不动摇，所以在镇压暴徒方面无所作为。但香港局面失控，对国内人民又无法交待，只好编出一堆外部势力干预的低价宣传来自欺欺人。

由于大陆资产阶级软弱无能，香港小资产阶级的反动运动必然继续猖狂下去。由于香港小资产阶级的反动本质，他们必然不会提出反资本主义要求，而是一厢情愿地投靠帝国主义、投靠香港大资本家，但他们的幻想又无法满足，必然

将他们的愤恨进一步转嫁到中国人民头上，从而更加反动！

这次运动的唯一积极意义，是客观上搞乱香港资本主义，同时教育中国人民，揭露一国两制假回归真卖国的本质，揭露中国资产阶级外强中干、畏美恐美的本质，揭露中帝论假革命真反动的本质。

这次反动的群众运动还证明，香港的群众运动如果自绝于中国人民之外，必然是死路一条，必然遭到可耻的失败，沦为历史的笑柄！

红色中国网揭露批判华为等大资本的立场是始终一贯的 (2019年12月11日)

红色中国网编辑部

据悉，在国内某左翼群的讨论中（该群有大量青年左派参加），有数名青年以龙翔五洲等网友的若干发言为根据造谣说，在此次华为 251 事件中，红色中国网站在偏袒支持华为的立场上。本编辑部特别声明，这种论调纯属造谣。

如本网的各位网友所了解的，红色中国网编辑部一向认为，华为从来不是什么员工持股的“集体”企业，而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资本主义企业。华为也不是所谓的“民族企业”，而是在技术上依赖美欧日台、销售上依赖世界市场的与国际资本有密切联系的企业，实质上还可能是变相的官僚资本企业。华为对他自己的员工残酷剥削，实际上是高科技领域的血汗工厂；华为的超额利润建立在华为员工的大量血汗甚至生命基础之上。

有一些朋友，从良好的愿望出发，以为可以靠华为来抵制美帝国主义，甚至带领中国走向“强大”。对于这种错误观点，红色中国网编辑部曾多次提出批评。因为红色中国网对华为的始终一贯的批判立场，还遭到了林林等网友的不理解。

然而，竟然有一些青年朋友，出于我们无法理解的原因（甚至是卑鄙的政治目的），宣传什么红色中国网在 251 事件上与华为沆瀣一气，甚至为此目的不惜编造出龙翔五洲是本网编辑的笑话。我们认为，这是十分可耻的。我们希望，这些青年朋友所属的左派小组，在看到本声明以后，对这一问题给与重视，对造谣人加以批评教育，澄清谣言，促进马列毛左派的大团结。

为什么说“造反有理”？——纪念毛主席诞辰 126 周年 (2019 年 12 月 25 日)

远航一号

这几天，全国各地的进步网站、红色团体都在举办纪念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诞辰 126 周年的活动。千千万万的红色积极分子正在突破各地警察当局的阻挠破坏，奔赴韶山，给毛主席“过生日”。

今天的中国，资本主义复辟、资产阶级猖獗，把广大劳动群众压迫得喘不过气来。在这样一种历史条件下，我们怎样纪念毛主席呢？不顾资产阶级当局的禁令，开展群众性的纪念毛主席的活动，这是当前斗争的一种主要方式。除了这种主要方式以外，我们还要学习毛主席的思想，用它来指导我们的实践、指明我们斗争的方向。

我们知道，毛主席的革命思想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毛主席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毛主席的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发展阶段。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如果用毛主席自己的话把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概括一下，那就是：“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几千年来总是说压迫有理，剥削有理，造反无理。自从马克思主义出来，就把这个旧账翻过来了，这是个大功劳，这个道理是无产阶级从斗争中得来的，而马克思作了结论。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这是毛主席 1939 年 12 月在延安各界庆祝斯大林六十寿辰大会上讲话中的一段话，后来收录于《毛主席语录》而广泛流传。

什么是“造反有理”？这里有两重意思，一是说，劳动人民反抗压迫、反抗剥削，是正义的、光荣的事业。历代剥削阶级总是污蔑劳动群众的造反斗争是土匪、痞子、流氓，是违反天理伦常，破坏财产，颠覆秩序，挑战“普世价值”。要斗争，要反抗，就要打破剥削阶级强加于我们的种种精神枷锁，让思想冲破牢笼，才能夺回劳动果实。

“造反有理”还有另外一重意思。就是说，劳动人民反抗压迫、反抗剥削的斗争是推动人类历史向前发展的动力，合乎历史发展的规律，合乎人类历史的大道理。

“造反有理”翻译成英文，就是 **it is right to rebel**。这里的“right”也有两方面的意思：一是说造反是正确的、正义的行为，一是说造反是被压迫者、被剥削者的当然权利。

那么，在我们今天的历史条件下，“造反”是不是合乎中国社会发展的规律，是不是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最基本的动力，是不是被压迫者被剥削者的当然权利呢？

对于这个问题，不同阶级的回答是不一样的。中国的资产阶级、他们的政治代表以及在他们控制下的反动媒体，与几千年来的剥削者一样，认定压迫有理、剥削有理、造反无理，所以“996是福报”，为资本家加班是天经地义的，加班猝死是个人适应不了社会，贫穷不是因为懒惰就是因为低能。

无产阶级和其他的劳动群众，则是用他们的行动来回答资产阶级的。像当初通钢工人大罢工、占领工厂、打死资本家代理人，就给了中国资产阶级一次沉重的打击，教育他们，阶级斗争才是硬道理、无产阶级的忍耐是有限度的。

在资本主义正常发展时期，小资产阶级（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高技能熟练劳动者）往往是政治上、思想上最活跃的阶级。中国的小资产阶级，依他们政治立场上的差别，分为左派（毛派）、右派（自由派）、民族主义者等几种不同的倾向。这几种倾向分别反映了小资产阶级中若干集团在社会经济地位以及基本的物质利益方面的差别。

由于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快速增长，为一部分小资产阶级上层物质消费水平的快速上升创造了条件，同时又提高了这部分小资产阶级在整个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相对地位，这是中国小资产阶级上层中民族主义流行的客观物质基础。另一方面，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时代，小资产阶级上层的另外一部分通过移民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核心国家或者在跨国公司中就业而得以进入国际高技能劳动力的高工资市场。这部分从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中受益的小资产阶级，其中许多人成为自由派的拥护者。

但是，资本主义矛盾的发展也造成了小资产阶级内部的分化。小资产阶级的中下层往往陷入买不起房、结不起婚、孩子上不起学的困境，受到血汗工厂式的剥削，不断受到无产阶级化的威胁。在这样的现实面前，一部分小资产阶级在思想上开始向无产阶级靠拢，初步接受了马列毛主义思想。还有一部分边缘化的小资产阶级，对资本主义压迫不满，但是又不甘心跌入无产阶级，畏惧无产阶级革命，同时对资产阶级民主抱有幻想，因而在思想上暂时做了自由派的俘虏。

许多红色中国网的网友都注意到了，红色中国网经常转载一些右派网站如自由亚洲电台、美国之音、中国茉莉花革命的评论和报道。我们这样做，是为了帮助红色网友了解当前意识形态战线的全部情形，了解中国社会各阶级特别是小资产阶级各派别的思想动态。

最近，我们注意到一个叫做新品葱的右派网站。这个右派网站上活跃分子中有很多是歇斯底里的反共狂、历史上地主和反动官僚的后代、港独分子，但是也有一些是生活困窘的小资产阶级中下层分子，在生活中找不到出路，以为只要追随自由派反共就可以改变命运。我们派了一个编辑去与他们交流，搞的是阳谋。

在那里，有一个讨论“旧社会的地主到底有没有共产党描述的那么邪恶”的问题贴。下面大部分的回复都是些右派的陈词滥调，什么地主的邪恶都是共产党的污蔑，地主中有很多善人，地主都是辛辛苦苦几代人积累了一些“合法财产”然后被泥腿子共产了，地主是可敬可爱的乡绅，等等。

但是，也有一些有意思的回答。有一个右派网友，自己揭露自己的“祖上”是怎么压迫农民的：“各种文字记载都无法向我们传达到底当时的农民有多么的凄惨 ... 我也很纳闷为什么那么多人，祖上也就是个农民，或者自己也就是个普通公司员工，竟然会去替地主和资本家洗白。我所在的家族，当时的土地也被中共分给了佃农，我都不好意思去洗白自己的祖先是好人。现在家族里面有老人讲起他们的父亲和爷爷给他们讲的故事，我自家这边的老人都是讲祖上是怎么收租子和抢别人女儿当老婆的 ... 不说别的，就看看现在中共下面的村官，哪个是干净的，哪个不是地头蛇、土皇帝，要是真干净他们哪来那么多钱。”

还有一个右派网友，称毛主席为“腊肉”（下面以XX代替），这是他们右派分子中流行的对毛主席的诬蔑，可见他们对毛主席的刻骨仇恨。但是他发言的内容是怎样的呢？这位仇恨毛主席的右派网友说：“看看任正非、马云那些最良心的资本家就知道了，能把员工送进监狱，以前的地主只会比任正非他们坏10倍。有时候觉得XX真的牛逼，三妻四妾那些地主，全部自愿主动只留一个，其他的老婆分给穷人，如果没有饿死几千万人的骚操作，从穷人的角度看，XX时期是最平等的，虽然是均贫，但是再穷也能娶得起一个女屌丝，现在5000万以上光棍，这几千万人注定要绝后的，真的一言难尽。”

这个右派分子，虽然被右派洗脑，相信了什么大跃进饿死几千万人的谣言，但是被资本主义压迫的现实却是实实在在的。对于他来说，迫切的问题，就是娶不上女屌丝，有变成5000万光棍之一、断子绝孙的危险。这个危险是如此之大，以至于他都开始觉得毛主席时代是“最平等”的，即使是“均贫”，只要每个男屌丝都能娶上一个女屌丝，就比地主资本家可以胡作非为强。这个标准很简单很粗暴，但是也很实际。这说明，很多像他这样的右派分子正在从自己的亲身经历中悟出这样一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道理：造反有理。

那么，信奉民族主义的小资产阶级又怎样呢？大家知道有一个叫西西河的论坛，这个论坛上的网友主要是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也有一些带有民族主义倾向的左派、半毛派。最近，“中央”和国务院发表意见，提出在电力、电信、铁路、石油等行业要向“民营企业”进一步开放。就是说，要在仅有的几个国有企业还占优势、又是所谓关系“国计民生”的行业搞私有化。对此，一位西西河网友评论说，这将是“压倒长城的最后一根稻草”：“最后的结果就是90年代东北企业大倒闭，人员大下岗，只不过这回在全国上演，最后造成国家稳定出现问题，演出各种颜色革命。... 那些有权有势的，很可能自主的或者被动的参股这样的企业，为自己获得各种利益，如钱财，子女国外教

育，自己退休跑到国外养老等等，从而损害国家民族利益，因为他们谁都知道中央上层实权人物绝大多数就是这么干的，上梁不正下梁歪。看看我们国家多少这样的领导人，他们的子女，和一些名人这样干就知道了。... 这么下去的唯一结果就是大家都为船沉做准备，谁也不全心全意的为船的安全、强大贡献自己的力量了。因为大家谁都知道【美帝】才是主人，中央只是傀儡，反正跟【美帝】混还能得到点公正的待遇，跟中央混说不定什么时候就被【...】。中央政府这是挖自己的墙根，当他们倒台了，我想广大民众一定会杀他们的九族的，把所有的怒火释放在一切可以和他们联系的人身上 ... 因为愤怒的民众不会区分谁是真正的罪魁祸首的。”

从前左派队伍中有位韩德强先生，也是鼓吹民族主义的。韩先生有一次在香港发言，劝中国的资本家要搞“可持续的剥削”，不要将中国的劳动群众逼迫太甚。韩先生讲的是很有道理的。但是为什么中国的资产阶级就是那样鼠目寸光，那样愚蠢，非要将私有化进行到底，非要将剩余的国有资产分光吃净，非要大搞 996、251，非要逼得那些最有技术、最听话的高素质劳动力不是猝死就是跳楼？为什么就不能让中国的小资和城市工人都买得起房、看得起病、孩子上得起学呢？为什么就不能把剥削的缰绳稍稍放松一点呢？为什么就不能让每一个男屌丝都找到一个女屌丝呢？

这一方面是因为中国资产阶级是通过资本主义复辟、通过侵吞社会主义的国有和集体资产暴发起来的，没有任何一个“第一桶金”是干净的，所谓“得国不正”，国祚恐难长久，因而就决定了中国资产阶级急功近利、贪婪无度的特点。更主要的，是因为中国资本主义建立在残酷剥削广大的廉价劳动力并为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供应工业制成品的基础上。为了保持他们的所谓竞争力，就必须大搞血汗工厂、996，必须把一个又一个普通工人、技术人员、工程师和程序员逼到猝死，即使是华为那样的高科技资本家也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虽然有一些爬上世界资本主义核心的幻想，但是美帝国主义不允许，中国资产阶级也没有与美帝较量的胆量和决心。

于是，一个又一个劳动者、屌丝、码农、“奋斗者”，就从他们自己的亲身经验中，了解到这样一条马克思主义真理：造反有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中国的资本主义剥削，终归还是不可持续的。

谨以此文，纪念伟大领袖毛主席诞辰 126 周年。

阳和平先生的群众观还是毛主席的群众观？ (2019年12月27日)

远航一号

近日，很多进步团体都举办了纪念毛主席诞辰 126 周年的活动。激流网也于 12 月 21 日召开了主题为“毛泽东的群众观”的研讨会。在会上，他们邀请阳和平先生做了题为“简论毛泽东的群众观”的发言。这篇发言的全文发表在激流网上。

阳和平先生的发言分四个部分。第一、第二部分是铺垫。在这两部分里，阳和平先生讲了一些似是而非的观点。阳先生一方面讲，看群众运动，要“从社会的主要矛盾出发”，要“看大方向”，要“看主流”，另一方面又讲，“群众运动中出头露面的和带头人物的主张不一定代表这个运动的实质”。如果不去看哪种社会力量掌握了群众运动的领导权，不去看掌握了群众运动领导权的人物他们的主张是什么，我们怎样才能了解一场群众运动的“主要矛盾”、“大方向”、“主流”呢？

阳先生发言的第三、第四部分是重点。阳先生发言的第三部分比较集中地反映了阳先生对社会主义条件下群众运动的看法。值得注意的是，阳先生在这段发言中，将原社会主义国家中普通劳动群众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与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右派利用一部分劳动群众发动的一些反对社会主义的“群众运动”混为一谈。

下面这段话可以集中反映阳和平先生的这一错误：

在苏联和东欧一些国家，自从修正主义上台以后，那里的无产阶级就丧失了自己的政党，那里的无产阶级专政就让位于国家垄断官僚资本主义的专制。在那里，工人阶级的反抗是本能的 ... 表现在匈牙利的工人群众趁着右派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对专制政权不满的匈牙利事件在全国各地迅速地组建了工人代表会议的权力机构上。

阳和平在这里讲的“工人阶级的反抗是本能的”，指的是 1956 年的波兰、匈牙利事件。阳和平先生认为，在那个时候，修正主义就已经在苏联和东欧上台了，苏联和东欧各国就已经是“国家垄断官僚资本主义的专制”。在阳先生看来，这种“国家垄断官僚资本主义的专制”贯穿着从斯大林去世到 1989 年的整个时期。1989 年以后，“非国家垄断的资产阶级利用工人阶级对国家垄断官僚资产阶级专制的的不满”夺取了政权，“为了获得工人阶级的支持，前者对工人阶级起码要做一些哪怕是暂时的让步。”换言之，在阳先生看来，在前苏联和东欧资本主义复辟以后出现的一系列资产阶级政权与以往的“国家垄断官僚资产阶级专制”相比，对工人阶级做了“暂时的让

步”，得到了“工人阶级的支持”，对工人阶级更加有利，也可以说更加进步一些。

阳先生这种对前苏联和东欧各国在 1989 年以前社会性质的看法（其实质，是否认苏联和东欧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并且认为“国家垄断官僚资本主义的专制”比资本主义复辟以后的社会更加反动）是否符合世界历史的实际，笔者在这里姑且不论。

下面集中讨论一下毛主席和当时在毛主席领导下的中共中央对于匈牙利事件的看法。

毛主席是怎样看待匈牙利事件中的“群众运动”的？

在阳和平先生看来，1956 年的匈牙利事件是匈牙利的工人阶级“趁着右派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对专制政权的不满”对“国家垄断官僚资本主义专制”的反抗，还建立了“工人代表会议的权力机构”。阳先生虽然没有直接宣布这些“工人代表会议的权力机构”的政治性质，但是参照后面阳先生认为“波兰的工人阶级在 70-80 年代用工联主义反抗国家垄断官僚资本主义是一个具有革命性的进步”，匈牙利工人用“工人代表会议的权力机构”来反抗“国家垄断官僚资本主义”显然就更有资格被认为是“革命性的进步”了。

那个时候，毛主席和在毛主席直接领导下的中共中央是怎样看待匈牙利事件以及事件中的所谓“群众运动”呢？有史料表明，在匈牙利反革命事变恶化以后，当时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中央一度动摇犹豫。在紧要关头，以毛主席为首的中共中央透过错综复杂的政治局判断匈牙利事件已经发展为反革命叛乱，敦促苏共中央采取果断行动。正是在中共中央的帮助下，当时的苏共中央才下定决心，出动苏联红军，帮助以卡达尔为首的匈牙利工农革命政府镇压了反革命叛乱，从而巩固了匈牙利社会主义政权和当时的国际社会主义阵营，也大大提高了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在国际共运中的声望。

可见，毛主席对于群众运动的态度，绝不是像阳和平先生想象的那样，似乎认为任何时候任何条件下只要某种社会力量打出“群众运动”的旗号，就是天然进步天然合理的。群众运动是有阶级性的，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有些群众运动也可以是反动的、反革命的。

1956 年 12 月 29 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长篇文章《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以下简称《再论》）。这篇文章在发表时注明，是“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讨论，由人民日报编辑部写成的”。据吴冷西等同志回忆，写作这篇文章，是由毛主席亲自提议的，其主要思想是毛主席的，又在毛主席亲自主持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做了反复修改，最后由毛主

席定稿。所以，《再论》一文实际上体现的是毛主席的思想，是毛主席对于到那时为止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经验教训的一次总结。

《再论》明确指出，匈牙利事件“是帝国主义在侵朝战争以后对于社会主义阵营一次最严重的进攻”。《再论》肯定了当时的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临时中央的决议，认为匈牙利事件的实质是“反革命复辟阴谋”，国际帝国主义在其中“起了主要的决定性的作用”。

《再论》肯定了苏联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成功经验和伟大成就，认为当时的苏联劳动人民是“国家和社会的主人翁”，总结了五点苏联革命和建设的基本经验。

《再论》指出了斯大林对于苏联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伟大功绩，也指出了斯大林的严重错误。《再论》特别指出，斯大林的错误不是由苏联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造成的。《再论》认为，“苏联的经济制度基本上是适合于生产力发展的，苏联的政治制度也是基本上适合于经济基础的需要的。”为了纠正斯大林的错误，不需要去“纠正”当时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

《再论》批评了铁托和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当时对于匈牙利事件的一些看法。《再论》明确批评了当时南斯拉夫主要领导人之一卡德尔认为匈牙利“必须从根本上改变政治制度”的错误看法，批评了南斯拉夫领导人关于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即重建后的匈牙利共产党）应当“把全部政权交给布达佩斯和其它区域性的工人委员会”的错误主张，批评了卡德尔所谓可以“不管工人委员会成了什么样子”、“这样的党是官僚专制的化身”的错误论调。《再论》明确支持当时的匈牙利工农革命政府解散“被反革命分子所操纵的布达佩斯和其它区域性的工人委员会”，认为，“匈牙利的同志们是作得完全正确的。否则匈牙利的将来就不是社会主义，而是反革命。”

可见，与阳和平先生认为，“凡是千千万万个人民群众参与的抗争都具有天然的革命因素”、不必担心群众运动中“谁利用了谁”的观点相反，毛主席和当时中国共产党中的无产阶级革命派都认为，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是可以有反革命的群众运动的，甚至名为“工人委员会”的群众组织也可以被反革命分子操纵。与阳和平先生所认为的当时的匈牙利工人反抗的是“国家垄断官僚资本主义专制”相反，毛主席和无产阶级革命派明确批评了当时南斯拉夫领导人所谓匈牙利社会主义已经是“官僚专制的化身”的错误观点，坚定支持了在苏联红军帮助下镇压了反革命叛乱的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和匈牙利工农革命政府。

以阳和平先生的个人经历，对于毛主席对匈牙利事件的看法以及在毛主席亲自主持下发表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不可能不了解。了

解了，却仍然认为当时的苏联和东欧各国就已经是“国家垄断官僚资本主义专制”，仍然认为匈牙利事件不是反革命叛乱而是本能的“工人阶级的反抗”。这样做，是因为阳先生对于马列毛主义有自己的独到创新和发展吗？如果有，为什么不把自己的独到创新和发展拿出来，让我们都看看，阳和平先生比毛主席高明在哪里？如果没有，为什么明知毛主席在有关问题上的教导，却要掩盖这些教导，违背这些教导，来兜售自己的而不是毛主席的“群众观”呢？

阳和平先生的“甚至有一种说法”

阳和平先生“简论”一文的第四部分提出了一个没头没脑的问题，“什么才是法西斯主义的‘群众运动’？”阳先生说：“历史上一些群众运动经常会出现打砸抢烧的行为... 甚至有一种说法，叫‘法西斯主义的群众运动’。”

为什么说阳先生没头没脑呢？阳先生发言的总标题是“简论毛泽东的群众观”。笔者浅薄，不知道毛主席终其一生在什么场合专门讨论了“法西斯主义的群众运动”。阳先生说，“甚至有一种说法”。那么，是谁的说法？关于什么问题的说法？阳先生不讲。

查主流媒体，在最近一个时期没有这方面的文章。在过去一年中，阳先生本人似乎也没有这方面的专论。激流网倒是在本月 17 日发表了一篇译文，叫做“右翼的兴起”，翻译自美国的《每月评论》杂志，是加尔各答一份著名的社会主义杂志对《每月评论》主编约翰·贝拉米·福斯特的采访。但这份采访并没有提及发生在中国领土范围内的“法西斯主义的群众运动”。

于是，我们红色中国网的同志只得反躬自省。原来，在今年 8 月 15 日，红色中国网的水边编辑曾经撰写一篇文章，题为“香港运动已成为法西斯运动，左派不要自欺欺人”。似乎符合阳和平先生的“有一种说法”的定义。

在那篇文章中，水边同志指出：“香港的法西斯运动，物质基础是香港乃至世界范围的资本主义整个经济社会体制的衰落，而文化基础则是香港本土主义在近十年的兴起... 这些新的法西斯主义普遍的特点是把资本主义带来的巨大问题怪罪到某一些特定的群体身上... 香港的政治有其与世界资本主义发达地区一致的情况，那就是在资本主义矛盾尖锐的情况下，产生了排外，尤其是歧视排斥大陆群众的思潮。对大陆人的歧视是长期的现象，把歧视提升到了排斥大陆人，乃至要清除大陆人和大陆的影响（各色光复运动），这是近十年才发展起来的... 在近十年来的香港政治运

动当中，右翼势力，以及其中的法西斯部分，得到了长足的、几乎没有阻碍的发展。这里面被提升到理论层次的，就是一批所谓港独理论。”

阳和平先生，你看，这是不是你要批判的“有一种说法”呢？在上面这种“说法”中，水边同志指出了香港法西斯群众运动的根源是香港和世界范围资本主义不可克服的矛盾，在矛盾尖锐又无法解决的情况下，香港的相当一部分群众将资本主义带来的巨大问题怪罪到中国内地人民头上，并产生了普遍的歧视排斥内地群众的思潮而且付诸于行动。

在另外一篇文章中（“为什么说当前香港的群众运动是反动的？为什么这次运动是必然要失败的？”），远航一号同志又指出，这次香港的群众运动是由香港的小资产阶级领导的，这次运动事实上是一次右翼民粹主义运动（或者是在右翼民粹主义意义上的法西斯主义运动）。远航一号同志还指出，除了将中国内地群众作为资本主义矛盾的替罪羊以外，右翼民粹主义的一个客观物质基础是香港的小资产阶级幻想通过排斥驱除内地人民的办法来维持对香港高工资劳动力市场的垄断。

我们注意到，在激流网上发表的《每月评论》文章中，福斯特对于法西斯主义的阶级基础是这样说明的：“按照阶级定义的法西斯主义是以动摇的中下层阶级、阶层或小资产阶级为群众基础，以及反工人阶级、反移民、种族主义和仇外的运动。”可见，水边、远航一号关于法西斯主义或右翼民粹主义概念的运用与国际马克思主义理论界对于新法西斯主义概念的运用是一致的。

阳先生，请明示，你所谓的“有一种说法”，到底是不是针对水边和远航一号的上述观点呢？到底是不是针对红色中国网呢？阳和平先生，你赞成不赞成水边同志和远航一号同志对过去半年中香港群众运动的分析和判断呢？

阳先生不说，而是提出了一个他自己的关于什么是或者不是法西斯主义群众运动的标准：

没有国家暴力，即资产阶级做后盾和默许的所谓“群众运动”是不可能成为法西斯主义的运动。因此，群众性的打砸抢烧和排外的暴动行为是具有法西斯主义性质的反动行为还是具有革命性的群众运动取决于国家暴力，即资产阶级的态度是默许和支持还是打压。

香港的群众运动到底有没有香港资产阶级做后盾，在有更多的事实材料证明之前，我们暂且不论。阳和平先生在上面倒是给出了一个简单明了的判断“群众性的打砸抢烧和排外的暴动行为”是“法西斯主义性质的反动行为”还是“具有革命性的群众运动”的标准。只需要看“国家暴力”对于运动是“支持还是打压”。二者必居其一，没有什么含混的余地。

按照这个阳氏法西斯主义定义，显然，香港的群众运动一直被香港的“国家暴力”打压着，只能是“具有革命性的群众运动”。

考虑到阳和平先生致力于对马列毛主义的发展和创新，未必有时间详细考察香港的群众运动，我们给阳和平先生提供一点材料，供阳先生研究、思考。

8月16日，在香港学生运动中起领导作用的“香港大专学界国际事务代表团”在万人集会中提出了“英美港盟”的口号，要求英国确认中国违反《中英联合声明》。作为其合作伙伴的连登“我要揽炒”团队，在致各国公开信中说：“最后，在此温馨提示香港政府——假如中英联合声明失效，根据1841年穿鼻草条约、1842年南京条约及1860年北京条约，英国有权强行回收香港岛及九龙半岛。”10月1日前，香港科技大学学生会的“科大行动”发起所谓与中国“断交日”活动，主张：“强制遣返在港中国人；吊销中资企业在港营运执照；建立实体边境、限制两国交流”。

当然，按照阳和平先生的群众观，“带头人物的主张不一定代表这个运动的实质”，上述这些都不是运动的“大方向”、不是“主流”。

关于运动的“主流”，我们也有一些情报，叫做“兄弟爬山，各自努力”，“不谴责”，“不割席”。

香港的港独分子可能确实不懂。但是，阳和平先生，您可是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难道也不懂得1842年南京条约、1860年北京条约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人民意味着什么吗？要将历史上帝国主义强加于中国人民的不平等条约再强加于今天的中国，不要说这是一个运动的主流，即便是支流，在绝大多数中国人民眼中、在历史上饱受帝国主义侵略压迫的广大亚非拉人民眼中，也绝不可能是什么“具有革命性的群众运动”，也绝不可能被容忍！更不必说香港的“主流”还要“不谴责”、“不割席”。

阳和平先生，毛主席的在天之灵看着我们，如果主席在世，他老人家是会坚决依靠绝大多数中国人民来解决香港问题呢？还是依靠那些一心要恢复1842年南京条约、1860年北京条约的香港“革命群众”强制遣返在港中国人呢？对于这个问题，我们相信，你有一份答案，我们也有一份答案，全中国人民还有一份答案。正确的答案，只能在全中国人民这个最大的群众那里。这，才是毛主席的群众观。